香港文汇报内幕

姜维平



照片说明：左一，香港《文汇报》办公室主任刘伟昌，二，副总编张建华，三，姜维平，四，副社长刘永碧。

关齐云失踪之谜

这是我心中深藏的一个难解之谜，直到 2006 年 1 月 4 日出狱，我也不知道我的前任----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主任关齐云，跑到哪里去了，究竟是死是生？《文汇报》讳莫如深，显然早已把他遗忘了，但我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虽然我和他先后才见了两次面，我对他却不能释怀，故 2007 年，当我重获自由后，第一次去深圳见到香港《大公报》的记者晓 Q 时，才从她口中解开了谜底，恍然大悟，联想到我自身跌宕起伏的命运，唏嘘再三，不胜感慨：人生真是无常啊！正如妈妈活着时讲过的话：人在日子的后面爬行，谁能跑到前面去看呢？

办事处还没建，主任失踪了

我天生是一个不安守本分的俗人，90 年代初期，虽然我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我觉得不满足，那时深圳经济特区刚刚建立，从大连去旅行还得办边防证，这给它涂上了神秘的色彩，我和张某杰一同去那里找点事做，被那里蒸蒸日上，灯红酒绿的特区生活惊呆了，我们在嘉宾路附近的大连酒楼见到了大连大复中心老板孙某祥的哥哥，他开办了大连酒楼，所招收的服务员都是大连籍的空姐，而北航当年第一次在大连选美之时，我去做了新闻报道，故孙老板热情地请我们吃饭，还介绍了几个大连女孩和我们认识，其中一个在临分手时送给我们一份香港《文汇报》。我在上面看到了几张照片，内容是该饭店员工和《文汇报》社总编辑刘

再明等人的合影。我忽发奇想：为什麼不可以在东北建一个香港《文汇报》的记者站呢？我可以做站长嘛，既然是香港的媒体，一定有新闻自由，我可以写批评稿件，推动生活前进啊！

于是，这个大胆的念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给刘再明写了一封求职信，也建议他在大连设一个点，但后来得知，日理万机的《文汇报》领导，根本没看到这个信函，我很快收到了《文汇报》办公室带公章的复信，其称它们没有这个考虑，其实《文汇报》已经在向中共宣传部门和国务院港澳办，申请创办东北办的事宜，但我不了解该报，按常规，它不会选我这样自报家门，来历不明的人，他当时选中的人是关齐云，他时任香港《文汇报》广州办事处主任。我不知道这些，又生性不服输，于是，我就从深圳打电话和报社广告部联系，一个叫梁某堂的领导和另他一个叫伍某的小姐接受了我的邀请，他们也常来深圳，我说愿意先为他们拉广告，其它事以后再议，他们就很快与我在一家酒店见了面，彼此印象不错。随后不久，报社委派姜某英到大连与我接触，并由她代为联系了已先期到达长春市的《文汇报》外派大员关齐云，他手拿报社以及港澳办的正式批文，正在等待拜访吉林省的领导，我不敢怠慢，立即乘机赶到那里拜访了他，时隔十几年了。但一切还历历如昨：我看到一个身材魁梧，脸圆眉浓的东北大汉，正在埋头写信，他说：我的信写得好长啊。。。。。。后来才知道他写的是“遗书”！晚上，他请我在一家东北风味餐厅吃饭，还一起唱了流行歌曲，他引吭高歌的《北国之春》把我惊呆了！专业艺术团体的歌唱演员，也未必能胜过他，没想到《文汇报》有如此多才多艺的记者！

原来他是名蒙古族人，生在辽宁省康平县，难怪他能歌善舞，健壮豪爽，经过短暂交谈，我们成了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好朋友，他说《文汇报》驻东北办很需要我这样年轻有为的人，欢迎我加盟，但他们是香港报纸，在内地活动需要办理繁杂的手续，而且要求自负赢亏，目前办站，最需要钱，他要我先为《文汇报》作点贡献，当然又是拉些广告，我爽快地答应了。

半个月之后，他第一次来大连，由我安排住在松山宾馆，我先给他揽到了 10 万的广告，是丹东一家房地产公司付的款，因为那时许多企业拟在香港招商，而我和这些企业的老板又私交不错，他随身带了一枚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筹}的印章，我认识大连农业银行的领导孙某勋，就破例给他办了账户。我还带他去拜访了市委宣传部外宣处的处长王某强，市委副书记林某民，后者还在我们呈上的一个以报社名义写的报告上，亲笔签属了意见：欢迎香港《文汇报》到大连建站，尽管关齐云一再吹嘘，他和薄熙来是中国社科院的新闻研究生同学，在一个篮球队混了很久，私交不错，但求见的纸条没有回应，他很扫兴。我为他买了生活用品和一个篮球，并在大连宾馆宴请了他，作陪的还有账户所在银行的王主任，关主任说，大连风景太美了，从此以后就不走了。他已奉报社领导之命，先后走访了哈尔滨，长春，沈阳，见到了所有东北省份的地方大员，还拿出一篇他写的文章给我看，是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接受他的专访，分上下两篇，题目是《闻世震谈辽宁国企改革》，发表在《文汇报》的中国新闻版上，很是醒目。他答应很快向港馆介绍大连，要我做他的得力助手。

然而此后，大约是在 1993 年 11 月的某一天，我赶到松山宾馆 1011 房间会他，却发现他已不辞而别，他没有结账，我为他垫付了 1000 多元的费用，并清理了他留下的所有物品：一个黑色皮包，内有香港《文汇报》的便签，收据，名片，照片，私人信件，笔记本，衣服等，还有他委托哈尔滨一个姓张的亲友印制的特约记者证 30 多本，我都精心地保存了下来。我当时对他特别信任，一点也没看出他身处亡命天涯前的困境之中。

我走下宾馆楼梯的时候，接到一个自称是他的朋友的电话，他说关主任要我转告你，他得到上级的命令，忽然回香港了，我很震惊，立即拨通他的手提电话，声音很嘈杂，他说他在由大连开往沈阳的火车上，目的地是广州，再转香港，他说对不起，太匆忙了。来不及亲自打招呼。不过很快就拿着《文汇报》的批文回大连了，你的编制也在其中，再见！他挂断了电话，从此他就从人间蒸发了！

受命尴尬之际，未解逃亡之谜

此后，我苦苦等待了几个月，和《文汇报》的几个领导都通了电话，但谁都回避关齐云的下落问题，我当时是一个非常相信别人的书生，又对《文汇报》的背景所知甚少，故对他们闭口不谈关主任的事感到莫名其妙，不过，歪打正着，这时报社发现了我这个人才：不仅会写文章，而且能拉广告，总之我有很深的人脉关系，又是资深记者，他们发现我，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只是对我不太了解，不太放心，需要考察。事有凑巧，大连市委宣传部长王某全等人去香港考察，顺便参观了《文汇报》新址，社长张云枫向他了解我的情况，我以前与其共事过，王部长当过《大连日报》社长，对我印象还不错，就美言了我几句，所以张社长放心了，

不久后，《文汇报》派办公室主任林金来和一个财务人员，先后到达了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清理了关齐云私设的四个账户，其中大连的 10 万元，只剩下了 500 元，我明白了，关主任总算有点良心，他虽然贪污了《文汇报》的公款，但个人的钱不骗，因为那天我请他吃饭花了 500 元，他可能以为我会把留下的钱取走，我既然能立账户，取走也无问题，但我一生坚守的做人准则是：不属于我的东西，就是金山银山，在眼前，我也不动。。。。。。后来听说，《文汇报》查帐后更信任了我，也统一了录用我做“开荒牛”的意见，很快《文汇报》副总编刘永碧，王伯遥一同在深圳接见了我，行前我专门电话请教刘永碧：关主任的遗物是不是要带去，她不表态，转移了话题。她初调进报社，和以前所有的《文汇报》人员一样，回避敏感的这件丑闻。

几天后我在深圳和《文汇报》的领导见了面，他们对我十分满意，我向往已久的理想终于实现了，成为了一个受命于尴尬之际的，必须收拾烂摊子的办站负责人，但我心中的阴云久久地困扰着我：关齐云怎麼了？刘永碧是一个语言很少的非凡的女性，她过于精明，不会讲关齐云的下落，其它同事也所知甚少，只有与我熟悉的姜某英告诉我：关主任自杀了，死在深圳的风景旅游区小梅沙海边，遗书是早就在长春写好的，洋洋数万言，文字很诚恳，很悲切，很凄凉，但这封信从未公开过，《文汇报》也没在任何大会上谈过此事，估计是担心堂堂的共产党大报名声受损吧！据说，我被捕之后，一度也是这样！只是好多年过去了，我和刘永碧混熟了，有一次她才对我说：关齐云的字写得太漂亮了！这说明，她刚从新华社驻比利时分社调香港工作，没见过关齐云，但读过他的遗书，印象深刻，而王伯遥对我则是发了一番感慨：人生，有时就是一念之差啊！看来他们对关齐云印象还不错，但由于纪律所限，不能公开地更多地谈论他，那麼《文汇报》为什麼要如此呢！

他们能很快遗忘了这位生死不明的外派大员，我却很难，我私下电话约见了他的儿子，在深圳的一个酒店里，把关齐云留下的一些物品归还了他，他和父亲一样，有一张又大又圆的脸盘，很红，也是浓眉大眼，目光深邃，但他的笑容很是惨淡，我告诉他，许多人猜测他父亲跑到俄罗斯去了，现在还活着。我说，只要活着，别管它人怎麼议论，他是你父亲！他一言不发，未置可否。我还问他，你叔叔怎麼样了？《文汇报》同事有没有谁来看过他们，

他只是连连摇头。他的无奈表情使我感到凄凉，我想，假如我也有倒霉的时候，《文汇报》会怎样对待我呢？

潜逃 12 年，终于投案自首

直到 2007 年，我才把故事连接上，但记忆已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我的心灵已布满了创伤。这时我变得轻意不会相信任何人，小 Q 给了我一张报纸的复印件，我才确信，关齐云找到了。

据报道，2005 年 9 月 6 日上午，一个 60 多岁的男人，来到位于昆明市滇池路的云南省检察院大门口。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在省检察院大门口外徘徊良久，终于走到门卫面前，神色慌张说："让我进去，我要到反贪局投案自首。"守门的法警上下打量着他，只见他衣服破旧，面容憔悴，脚上的皮鞋又灰又破，手里还提着一个破烂的包。倒像是一个整日奔波于各地喊冤叫屈的老上访户。细心的法警还注意到，他的包连拉链都坏了。从他的这身打扮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个贪官。这名法警的第一个想法是：许多老上访户就是怕进不了检察院的大门，才谎称自己是来投案的贪官。也许他并不例外。于是，法警客气地告诉他，可以到大门左边的接待室反映问题。 可是这个老头子却坚持说要到反贪局才讲情况，还打开了手里的包递给法警："你看，我把生活用品都带来了。我真的是来投案的，我挪用了单位的公款，已经藏了 12 年了。今天，我一定要去到反贪局自首。" 法警将信将疑，立即将此事向反贪局作了报告。不一会儿，两名反贪局的检察官出来了，他们把这名老头子带进办公室坐下，并热情地给他倒了一杯茶水。 老头子捧着茶杯，似乎有点神情恍惚。他大口吸下两口茶水后，有些迟疑地呆呆盯住检察官们。片刻之后才一字一句对检察官吐露道："我的真名叫关齐云，原来是香港文汇报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我在 1993 年挪用了单位的 120 万元公款，在昆明藏了 12 年。今天我来投案自首。"不等检察官插问，他又紧接着说："我失去了亲情，失去了爱情。我相好了十多年的情人，上个月 15 号刚和别人结婚，我感到日子没法过下去了。这也是促使我下决心自首，自己赎罪的原因。"

读到这里，我感到愕然，一是他的外貌，绝对不像 10 年前我印象里的风度潇洒的《文汇报》记者了，他在唱《北国之春》的时候，餐厅的小女孩全部跑出来，围着他，请他签字，他还发了几张名片！12 年，地位的落差，使他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可能过去认识我的人，在与我重逢之后，也是类似感觉吧！二是，他拿着两个假身份证竟整整藏了 12 年，这一方面，说明了公安的不作为达到怎样一种可怕程度，另一方面，他的生存能力真是非同寻常，由一个南来北往，热衷交际的老记者，变成了一个自囚的逃犯，他度过了生不如死的，坚难痛苦的岁月！三是，危难之际，他还能结交几个红艳知已，有的还是跟随了他 10 几年的小女孩，老关，真是魅力不减当年，艳福不浅啊！ 四是，其职务侵占的金钱数额之大，当时非同小可！他不是受贿，而是贪污，这是依据法规可以判死刑的，何况是 120 万元巨款啊，很显然，他如不逃亡，抓住之后，必被判死无疑，这等于说，他投案后，根据现在经济犯罪的数额情况变化，已是判死的可能性不大了！这说明，他投案前经过了仔细的权衡考虑，他还是很顾家的人，大概是想在有生之年，活着回家去看看吧！

一念之差，葬送美好前程

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关齐云投案后，第一个报道的是香港《大公报》，而该报和《文汇报》都是中共的喉舌。深圳新闻界的朋友告诉我，《大公报》是幸灾乐祸！同行是怨家嘛！

我仔细对比了香港和内地媒体对此事的报道，觉得后者更客观一些。记者的文章还说， 面对这样一个失魂落魄、邋遢不堪的人，刚见面时，检察官们几乎把他当成一个疯子。可他竟然是一个“文化人”，而且还曾经是一家著名报社的办事处主任！真是难以置信。检察官连忙稳定他的情绪，既从心理上宽慰他，又从法理上打动他。与此同时，立刻用电话向广东省检察院进行核实。 其实，有谁比我更了解关齐云呢？

原来，《文汇报》是共产党在香港设的一个对外宣传的窗口，它名义上是港报，实际上和《人民日报》没有区别，它归国务院外宣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双重领导，因此它的编采人员十分复杂，有的是从香港当地招聘的，有的是国内委派的，有的人事关系放在报馆，有的放在广东省委 8 办，我估计后一种人是特殊身份，具体属于哪个部门，我不知道，可能关齐云是一个具有这种身分的人吧。他为什么会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装死失踪？为什么会在 12 年后在昆明死而复生？他为什么到了云南省检察院自首，又转到广州？而不在户籍所在地深圳？ 为何至今判决结果不被人知？更无人知道他关在哪个监狱？

早在 1993 年秋，我刚和他在长春初次相识时，他就告诉我，他出生在内蒙古科左中旗白音塔拉村，是一个蒙古族汉子。1962 年中学毕业后，他顺利地考入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1970 年到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担任新闻干事，从此跨入了新闻行业。1978 年，爱好文学的他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81 年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工作，先后担任《宣传动态》编辑、刊物处处长。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给广大知识份子带来了灾难，但他春风得意，在整顿《深圳青年报》时，他很受上级信任，1986 年 12 月调任《深圳青年报》整顿领导小组任组长兼党支部书记，他曾对我说，他用自已的权利保护过曹长青，徐敬亚和王小妮等，我不知道真假，但从他留下的家书判断，他和徐敬亚私交还算不错，因为他叫儿子去向他借钱，通常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好朋友之间。他 1987 年 10 月任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处长。值此之时事业达到顶峰，《大公报》的小 Q 说，深圳新闻界的很多人都领略过他迷人的歌喉，至今记忆犹新。90 年代初，《文汇报》在广州筹建了第一个办事处，中共中央严密监控这个部门，需要一个首先必须是党员的正处级干部的人牵头，关齐云再上一个新台阶。1991 年，关齐云担任了香港《文汇报》驻广州办事处的主任。1993 年 6 月筹备香港《文汇报》驻内蒙东北三省办事处{筹}，他同年 11 月底负罪潜逃。

据我所知，他与我不同，他是一开始就被党组织信任的人，故早早地把组织关系就调进了广东省委 8 办，我只当上了东北办事处首席代表，并未得到进 8 办的待遇。后来港馆有一位领导告诉我，编委会已任命我为主任，并打印了正式的红头文件，但办公室主任刘某昌不同意，硬是压在抽屉里不发，据传刘说，东北办早晚要出大事，我们不幸被其言中，我和关主任先后入狱。我没有贪污，却被共产党以言治罪，而关齐云贪污了，却先头逃脱了，在我出狱前一年投案自首。据《文汇报》一位领导告诉我，1993 年初的一天，关齐云一直在深圳炒股票的弟弟关某某找到了他，对他说：“现在炒股很赚钱，可是我手头资金不够。办事处作广告、搞发行不是赚了些钱吗，不如先借出来炒股。”弟弟还拍着胸脯保证，如果赚了钱，每月付给办事处 2%的利息；如果赔了本，也会按银行利息归还本金。当时，股市很疯狂，仿佛只要投资就赚钱，故这种稳赚不赔的“好事”让关齐云十分动心。于是，他和弟弟签订了一份合同，让办事处会计分别在 2 月和 5 月分别汇出了 60 万元，到弟弟关某某的账户上。关齐云自然知道这种行为违法，特意嘱咐会计千万不要告诉《文汇报》总部。

原来，《文汇报》在财务上存在巨大的漏洞，它主要靠国内的办站为版面拉广告，但发票

是总社统一印制的，不带地方税务局的公章，而且账户设在国内银行，支票的大小印章均在办事处主任手里，会计，出纳制度，并不健全，故关齐云很易于操作，1993 年 6 月，报社已发现了资金的拖欠款太多的问题，故意以考察筹建东北办的名义，调虎离山，以便对他所管的业务展开清理。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接到了《文汇报》总部任命他为《文汇报》驻内蒙和东北三省的办事处主任的，要求他立即启程去东北，筹办《文汇报》驻内蒙和东北三省的办事处。然而，这个任命却使他心急如焚，因为弟弟原是内蒙古党校的教员，根本不懂股市行情和操盘运作，1993 年股市的低谜，让关齐云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借给弟弟关某某的120 万元，不但没有为办事处带来一分钱效益，反而连本金也被牢牢地套在股市中了。他想，如果新的广州办事处主任上任后审查账目，这 120 万元的巨额亏空的黑洞，就会暴露出来。那么，自己不仅位置不保，而且还将判刑坐牢。

念及后果，关齐云不禁心乱如麻，他绝不甘心自己从一个名利双收的香港《文汇报》驻内地办事处主任，沦为一个受人唾弃的阶下囚，因此，他只好不停地督促弟弟尽快归还借款，但弟弟关某某东拼西凑也才还上了 30 多万元，无法补上这个大窟窿。这时，在总部的催促下，他不得不踏上了东北之行的旅途，并蒙发了折东墙补西墙的侥幸心理。他想假如在东北能搞到一些钱，说不定还可以补上这个大窟窿呢！所以他一再督促我为文汇报多拉广告，而我搞到的 10 万元也被他拿跑了，文汇报白白给人家刊登了广告，一分钱也收不到！我还蒙在鼓里呢！

我记得 1993 年 11 月的一天，有一次我和他过马路，一边走一边聊天，我说刚才读报，知道有一个上海的老板炒股赔了 100 万，如果我有 100 万，就什麽也不干，只读书学《周易》玩，何必冒险炒股？这时，我们正好走到民航大厦楼前，他听了很是激动，大声说，如果我赔了 100 万，我就自杀！我非常吃惊地看着他，他用手比划，指着大厦说，我就从这里跳下来!。。。。。或许，我这番话刺激了他，使他难过，不过我真的一点也没有发现他带罪在身。据报道，在筹备办事处期间，他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自己挪用巨额公款的秘密败露。虽身在北国，却心系南方。那时，他在东北忙于筹建新办事处的工作，根本不可能回广东亲自填补这个黑洞，在向所有亲朋好友借款无门后，他彻夜绝望了，于是做出了一个让他现在追悔莫及的决定：逃亡。 行前他做出了精心的布置：他陆续将内蒙和东三省办事处的 10 多万元广告费取出，在 11 月底乘火车回到了广州，在买好去贵阳的火车票之后，他又偷偷的溜回了深圳，在海边制造出了一个上述的“自杀”的假现场。 不久，有旅游者在深圳小梅沙海滨浴场的沙滩上，发现了关齐云留下的身份证，还有衣服、鞋子，他的妻子还收到了他的一封带泪的“遗书”，上面写着：当你们见到这封信时，我已经死亡。就这样，大部分人相信他投海自尽了。但奇怪的是，一直没有发现尸体，故《文汇报》办公室副主任林某来怀疑他逃到俄罗斯去了，甚至有人据称在布拉戈韦申斯克见过他，由于香港《文汇报》不想丢丑，就吃了哑巴亏，从此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也慢慢地被它人遗忘。

风流才子，流亡也有红颜知己

关齐云没了，报社的钱也带走了，我成了唯一的受益者，很快当上了东北办的首席代表和高级记者，但他实际上还活着，他知道已被通缉，没办法出境，就在精心布置了自杀假现场之后，巧妙地辗转再三，乘火车到达了云南省昆明市，利用弟弟关某某为他准备好的两张假身份证，开始了隐姓埋名，东躲西藏的逃亡生活。 苟且偷生的日子不好过，但他巧遇的知音 给了他生活的乐趣。

据介绍，刚逃亡到昆明的最初两年，关齐云利用假身份证不停地更换旅馆。但资金有限，他必须租房住，也许是当过见多识广的记者，他特别偏爱大学，常常在各大学附近的旅舍中住宿，过了两年，他索性在大学城租房子长期定居了。但这样查户口很危险，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惊惶失措。而且以前他结交了全国各地各行业的许多人，他害怕被来昆明旅游的熟人认出，因此最后选择了远离闹市的云南农业大学作为长期定居点。在这里一住就是长达三年多，竟平安无事。

国内媒体的一篇报道说，也许是虚荣心的驱使，在隐姓埋名逃亡的日子里，关齐云也没有忘记自己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份。总免不了在对别人介绍时炫耀自己是在北京大学读的本科，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而为自己封的职业也离不了老本行，说自己是个作家。只不过关齐云的名字已经改成了假身份证上的“周玉林”。我真难以想象他这种喜欢抛头露面的人，还能耐得住如此寂寞。

就在关齐云隐姓埋名，惶惶不可终日的岁月里，据说，他居然还能给自己创造出“浪漫的爱情”故事。有一天，他刚到云南农业大学寻找出租房，就在校园的马路边上偶遇了两名女大学生。他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来昆明深入生活，勤奋写作的北京作家，为了体验生活，要在附近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希望多交朋友。这两名来自云南边远山区的年轻女孩，根本没见过如此博学多才，气质不凡的成熟男子，竟然对他产生了好感和信任。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文学，评说人生。有时，关齐云还在生活上慷慨地给予她们一些物质上和经济上的援助。

据媒体报道，未过多久，凭借关齐云的“特殊魅力”，这两名青年女大学生渐渐被打动了芳心，先后委身于他，成为他的情人。虽然他的年龄几乎相当她们的父亲，但她们心甘情愿，他也感到非常幸福，从此在与她们的交往中，暂时忘却了逃犯的苦恼，也使他体会到了人情的可贵。尽管其中一人与关齐云的相爱时间不长，只偷偷相处几次后，就再也不和关齐云来往了。可关齐云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显然这个情节是关齐云自述的，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的确有这个魅力，记得有一次我陪他到大连胜利桥邮电局发信，因人多排队，有人夹芯，他生气地走上去，用粗壮的胳膊一下子把那个小伙子推出去，那家伙连一个屁也不敢放，于是他站在那里维持秩序，有两个年轻的女孩主动和他攀谈，那眼神好特别啊！

光阴如箭，转眼已经到了 1999 年底。我不知道关齐云是否了解我的情况，由于我在香港媒体以笔名撰稿发表文章，得罪了地方贪官和太子党薄熙来，自知会受到报复，也打算逃亡了。这时，关齐云已出逃了 6 年。他出逃前带的钱已所剩无几，为了长期生存，他决定开一家小商店维持生计，就选择了地点比较偏远的地方，最初是在昆明市郊的嵩明县，后来又改到昆明北郊的黄土坡。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地方较为遮人耳目，但经济效益并不理想，由于害怕被发现抓获，他总是不敢和别人接触，就只有花钱雇人，这又增加了成本，进货发货之类的事都交给小工去做，又不太放心，很是烦恼。而且家里多了一个人，他无形中成了知道底细的证人，更是使他终日忐忑不安，他对昆明检察院的人说：“虽然出逃已经很多年了，但时时刻刻都如同惊弓之鸟，太受罪了。每次，只要一看见警察，一听到警车响，就心里发慌。”他举例说，有一回，小卖部被盗贼撬开了门锁，里面仅有的一些商品、钱财被洗劫一空。他很愤怒，也想报案，但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只好在嘴上大骂他们一通，解解恨，内心深处的痛苦无处诉说。

情侣反目出走，他心死如灰

1993 年在大连，我没见过他有固定的情侣，可能和时间较短有关。根据他投案后的供述，上面的两位女子中，有一个情人对关齐云一直忠贞不渝，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子，她大学毕业后，为了表示对关齐云的爱情，决定不回家乡孝敬父母，留在昆明市找到了工作。因此，她与关齐云保持了这种不明不白的长达近 12 年的情人关系。每天，她早起晚归，下班后，还要为他料理店铺的生意。为了支持他的小说写作事业，据说前几年，这名比他整整小 32 岁的女子，甚至用自己微薄的收入维持着他们的基本生活，还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他。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连邻居都不知道他们不是合法夫妻，这对“老夫少妻”恩爱无比，风情万种的样子，使他们羡慕不已。

但骗人一时，骗不了一世，天长日久，耳鬓厮磨，单纯年轻的女子渐渐地发现了破绽，他不喜欢与任何人交往，他的书稿也迟迟不见出版，还常常喜欢一个人独自喝闷酒，想心事。而且，关齐云有时酒后变得反常，脾气暴躁不安，情绪难以控制。这时，随着年龄增长，情人由昔日的一个涉世不深的黄花女孩子，逐渐变成了经验丰富的成熟女性，她要打开他心中的锁钥，偷偷地在心里琢磨：他莫不是一个逃犯？她不得不对关齐云的身份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最后，一次口角之后，终于弥天大谎被彻底戳穿了，这名女子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

我想，这个农村出身的女孩，满以为早晚有一天，作家会回家，会和他太太离婚，再娶她为妻，她不在乎她老，但必须有一个名份，但现在梦想破灭了！ 他原以为她会原谅自己，并继续委身于他，但不料这个女人毅然决然地永远离开了关齐云，很快于同年 8 月 15 日与它人结婚了。尽管她没有出卖他，消息传来，他的自信心还是彻底地垮了，看着镜子里满头白发和苍老的容颜，他默默地哭泣，连声音都不敢出。他对检察院的人说，内心十分痛苦时，恨不得找情人算账，真想与她同归于尽，了此残生。但又于心不忍。

是的！我了解一些他为人处事的概况，在大连他出逃前留了 500 元在帐上，就足以表明他为人还有底线，他不至于走极端。要不要投案自首？他彻夜难眠。正在此时，又发生了一件事：2005 年 9 月 5 日晚上，当地派出所对辖区内的流动人口，进行了例行的拉网检查。当警察敲响关齐云房门的时候，他慌恐不安，越墙而逃，如果是 10 年前还动作敏捷，但现在他已气喘嘘嘘，勉强逃脱，据说，这一夜对关齐云来说，显得特别漫长而痛苦。回想自己在 12 年前，他是执掌《文汇报》广州办大权，每年赢利上千万广告费，发稿上百篇的名记者啊，经常出现在灯红酒绿的社交场合，连广东省委书记都对他点头哈腰呢！而如今，自己怎么就堕落到这个地步了？现在已经 62 岁了，经过十多年的逃亡生活，连个小卖部都不能平安地经营！渐渐地年老体衰、心如死灰了，他没有了亲情，没有了友情，没有了事业，没有了家庭，只剩下了一具僵尸和空壳，他流浪了 12 年，灵魂也遗失了 12 年！

当地的一篇报道说，他经过一夜的反思后，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立即自首。到什么单位投案自首呢？他想到以往的生活经验和看到的各种报道，据说检察官既能严格依法办事，又不会刑讯逼供，故到检察院自首，或许是最佳选择，不但可以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还能保全自己的“体面”。 于是，第二天八点多钟，关齐云退了房子，收拾了简单的生活用品，担心“进去”后没有水喝，还特地带上了一桶矿泉水，直奔检察院而去。我想，他历时 12 年，总算想开了，自己做的事，谁也不能承担，必须负全责！这样一来，就发生了本文开头描述的生动一幕。

心血来潮，为何要撒这样的谎？

2007 年之后，我去过广州三次，曾再三试图去监狱看他，我委托广东省著名书法家荆鸿帮忙，但由于我的敏感身份而未果，或许我这样执着，除了我是他逃亡后的受益者之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我在 5 年多的《文汇报》驻东北办工作中，既是领导又兼出纳，也曾享有过类似的财权，但我没有挪用和贪污公款，使薄熙来无计可施，不得不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我，其中品行是一个原因，另一个是我有关齐云的前车之鉴，故我对他一直难以忘怀，感激不尽，我有一次还把电话打到了广东韶关监狱，但没有找到他，我想他一定经济上很困难，做为他 1993 年的第一个东北办的同事，我责无旁贷。没办法，我处处受到监控，我只有在报刊上寻找他的影子。

唯一可以找到的一篇报道说，关齐云的家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不知道他是死是活。2004 年的时候，他偶然知道了自己的儿女都已长大成家，事业有成，抑制不住缠绵的思念，斗胆冒险地给儿女各通了一次电话。可能担心自己的行为，给孩子们心理上留下不好的阴影吧，他不但没有向孩子们请求救济，而且还精心编造了一个新的谎言：前些年是被国家有关部门秘密派到巴基斯坦，去执行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担任了驻某外国机构的负责人。虽然，现在已经回到了国内，还要继续完成艰巨的任务，不方便暴露出自己的真实联络方式和住址，更不能回家看他们。望他们放心。

我想，他不愧为是广东省“八办”的人员，才能编出如此离奇荒诞的故事！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多麽希望幸福的日子重又会来，在孩子们的心目中，自己永远是一个正直成功的父亲啊！可惜自己辜负了家人的期望，走向了堕落和毁灭。但我认为，他的失足始于缺乏监督的制度和“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实际上，“八办”没有把最重要的人生道理告诉他：要做一个敢于替老百姓代言的记者，就不要一门心思去赚钱，只要有基本的经济来源就行了，然而，《文汇报》成立 30 多个驻内地办事处和记者站，究竟是为了什麽目的呢？是为了新闻报道，还是为了拉广告，给共产党的宣传机器筹集资金？唯其如此，出现关齐云的悲剧就不奇怪了！

据说，9 月 8 日，关齐云被广州市检察院押解回了羊城，正积极配合组织调查，详细交待罪行，他盼望自已最终能得到宽大处理，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对其涉嫌贪污公款 120 万元一案已侦查终结，并于 2006 年 3 月移送审查起诉，同年底判了刑。但我搜寻了很久，也没有找到最后判决的结果，更无法联系到他服刑的监狱，我希望香港《文汇报》不要冷漠，广东省委“八办”也不要翻脸不认人！他毕竟给报社做过贡献，一念之差犯下如此重罪，也是事出有因。另外，广东省委“八办”最好把“八”字改了！它和“发”是谐音，对关齐云的贪腐犯罪有暗示和鼓励作用！

陈建平去职之谜

---香港《文汇报》内幕之二

对于香港人来说，陈建平的名字并不陌生，他是藏在香港特首身后的重要智囊人物之一，经常和董建华，曾蔭权的大名一起出现在媒体上。据 2003 年 3 月 30 日的香港《文汇报》报道说，行政长官办公室近日公布，提升陈建平为行政长官高級特別助理，由 4 月 1 日起生效。他的职务是负责与内地政府和組织的联系，並且就行政长官与社区团体和各界组织联系事宜进行研究，以及提供意见。特首办指出，加强与内地的合作，是第二届特区政府的一项重点施政任务，行政长官办公室所涉及這方面工作的范围更广和责任更繁重。这一消息发表时，我还在狱中苦度铁窗生涯，直到 2009 年我来到加拿大，才在互联网上读到，大概没有谁会像我这样细心地把这篇不过百字的小稿反复琢磨了几遍，我感到惊讶，因为作为一个和陈建平打过交道，又同样曾是《文汇报》记者的人，我觉得，这样的文字，对中共严密操控下，在港生存的一张共产党的机关报来讲，是异乎寻常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最初的印象

我是在 90 年代初认识陈建平的，大约是在 1993 年底，即《文汇报》副总编刘永碧和王伯遥在深圳约见我之后不久，虽然他们已决定聘请我，但对我独当一面的能力还心里没底，故要我先挂靠在《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名下，开展东北办的筹备工作，确切地讲，是收拾关齐云亡命天涯后留下的烂摊子，好在，这一切并不牵扯到我个人，但结果并非如此，俗话讲：一年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由于关齐云的犯罪行为，影响了陈建平对我最初的信任，尽管他和我握手时连说了三个“你好”，语序很快，声音很响，但他的手握得不紧，我感到了隔阂和戒备，他随口讲出了我给刘永碧写信的内容，使我明白了他在香港《文汇报》的地位。毫无疑问，当时《文汇报》在内地共有驻北京，广州，深圳等 10 个办事处，他所执掌的权力和扮演的角色非同小可，北京办是举足轻重的，虽然广告额不如广州办搞得那麽多，但它的新闻报道任务却是异常繁重，至关重要的！或者说，在中共官员领导的《文汇报》内，能起到上传下达作用的，非他莫属。

陈建平是在北京饭店接见我的，先是在他们设在该饭店的一个大办公室里简短交谈，他说，他欢迎我加入北京办，东北地区的报道以前不多，他听说环渤海圈的省市正形成一个对外开放的新经济联合体，不论新闻，还是广告，《文汇报》都有许多事情可做，我为他熟知东北的情况而诧异和高兴，他还说，日本在大连建立了许多合资或独资企业，可以多做文章，他问我会不会说日语，我的回答令他失望。因为我是在文革中长大的，从 1966 年我 10 岁时到 1978 年上大学之前，可以说，我一直处于失学与失业的可悲状态，我怎麽能懂日语呢？我连英语都讲不好啊，我惭愧地说。他笑了，似乎对我很不理解，但表示能够包容，他还介绍我认识了年过半百的广告业务员张丽蓉大姐和戴某小姐，她们称我为姜维平先生，这种称呼对地方口音很重的大连人来说，是十分新鲜的。接着他又盛情地邀请我到北京饭店的高档餐厅吃饭，由他的得力助手，负责广告业务的北京办员工戴某陪同，这当然是表明，以后他会很忙，小事会由她指导我，也是暗示我，可以通过戴某给《文汇报》多介绍广告客户。《文汇报》聘请我，主要是为了拉广告，而不是做新闻报道，这一点几乎是每个国内媒体领导的通病。但我并不认同。故戴某的表现令我印象深刻。他当时 30 多岁，长得并不太漂亮，但能说会道，善解人意，对陈主任交办的各项任务都特别重视，她跑前跑后，十分殷勤，百问不厌，无可挑剔。我那时对香港媒体一无所知，对《文汇报》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和疑问，陈建平和戴某都耐心地给我介绍了许多情况，但唯独回避了关齐云经济犯罪携款遣逃的事情，使我迷惑不解。

那天，在北京饭店，我仔细地端量了陈建平，他是广东人，标准的精明相，个头矮小，

身体瘦弱，仿佛一股大风来了就能把他吹倒，但其实他是一个内心并不柔弱的，而且非常有心计谋略的人，他具有超人的判断力和凝聚力以及思维的定力，无疑地他是一个敏感的合格记者，但在中共的新闻体制下，他又不得不成了一位善于拉广告的生意人，这是由香港《文汇报》的性质所决定的。每个驻内地办站主任都逃不出这一命运！

另外，使我迷惑不解的是，《文汇报》家大业大的派头和排场，它仅仅是一张港报，却在首都北京最豪华，地点最便利的地方办公，虽然仅有一个大套间，但一年计算下来，也是租金价格不菲啊，我看到他们办公室的设备和用品以及陈建平与戴某两人的着装，想到新华社大连支社和《大连日报》的寒酸相，心中愕然，毕竟是香港的报纸啊！真是多大的生意，多大的排场，而且排场越大，人家越能把你看重！{后来才知道，他们租酒店不用花钱，是用报纸版面换来的，《文汇报》把这种经营模式叫作“对数”}

我很庆幸，有机会摆脱传统媒体的束缚，走进一个新的领域，见见世面，干一番大事业，但我初次与陈建平相识，讲话不多，只是带着耳朵听，我真的渴望跳出辽宁，到北京去跟他们做新闻，但显然这与总社聘用我做东北办负责人的目标不一致，故我们第一次的谈话，并没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我总是要另寻领域的，这不是雄心使然，而是重任在肩，奉命行事，我们彼此都知道，一山容不得二虎，故此，他对我略显矜持，此后我回到大连不久，和他还通过一两次电话，戴某给了我他住处的号码。他那时在广州，她妈妈先接的电话，又转给了他，但通话内容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妈妈的声音特别地甜美，或许是我过早地失去了母爱，才音犹在耳，刻骨铭心！。。。。。。但那时，我已经与新调进《文汇报》的驻海南办事处的林刚一起，写了大量的短新闻稿件，一时间占领了它的“中国新闻”版，并承办了大笔的广告，这促使社长早下决心，把东北办正式建立起来，我也尽快从北京办出走自立，因此，我和陈建平分手了，由同事，下级，变成了平级，虽然，我是小办事处的头头，他是大哥大，但我雄心勃勃，很想在《文汇报》干出点名堂！

鲁平的爱将

90 年代初期，香港还没回归前，内地的人，尤其是东北人，信息相当闭塞落后，对《文汇报》所知甚少，但对《大公报》略知一二，甚至连新闻界的人，也误认为香港只有一张报纸：《大公报》。1993 年初，《大公报》领风气之先，在东北长春成立了第一个记者站，由邵干当领导，他在《大连开发区报》首次刊登招聘广告，我欣喜地写信应聘。但他回信说已录用了孙玉光，不能再增加人手了。他了解了我的资历后，很是遗憾，给我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至今我还保留着。后来，我去办《文汇报》注册手续的时候，第一关是市政府外经贸委，负责立项的女士看了我的材料后，大惊失色，竟慌慌张张地赶去报案，说是有个香港的反动报纸派人要在大连注册，要建一个搜集情报的点，怀疑我是海外的国民党特务！。。。。。。她认为，除了《大公报》是党办的，其它统统是反动刊物，于是百般刁难，我就找《大连日报》负责外经贸工作报道的记者王梅帮忙，又找宣传部外宣处长王志强协助，才最终历时一个多月，盖齐了八九个印章，领到了《首席代表证》和工商局颁发的外企常驻大连分支机构的《营业许可证》，由此可见，当时《文汇报》东北办的创办落脚是多麽地不易！

陈建平与我不同，他身处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原本就有众多外国媒体常驻记者，各级官员见得世面很多，对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商报》等三家共产党在香港办的报纸并不陌生，因为北京的各大星级酒店和外企大都有这些报纸的常年订户。而且连香港发行量最大的《东方日报》，《苹果日报》也能看到。问题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总是一方

面，希望港报吹捧他们，一方面，又不断地做与普世价值相左的坏事，便经常打压批评他们的媒体，这就使他们陷入了自身的巨大矛盾之中，当《文汇报》等左报与他们保持一致的时候，他们给予资金支持，反之，就给予严厉的批评或打压，其主要表现形式是轻则撤职，辞退，重则拘捕，监禁，比如罗孚等人，就是典型的例子。

据我所知，“六四”之后，中共从反面吸取教训，在选派《文汇报》驻京办领导方面狠下了工夫，经过精心考核，任命了陈建平为主任，因为第一，他是中共党员，第二，他在广东省委宣传部是处级干部，第三，他做记者的综合能力比较强，第四，他和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很有私交，这最后一点尤为重要。鲁平与北京中南海的上层关系非同一般，他在处理回归前的香港事务方面，深得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赏识，所以，在香港出版的《文汇报》首先必须得到此人的支持，才能为共产党呼风唤雨，大造舆论，因此北京办事处主任陈建平，可能最初调进报馆，在《文汇报》的位置和作用，并不是特别重要，随着他多年在京城八面威风的工作，不仅为报社撰写了大量的稿件，而且积累了广深的人脉关系，甚至直通中南海，这就使远离北京的香港总社的社长，总编等人都敬他三分，一来，这些领导的任命来自上级，他们名义上归国务院新闻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直管，其实，谁在中南海有后台，谁就说了算，而北京办事处主任最有这个游说的便利条件。他的言语对社委会的人事任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所以，陈建平在《文汇报》很是风光了几年，对此我知道的只是皮毛，而且 94 年我正式进入《文汇报》之时，陈建平的影响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从此而衰！其鼎盛的故事可举一例，《文汇报》一位领导告诉我，陈的太太身患绝症，曾由某人介绍，从北京搭飞机去英国伦敦某医院求医，此飞机竟是专机。多年来，我一直不相信一个记者会有如此大的神通，我则倾向于另一种说法，他可能搭乘的是某领导人去伦敦公干的专机。既便如此，也足以说明陈兄的能量之大！

从陈建平对李肇星的评价，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据报道，迄今为止，李肇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部 20 位发言人中任期最长的一位。从 1985 年开始，到 1990 年，整整 5 年间，他频频出现在中外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而此间他和陈建平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李肇星一度还以外交部部长助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发言人。他总是把一些重要新闻事先透露给陈建平，再通给香港《文汇报》影响整个世界。后来，作为中共十三大和七届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的组织者，李肇星在中外媒体记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陈建平曾这样评价李肇星：在 170 多名外国和境外驻京记者面前，李肇星总是能以一个让人接受的形象出现，他跟你交往就像朋友。这实际上，是陈建平个人的并不全面的感受，只能说明他和李肇星是好朋友而已。

不仅如此，除了与鲁平，李肇星等有私交之外，陈建平还与香港很多亲共的亿万富豪以及国内的大老板关系密切，特别是一些中资机构派驻香港的各种名义的企业，办事处，分公司领导等来往频繁，故他的人脉资源，在左报记者当中并不多见。所以，我到《文汇报》之初，陈建平在 10 个办事处主任当中，给它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他不把类似我这样的来自基层的小主任放在眼里，故许多办站领导对他颇有微词，但社长张云枫谈起他时，都以“建平”相称，显得非常亲切。这一切，一方面给他日后担任香港特首的助理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他自已与大家产生了隔阂。而往往值此之时，春风得意，无暇旁顾，灾难就会静悄悄地走来。大约在 1994 年，陈建平就是这样遇到了人生的“拐点”。这种突发事件，颇为类似我入狱前的 1999 年底与 2000 初。只是他比我走运而已。

报道闯祸

人们常讲，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中共就是这样的庸人群体，原本，只要是媒体，不论是什麽背景，无论谁是老板，只要推上市场，没有一个不应和读者口味的，换句话说，必须要抓新闻，尤其要抓老百姓感兴趣的东西，这样的稿件才能吸引读者，卖得出去。《文汇报》也不得不如此，偏偏那时，邓小平重病在身，老态龙钟，他最后一次集体接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在 14 大闭幕之后，看上去他明显地衰老了，因此，直到 1996 年去世之前，海外不断有媒体拿他的健康说事，为了对外辟谣，也为了表示《文汇报》的权威性，或显得陈建平消息灵通，有一次，刘华清陪同邓小平在青岛或威海观看海上军事演习，此事被《文汇报》以几百字的篇幅披露了，这当然石破天惊！如果在西方，国家领导人整天都在电视上，他出行做事，谁爱报谁报，领导人不敢放一个屁，因为他是老百姓投票选举的，唯有中国不行，那些深藏中南海皇宫的老人都把自已当成了至高无上的皇帝，他打个喷嚏也成了国家机密！

陈建平没想到喝凉水塞了牙，他使《文汇报》闯了大祸。据说邓小平，江泽民震怒！国安部把这篇报道称为“严重的泄露国家机密的行为”，不仅要追究社委会的责任，而且要立即拘捕记者陈建平。北京办事处记者一位知情者在 1999 年 10 月，即我去加拿大度假之前向我描述说，国安部的特工兴师动众地赶到了《文汇报》新址，那时《文汇报》已不在北京饭店办公，其投巨资购买了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85 号的京宝大厦 418 室办公，警车对着它的窗户，就停靠在马路边上。幸亏那天陈建平外出开会，恰好不在房间，并且第一时间得到了拘捕他的消息，他立即坐上飞机，跑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去了，不知藏在哪家酒店，反正连张社长都找不到他的影子。假如他当时被抓住了，进了法律程序，如再释放就很困难，中国的事儿就是这样，因为那时邓小平还有一口气，江泽民看他快死了，不想让别人以为他还能影响政局！这真是《文汇报》拍马屁，拍到了蹄子上，不但没受表扬，还倒了大霉！被狠狠地踢了一脚！

立即《文汇报》高层干部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把责任推到陈建平一个人身上，要抓要判，他自身负责，这颇为类似我坐牢之前的情况：文汇报声明我已离职，并不承认我批评马向东的新闻稿是首先在党报透露的。陈建平还不错，《文汇报》还没来得及对他进行组织处理，事情就有了重大转机。最可笑的是，以前与陈建平是铁哥们的《文汇报》办公室主任刘某昌，在接到陈从内蒙打来的求助电话后，不是积极想办法救他，而是落井下石，第一个跑去向上级报告他的行踪，并积极参与对其的整肃，幸亏那时电话监听的技术还没有达到卫星定位的水平，否则，陈建平与我一样，难免牢狱之灾！刘某昌之流的忘恩负义之举，在我刚到《文汇报》工作之时，私下颇为流传，但他满不在乎。这时，反倒是香港《文汇报》老前辈刘锐绍在“美国之音”节目中为陈建平的新闻报道辩护，认为报道军事演习是正常之事，不应当受到打压。他比指责别人是“敌对势力”的那些《文汇报》领导还有人情味和正义感！我当时在深夜收听了这一节目，禁不住感叹唏嘘。人生是多麼变化无常啊！

记得，我有一次去香港开会，见到了来自北京办事处的戴某，也就是当年围着陈建平团团转的那个女人，我很关切地问他建平的情况，虽然我与他只见过一面，但我为未能回请他而深感惭愧。我说建平没事了吧？！不料戴某冷冰冰地说，我不知道！就这麼一句，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提起他，如同关齐云一样，我立即产生了一种兔死狐悲的失落感，我对我的一个同事说，如果有一天我遇到这种事，也会这样吗？。。。。。。后来证明，《文汇报》内部的员工，如此薄情和冷漠的人不少！

现在回想，陈建平真是太幸运了，在我入狱前，已有《明报》记者席杨等多人报道闯祸，因言获罪，其罪名无一不是所谓的“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陈建平多亏有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等高官千方百计地保驾护航，他本人又精明地在远离京城的外地躲了半年，直到一切都摆平了，他才灰头土脸地出来协调，但《文汇报》在上级的压力下，做了集体检讨，把陈建平辞退了，但为了虚伪的面子，如同对待我一样，让陈建平写了主动离职的申请，从此《文汇报》与他撇清了关系。刘永碧亲自跑到北京代理了办事处主任，直到曾书万上任才回香港。听说，《文汇报》还为陈建平带走自驾的汽车而恼怒，在它的归属问题上，陈建平与港馆发生了分歧与争执，后来也不知道如何解决的。反正双方很不愉快。大概《文汇报》如能预料日后他能随董建华高升当特助，就会慷慨大度一些吧！

我最后一次见到陈建平，大约是在 1999 年，地点竟是香港北角的殡仪馆，《文汇报》财经新闻部的主任陈坚明在美国采访期间心脏病发作，忽然猝死，其出殡时刚好我在香港，虽与其只见过两面，但他的两撇小胡子和蹩脚的国语令我难忘。我赶去为其送行，不料在追思会上，竟看到了陈建平，他匆匆地赶来向老同事鞠躬道别，没有一个《文汇报》的领导主动和他打招呼，仿佛不认识他一样。我挤在一个角落里，黯然神伤，因那天人太多，行动不便，已无法和他寒暄。可见，他还是一个很珍惜情义的人。这或许才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

当上特助，令《文汇报》尷尬

人生真是难料，谁也想不到，被《文汇报》冷落了几年的北京办事处主任陈建平，经过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忽然名子登上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官的行列。1997 年，他出任特首董建华的特别助理。实际上，在这之前，他已默默运筹了许久，他先是参加了由邵友保等港商搞得“香港明天更美好基金会”的活动，和资金雄厚的香港大财团交往很好，又通过以前中南海的老关系，把自已推荐给了董建华，据说，这使《文汇报》非常尴尬，最初他离职时，谁也想不到陈建平还有今天，要知道，特助是新闻信息最灵通的人士，作为一张港报，多麽需要他的支持啊。可惜，由于“六四”以后《文汇报》的领导层，已经没有了敢于“开天窗”的李子诵式的人物，剩下的人已被吓破了胆，他们失去了远见，在陈建平的问题上吃了大苍蝇，所以 2000 年底之前，香港很多报纸都披露了特助陈建平的年薪，以满足读者口味，唯有《文汇报》装聋作哑，令人匪夷所思。

据黑龙江新闻界知情人士披露，每年冬天，陈建平都会约上香港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一同到哈尔滨观赏冰灯和滑雪，但他见到新朋旧友从来不提《文汇报》一个字，如果谁谈及《文汇报》，他也沉默不语，但很多人都知道他过去是北京办事处主任，1994 年，在我接任东北办首席代表以前，黑龙江省的新闻，是他的报道范围，他每年都到这里参加由哈尔滨政府举办的冰雪节开幕式。他之所以不对《文汇报》评价，是因为心灵受伤之深使然，以致语言难以形容其感受。一个堂堂的北办主任，不仅为报社四处奔波，筹集资金，办理优惠政策手续，购买了新的房产，彻底告别了《文汇报》驻京办寄人篱下的历史，而且为社长总编等人办成了无数件好事，其中有的受惠于组织，有的得益于个人，或二者兼之，比如，江泽民的心腹是滕文生，他的儿子滕某即被陈建平调入办事处工作，等等，还不算每年编发的吹捧共产党的数百篇文章，为党的喉舌承办的上千万的广告款，只因一篇巴掌大的小稿，《文汇报》就与他翻脸了，确切地讲，是共产党对他翻脸不认人！我想，一方面他看透了这件事的本质，很是伤心，一方面又要继续享受经济繁荣的物质生活，很是无奈，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憋着一股劲拼命干，才爬上了香港特助的位置吧！

据香港新闻界朋友透露，最初《文汇报》高层不好意思找他办事，以为董建华任期满了，他或许就离职了，但不料，到了曾蔭权时代，他不但保留了特助职务，而且还官升一级，继续成为新的特首的“政治设计师”，据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新任行政長官曾蔭权 6 月 24 日在北京宣誓就职，在先后与总理溫家宝和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会面中，留給香港市民最深的印象是，他說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感谢中央的信任”。在北京期间，这句话，他前后讲了几遍。而且，6 月 23 日中午当飞机抵达北京机场时，他走出机舱，一路小跑前去与接机的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握手。 香港媒体指责曾蔭权如此表現说，到底是他本人要向北京高层表现出谦卑和忠诚，或是他的助手給他的建议？曾蔭权此次上京，隨行人员中包括被认为是其“政治化妝师”的行政长官高級特別助理陳建平。这位董建華留下來的“老臣”，由于其具原大陆官方背景，相信是曾蔭权此次北京之行的主要故问，少不了也教了他上述与中央领导人接触的“招数” 。我不敢断定这是陈健平的点子，但据我对他的了解，他肯定赞同曾蔭权这样做，因为陈建平虽然受到《文汇报》的冷落，也险些坐牢，但他毕竟化险为夷，他依然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故他对《文汇报》是爱恨交加，他既知道该报的党八股德行，也需要共产党的喉舌为特区政府唱赞歌，所以，他们都是同样尴尬的。

陈建平不是特务

据香港媒体报道，陳建平是在 1997 年香港回归之前，由北京国务院港澳办前主任鲁平推荐，出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特别助理的，从此进入港府建制之内，一方面协助董建华处理与北京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北京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里的耳目，更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监视和牵制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的作用。这说明写这篇报道的人，不太了解中共和陈建平，共产党对香港的控制早已深入骨髓，没有必要用陈建平这样知名度高的前《文汇报》记者代劳。如果他是特工，起监视作用，那麼 90 年代初，安全部抓他干嘛？监视他的人，不必明睁眼露地呆在曾蔭权身边，这是技术手段的常识性问题。

我的理解是，陈建平在记者岗位上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太重要了。不论是董建华，还是曾蔭权，都不能按照内地人的价值观和方法去协调，而陈建平具备这个能力，又会保护这些资源，从而表现出他得心应手的综合能力，谁会不用他 呢？至于刘淑仪，她是前《明报》助理副总编，她熟悉的是香港社会各界事务，与陈建平相比，是南辕北辙，正好形成双飞的两翼，而林焕光等人更与他不能同日而语，岂用多言？

所以，担任行政長官特别助理的陈建平，不仅是给特首草拟发言稿，而是政治上出主意，行动上牵线搭桥，至于被媒体责为讲稿“字里行间可以发现相当浓厚的内地风格”，则是表面文章，何足挂齿？我们可以看到，6 月 23 日，曾蔭权赶到北京宣誓就职时，温家宝总理向他颁发任命令并监誓。新闻公报称，陪同的官员有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新闻处处长蔡莹璧、行政长官私人秘书叶文辉、及高级特别助理陈建平。而后来的许多次重要会议，比如 4 月 21 日的“海南省博鳌亚洲论坛 2008 年年会”等。人们都可以看到陈建平不离左右的身影。

不论如何，在陈建平的内心深处，肯定保留着一个角落，那就是：“六四”！他绝对不会赞同屠杀，正如他不会接受国安部对他的拘捕一样，所以当《人民不会忘记》一书再版时，他并没有反对编者的善意。20 年前，64 名曾采访过北京民运的香港記者，为了让历史记住这件大事，迅速集合起來，将大家所了解的北京民运始末，綜合报道，組成一幅综横交错的

“京城变乱图”--《人民不会忘記》，於 1989 年 7 月底面世。当年十二月又出版了增订版，销售总数超逾五万本。由于此书早已销售一空，因此多年来书店内均无本书踪影。为了让年轻一代认识此事，《人民不会忘記》编輯委员会决定籍 20 周年的机会，再版此书，销售收入会拨入香港記者协会下属的“人民不会忘记基金”，用作促进及推动中国和香港新闻自由及出版自由之用。这 64 名記者中，就有《大公報》的陳杰文和《文汇报》的陈建平、刘鋭紹等人。

我最后一次和陈建平联系是在 1999 年，记得在香港逗留期间，我主动打电话给他，表达了回请他喝茶的愿望，他最初答应了。后来因为要随特首出行，不得不取消，我相信他不是敷衍了事，因为我当时还在体制内，但愿他后来听说我被捕坐牢的消息时，能够感到同情，而不是庆幸。我指的不是他在香港的与我见面，可能那时我已进入了国安特工的视线，而是说，他当初也是因言去职，与我不同的是，他有上面的高官鲁平做主！我则形单影只，身陷囹圄，实际上《明报》的夏泰宁等人均有类似危险，只是未做公开报道而已。这正说明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故此，我希望陈建平能够利用他的影响力，推进香港和内地的法制与民主，推动中国的政改和新闻自由，而不是相反，否则，他就是自打耳光！就是帮了当年赶到北京办事处去抓捕他的国安特务的忙！

我还要告诉他，一个布满了特务的国家，不是一个令人有尊严的国家；一个动辄使记者失踪，被迫离职，或坐牢，非正常死亡的国家，是一个必将在人民的怒吼中崩溃和动乱的国家！陈建平与我，或许会看到这一天！我的不幸是，始终尽力而为，但失去了物质利益，他的不幸是，曾经努力了，但嘎然而止，他遗失了最宝贵的精神追求。



左，文汇报副社长刘永碧，中，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右，姜维平，1998 年摄

沙发事件

我自报家门，应聘进入香港《文汇报》之时，正赶上一个绝好的难得机会，刘永碧的先生刘芳安，调入新华社香港分社当宣传部副部长，她调入《文汇报》任副总编，负责对外联络，主要是内地办站业务，她急需我这样没有任何人事背景的雇员，为她分管的工作锦上添花，而且，她原和先生均在新华社比利时分社当驻外记者，我也在新华社辽宁分社短期工作过，故她相信我的能力，但实际上，《文汇报》内地办站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该媒体和《大公报》等可以在内地出版发行的特权，不遗余力地拉广告，筹集对外宣传的活动经费。最初，我并不知道他们这个目的。我的理解是，《文汇报》很有经济实力，只不过对我还不太了解，不太放心，才让我个人先垫付费用，把办事处建立起来的，我大概预先支付了 5 万元左右。主要是使用大连税务局属下的唐山街宾馆一个房间的租金，和电话费，交通费，以及办理营业手续，购买办公用品费，等等，后来大约在 1994 年底，《文汇报》委派发行部的刘史鸣，编辑部的何亮亮先后把钱归还了我。{那时，何亮亮还没去凤凰卫视任评论员，他在《文汇报》任主笔，我听说他是著名散文家何为的儿子，很是敬佩}

1994 年 11 月，刘永碧和陈桂雄一同来到大连考察，见到了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并赶到我的家里，探望了我的太太和孩子，才彻底地放心了。回去不久，就由总社投资了 60 多万元，购买了奥迪房车，复印机，打字机，传真机，手机等设备，这些东西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奢华，我聘请了专职司机，又学会了驾驶，单单奥迪 100 型轿车，就支付了 30 多万元，这是当时大连所有外地驻连记者站里最好的座驾，并且还挂着黑色牌照，即外商驻连企业的标志，我充满了自信，打算在新闻报道方面做出一番事业来，于是，我通常连周末也不休息，拼命地工作，我记得最初半年，几乎每天《文汇报》的“中国新闻”版都有我撰写或编发的稿件，那时，外商对大连很感兴趣，大连内地企业纷纷对外招商，故各种新闻发布会或洽谈会很多，我忙得不亦乐乎，但《文汇报》并不满意，后来，我听广告部的经理杨某敏说，刘永碧从大连回到报社后，立即主持召开了社委会，决定先大举投资，但一年内要给我施加压力，尽快通过拉广告，收回投资，这使我颇为不快，因为我不喜欢这样做，但那时国内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把宣传报道和广告联系在一起，记者和业务员融为一体，这样做虽不令人奇怪，但并非我的情愿。就我个人来讲，我的特长是做记者，而不是做生意，如果为了赚钱，我就在深圳下海了，没有必要再到《文汇报》求职。

然而，报馆不这样想，在 1995 年初，《文汇报》的主要领导给刘永碧施加了压力，对刚成立的仅有两人的东北办，下达了营业额 100 万元的广告指标，我深感难过，一方面要采写新闻报道，一方面还要承担广告任务，事无巨细，都要认真面对，我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患上了萎缩性胃炎，但刘永碧对我并不满意，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通过“沙发事件”集中表现出来。

有一天，她亲自打电话指示我，为了节省费用，要把北京办事处搬家淘汰的几件沙发给我们，并让我联系车辆去拉。从大连到北京路途特别遥远，单是租车费就比新沙发还贵，所以，我向她讲明了理由。我建议在大连买一套新的皮沙发，它不过 800 元，但如去北京却要支付车费 1500 元，还需浪费时间，何况拉回的还是旧家具，但刘永碧情绪很激动地批评我浪费，说我不听话，我这才感觉她是一个非常固执的女强人，她决定要办的事，我们下级必须执行，我只好同意，并花费精力找人去北京，这时，正好有一个中学教师叫陈某，他与我熟悉，其儿子有一辆货车，他要价较低，愿意跑一趟，我只是担心路上安全的事情，正在商

讨，总社外联部主任陈某雄又来电话说，刘永碧下令必须立即出发，我立刻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还不错，陈某和儿子跑了两天两夜，总算没出车祸，把沙发拉回来了，我支付了他们的交通费，但由于我的办公室在大连天河公寓的 18 楼，沙发到了楼下，还需要找人扛，我又花了 100 元，这钱只能由我自己掏腰包。因为没有发票。

我面对款式陈旧的一套棕色组合沙发，想了很久，叹息再三，我们如此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刘永碧为何要这样做呢？直到 2000 年 12 月 4 日之后，我进了监狱，在没有书和报纸，单独关押的日子里，我无聊地苦思冥想，才悟出道理：可能我被聘进《文汇报》的事，引起了有关方面的争议，这些单位包括大连市委，辽宁省委和中央外宣部门，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等等，特别是办事处购买了奥迪房车，某些人眼红，对我能否为报社赚钱，筹集外宣资金的问题，产生了怀疑。刘副社长迫于压力，回应议论，故意用“沙发事件”教训我，她也是给大家一个姿态看吧！

提前巴结薄熙来

现在，香港人经常说，《文汇报》消息灵通，因为它是共产党的海外宣传阵地，我并不这样认为，他有时是灵通的，有时适得其反，中共既然对他严密操控，就一定要愚弄它，中共高层的内斗和政策变化决定了它的阴阳脸，它的嘴大，但刮风还是下雨，全在于上面发话，而老总们升降起伏的命运，就掌握在中南海的领导人手里，所以，出现了“提前巴结薄熙来”的闹剧。

大约在 90 年代后期，有一短相当长的时间，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风传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领导要换人，这个即将上任的社长是大连市长薄熙来。最初，报社领导问我此事的准确度，我没有第一手消息，不敢乱下结论，但我与大连金石高尔夫俱乐部的老板任某良来往密切，他曾对我讲，薄熙来最想当的官职是外交部长，他还告诉我，自己在美国洛山矶已买了房产，还入股了美国某报，而他原为薄熙来支持起家的大连民企老板之一，据称其与谷开来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两人有生意上的交易，故我相信薄熙来对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兴趣，不会比外交部长大！但中南海的风云变幻，谁能把握呢？我向领导坦率地谈了我的想法，并深知他们的焦虑：如能在薄熙来履新之前，以示效忠，就是一笔最佳的感情投资！自然等薄熙来当上社长之后，作为部下，他们将受益无穷。

事有玄机，刚好大连代表团要去香港访问，我们刊登了许多报道，也搞到了大笔招商广告，报社领导非常满意，就叫我去香港述职，也获悉了滑稽可笑的一幕：薄熙来下榻在一家五星级大酒店里，他的太太谷开来随行，也成了他最信任的秘书，为他守住通往薄熙来房间的入口，以防它人暗害或打扰。

那天上午 10 点之前，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为准，《文汇报》领导层的所有干部，来到了薄熙来的住地，其中有社长张云枫，总编辑刘再明，副社长张清云，刘永碧，王伯遥等，而刘永碧的先生是新华社宣传部副部长刘芳安，张清云的太太是新华社宣传部副长周珊珊，张社长是老地下党员，刘再明原任南方日报总编辑，总之，这些命运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媒体人士，恭恭敬敬地等候在酒店的大堂里，虽然此前已电话约定了准确见面时间，但薄熙来的人品决定了他接人待物，迎送往来的行为方式，对高过自身地位的上级，卑躬屈膝，对低于自身地位的人，则趾高气扬，他把这些在《文汇报》内部以及香港新闻界闻名遐迩的文人视同草芥，故有意延误接见他们的时间，以示尊贵。

据消息人士透露，薄熙来让他们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既使应秘书之召，他们走上了楼梯，走进了薄熙来下榻的豪华套房，依然受到了侧房守卫，薄的太太谷开来的百般讯问：你们事先约好了吗？那声调，语气，身体语言和表情动作，都令张社长等人十分尴尬，终身难忘！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难缠的女人，她既不想放弃财富，又不愿舍弃名声，她把薄熙来的权势和高位像油一样榨干，多年来为自身捞取经济利益，她把伪善和贪婪紧密地连在一起，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而这些自命不凡的媒体人士，在她心目里的位置是多麼渺小与卑微，可想而知。所以，一位参加了会见的领导对我说，你看他太太那个样吧！。。。。。。实际上，这次拜访是一个缩影和象征，《文汇报》即使在海外，也和国内媒体一样，他的社委会领导对上级点头哈腰，亦步亦趋，战战兢兢，而掉过头来，他们对待部下呢，又是另一幅嘴脸，当然这些报社老总里，还是有一些品质不错的人，我不敢一概而论。

我只是强调，张社长等人曲意奉承薄熙来而已。据称，薄熙来不冷不热地接见了他们，也知道了这些报人的用意，他故作高深，引经据典，海阔天空地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对《文汇报》的重要性一再强调，并对驻东北办的工作充分肯定，这使我在报社领导的心目中，得分不少，但是，反面消息正在我的脑海里酝酿，他们都不会料到，几篇揭露薄熙来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丑闻的稿件即将出炉！

事后，一位参与者开玩笑地对我说，早知他当不上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拜访他了！要知道，我们也很忙啊！是啊，为了生活，这些党报的老总也是对他虚情假意，正如薄熙来一样，这一点正是后集权时代，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典型特征。它预示着一个社会转型的开始和专制时代的结束。

谁把闻世震书记骗了

关某是沈阳一个颇有活动能力的年轻人，他时年二十几岁，以招揽报纸广告获得佣金为生，在我认识他之前，他自称曾在《沈阳日报》广告部当过业务员，他主动给报社领导写信自荐，并承诺给《文汇报》一笔广告大单，于是，刘永碧和陈桂雄一同来到了沈阳，我则从大连乘火车赶到省城，也很快读到了这个人写的信件，他说，他和闻世震的秘书窦某很有交情，已经在他的帮助下，以《文汇报》的名义，给省委书记发了公函，闻世震作了重要批复，即他欢迎《文汇报》共出十个版面，宣传和报道辽宁省的国企改革，关某吹嘘道：假如一个版给五万元广告费，就是五十万啊！。。。。。。就是这个诱惑人的画饼，把刘永碧砸晕了！

我当时是新任的驻地办事处主任，对他这种诈骗行为十分警惕和愤怒，我首先是震惊，作为辽宁省委书记，怎麽会在一纸没有公章的信函上批示？而他的秘书窦某，为何积极配合关某的犯罪行为？我对刘永碧说，闻世震是一个粗心豪放的北方人，他的心灵很纯净，他不会怀疑这信是假的，也急于求得《文汇报》的支持，故出了大笑话！我们必须揭露他，以正视听，但刘社长的回答令我目瞪口呆，她说，虽是假的，但对报社有力，我们来见闻书记，反正也需要这个公函，他批示同意做《辽宁专版》，而外宣经费是下面人操办的，如你接着搞下去，拿这个批件压服他的下级，一下子就赚它五十万元不好吗？！陈桂雄也说，你太书生气了，你刚来《文汇报》，你只知道写新闻不行，还要拉广告啊！他是假的，但有效益。他帮你拉广告，难道不是好事吗？刘永碧见我依然想不通，就不耐烦了！她说，我们来采访闻书记之前，社委会已经讨论过，这信就是真的！你必须服从！。。。。。。于是，我们拜访了闻书记，刘永碧主动提出了系列专版的事，闻书记高兴地说，辽宁的国企改革急需香港《文汇

报》宣传，因为我们的改革，困难主要有两点：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这两个方面如果让海外各界知道了，就会投资建厂，就能帮助我们解决大问题！。。。。。我作了详细的采访记录，后来发表了人物专访，这一点刘永碧等报社领导并不太看重，她求之不得的是广告费，但又不便直说，那时，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正生她的气呢，就装聋卖傻。我心想，一个省委书记，怎麽会同意搞有偿新闻呢？

随后闻书记请我们吃了丰盛的饭菜，但在酒桌上，刘社长只是委婉地再次提到了"辽宁专版"的事，大智若愚的闻世震故意不表态，而事后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官员张某库也不具体落实，因此，我很开心，刘社长等人却很扫兴。我说，这种招摇撞骗的人，社会上很多，切不可为一点蝇头小利而忘大义，要拉广告可以，应当和专访新闻分开，并和人家直言花钱的事，否则，就老老实实地写报道，等报纸讲真话多了，买的人多，影响大了，求登广告的人自然也就来了！何必骗人骗己呢？但是，刘副社长把我的肺腑之言当作书生之见。他们还提议我考虑关某自荐加盟《文汇报》东北办的事，我没有表态。等社长走后，我对关某说，你是个王八蛋！你骗术再高，只能骗一回！既使闻书记批了 100 万元，我也不敢要你这样不诚实的人！。。。。。自此，他从我的视野中永远地消失了！

省长高严调戏女社长

还有一次，我在沈阳迎候刘永碧，她先是在北京整顿了《文汇报》驻地办事处，后要与我一同去长春拜访省委书记何竹康和省长高严，但她不敢坐飞机。我说，我命不值钱，我不怕死！于是我提前飞抵了长春，并有机会与吉林省委的某几个官员聚餐，东北人酷爱喝酒，还以酒量大小考察客人的诚意，我继承了父辈海量的革命传统，故酒桌上表现不俗，那些整天沉醉于酒色之中的官员，对我解除了戒备，他们告诉我，省委书记何竹康还为人处事比较老实，而省长高严则吃喝嫖赌，贪污受贿，无恶不作，并讲了许多令人喷饭的小故事，这几个官员认为，东北就这个社会风气，吃喝玩乐没问题，但切不可调戏良家妇女，言下之意，省长高严做得太过分了！。。。。。

次日，我们的刘副社长到了，他乘坐火车太慢了，但比较安全，我开玩笑说，先来了一天，不长，但有机会知道了许多关于高官的内幕，但我没讲高严的绯闻，因为刘永碧是我的上级，也是我尊敬的老大姐，我只说吉林官场如战场，有许多尔虞我诈的故事，她很能理解，她说，在一般的情况下，党政主要领导之间都有矛盾，我认为中共这种制度设计，就是为了叫他们闹分裂，这样互相告状，互相监督才好。但当我们见到何竹康和高严时，意外地感到他们配合得很默契，似乎团结的不错。

在此之前，大约在 1994 年底，我曾与《文汇报》主笔何亮亮，摄影记者冯翰文一同采访过何书记，故这件会面算是再次重逢，不过省长高严则是初次相识。我记得是在一家豪华餐厅里，刘副总编和他们轻松交谈，何书记身材瘦小，但思维敏捷，行为拘谨；高严中等身材，大腹便便，言行粗俗，有一双色迷迷的大眼睛，他注视着刘社长的表情，令人很不舒服。

饭菜摆满了圆桌，何竹康介绍了当地出产的一种鹿鞭酒，它呈现古铜色，质量非常好，我知道，吉林产鹿，而鹿鞭是滋补佳品，用这个地方特产款待客人，是表示真诚，他给每人倒了一杯酒，省长高严也不例外，他还笑呵呵地说，老高是海量，《文汇报》的领导来了，应当多喝几杯啊！

这时，刘永碧抬眼去看她，并说，你们多喝吧，我不能喝酒！高严竟说，何书记啊！这种酒是壮阳的，我老婆也不在长春，我过单身生活，你让我喝了怎麼办啊！。。。。。。说完，自我解嘲地，放肆地哈哈大笑，我这才仔细端量他那张红紫的脸和带血丝的眼睛，他一边这样讲话，一边用眼角扫视刘社长。显然，昨日人们所议并非空穴来风，他是在暗示和调逗女记者，好在，我们的刘副社长已年过五十，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但走南闯北，洁身自好，她从来不做向官员投怀送抱，换取钱财的事，她是一个非常保守而矜持的女人，高严见她木然冷漠的神情，不料碰上了软钉子，也不再发起进攻。何竹康以吉林省经济上的资源优势为吸引，转换了话题，为他们解了围，但高严还是不时插话，逗趣，谈天说地，东拉西扯，但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讲的低俗笑话虽然不雅，但把大家都逗笑了，使饭局的气氛变得很轻松。。。。。。后来，2006 年初我获释后才听说，高严在 2002 年 7 月任国家电力部党委书记时，伙同情妇杨某带了一大笔巨款，瞒过了中南海，跑到澳大利亚去了，从此滞留不归，也有人说，他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寓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这一切富有戏剧性的传奇，似乎很突然，但我认为，早在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从他对刘副社长的轻佻态度，窥视了他的灵魂。他是一党执政的制度下，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而堕落的一个色鬼，这样的一尊行尸走肉，为了个人的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把人民的血汗钱，毫不犹豫地私吞而亡命天涯，一点也不奇怪。而荒唐的是，他有更大的中共官员李鹏作靠山，有资本主义的假民主制度收留他，而肩负舆论监督职能的《文汇报》，对此视而不见，却和国内媒体一样集体割喉与失声，连争强好胜的刘副社长，也对高严不敬的言词忍气吞声，难道不令人扼腕叹息吗？！

香港文汇报内幕之四：哭天抹泪，真是省委书记二奶？

L 女士到底是否是辽宁省委书记 G 的二奶？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久，在 90 年代初期，《文汇报》驻东北办成立开始时，我急需人才，报社计划要成立三个分支站点归我管，即驻辽宁省沈阳，吉林省长春，黑龙江省哈尔滨记者站，人员分两种途径选定，一是我公开登报招聘，二是报社领导通过自己的关系推荐，但不论如何，我是首席代表，都要我审核满意才行。L 女士是辽宁省委书记 G 选出的，并通过省委宣传部发函报社力荐，故社委会十分重视。副社长刘永碧是这样介绍 L 的：女性，年纪 52 岁，以前没做过新闻工作，但性情十分开朗，交际能力超群，在沈阳某国企任宣传部官员，是党员，对省委省政府特别了解，和某书记关系很好，等等，她又通过外联部主任陈桂雄告诉我，不需要你考察了。这个人上面已经定了。她近期去大连拜访你，你要好好接待，我问：她没当过记者，能行吗？领导说，上面说定了，你不必怀疑！我当然不敢有抵触情绪，但我很担心领导不了她，因为我从未见过 G 书记，也不了解 G 书记推荐的女能人，我也不是党员，对党委宣传部长的工作，也不便评估！故我有些不快，陈主任在电话里安慰我说，你的特长是写新闻，她的长处却是能拉广告，报社调她进来对你有利啊！我只有点头称是。话音刚落不久，自称姓 L 的女士，以大姐自居，就和我电话约定，次日见面，并说她老公亲自开车来大连看我，几句话就把我的疑虑冲淡了。

我至今还记得她银铃般的嗓音，和一口一个“大姐”，“老弟”的甜蜜称谓，那时，我是一个很容易被感动的人，我非常高兴地在大连的唐山街宾馆第一次与其相识，别有一种相见恨晚，一见如故的感觉，她太能讲了，她几句话就能使一个陌生人信任她，虽然她长得并不漂亮，甚至显得姿色有点过早地衰老，但她善解人意，体贴入微，不得不使我解除了对她的戒备，她在沈阳，我在大连，各有分工，她与省委关系越好，对我以后开展工作越有利啊！

而且，他的先生特别纯朴，始终对我没讲一句话，只是傻笑，她介绍说，他是某机关司机，他们感情很好，她说他开了 5 个小时的车，没喝水也没停，就想早一点见到姜主任，见到了就是缘分，有了缘分就是姊妹。于是，我连声称谢，又在饭店请他们吃饭，还在他们连夜赶回去之后给陈主任汇报了情况，我兴奋地说：我很满意，又有了一个好同事。

但是，从此，新成立的办事处就变得并不平静了，再加上吉林省委宣传部推荐的 L 女士，也大概如此，我遇到了同样的难题：独立。最初，她们在没认识总社领导之前，对我很客气，但后来就矛盾重重，她们都要求自立门户，单独核算，直接归总社领导，我生性没有权欲，总想写点东西，当然也同意她们分离出去，以求清静，问题是领导最初都愿意由我分管东北，这并非完全是信任我，而是过多的分立账号深藏危机，关齐云事件就是前车之鉴，他们对两个女将还想再考验一段时间，于是，我们在深圳的一次会议上发生了冲突。

大约是 1996 年某一天，报社召集全部内地驻站负责人云汇鹏城，研讨各项工作，非常奇怪的是，既然东北办依然领导新成立的沈阳，吉林两个记者站，何必让她们远道而来开会呢？我深知独立是早晚的事，越早我越轻松，故我漠然处之。在会议间隙，我见到了 L 某，她完全地变了，不仅对我十分冷淡，而且什麼也不和我汇报，特别是此前，我去过沈阳，省委的朋友告诉我，她真的和 G 书记过于密切，我问：可能吗？她已经年过半百啦！那人说，在六十多岁的老 G 看来，她正是最有魅力的年代。。。。。。而且，又有人证实，她已经离了婚，我立刻愕然，我想，这种关系，何谈舆论监督呢？我越想越生气，气不打一处来，小会结束时，我躺在房间了生闷气，想心事，忽然，L 女士敲门走了进来，她微皱着眉头，脸色红红的，表情很不自然，她声音不大地说，刘永碧批评了她，要她来找我解释，文汇报东北办归我管，她必须服从我的安排。。。。。。我告诉她，问题不在这里，我们是一张报纸，不是省委机关下属处室，必须与其保持距离，广告要做，稿件也要写，而你连新闻稿都写不了，怎麼办？我真的领导不了你啊！她听了，扭头就走了！十分钟后又回来，给我送来了一盒礼品，里面有什麼也不知道，而且进门就哭天抹泪，她说：如果我不收留她，刘永碧就会不要她了。她一边哭，一边把鼻涕眼泪抹到墙上，竟湿了一大片，令人恶心，我非常生气，油然想起她的老公，我问，有人说，你丈夫与你离婚了，是吗？

她答：你管这干啥？

我勃然大怒：你忘了，他开了 5 个小时的车拉你到大连，你对他都变心，你对上级还能忠诚吗？你只会利用人！你给我滚出去！。。。。。我抓起她的礼品盒，推开门使劲地丢到走廊里。“咣当”一声，盒子碎了，里面的玻璃器皿变成了闪亮的碎片！。。。。。。

L 女士哭喊着一溜烟跑了！后来，刘永碧批评我是一个不懂工作方法的人！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但正是我这个没有领导能力的阿斗，帮助她揩屁股。大约在 1997 年底，闻世震由省长接替 G 某当上省委书记，L 女士立即失去了靠山，她自已不会写新闻，又没了广告来源，报社让她独立，她连工资都赚不出来，以及无法自负盈亏，只有打报告辞职，刘永碧，陈桂雄

多次打电话命令我去清理账目，我亲自驾驶车辆来回往返大连与沈阳 10 多个小时，连饭顾不上吃，才把 L 某遗留下来的金柜和几件办公设备拉回大连，我一边行驶，一边心里骂刘永碧，如果不要这个女宣传部长，该有多好啊！她浪费了我多少宝贵的时间啊！

省委书记的儿子私藏枪支？

由于有了以前的教训，《文汇报》驻黑龙江省的记者站，很长时间没有成立。只有两个特约记者。后来，也是该省的某领导推荐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时年 30 出头，戴一副金丝眼镜，中等身材，皮肤细嫩，声音油滑，我第一次与其邂逅。印象还不错，但后来接触了几次，便感到其人无法无天，深不可测，他说，你把记者站交给我，我当站长，再找几个人代劳，每年广告几百万没问题，我了解了他的情况，深感震惊，省委书记岳岐峰竟有着这样一个敢干的儿子？

那时，我常去黑龙江省采访，和省长田凤山，书记岳岐峰都有工作上的来往，岳在公开场合给我印象很正统廉洁，但他儿子却不择手段地敛财，又贷款又办公司，一点顾忌也没有。有一次，他请我参观他办的几家公司，其中最大的名叫 D 房地产，他说，拿到了几块地皮，再银行贷款，还没开工，就收预付款，转手就有暴利，还当着我的面，把公安局的某领导叫来，说，我们拟定了个方案，马上让全哈尔滨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都行动起来，把公章换成原子印，一律有哥们的公司独家干这笔生意。。。。。。事后，他对我说，你看到了吧，把《文汇报》记者站交给我，保证你名利双收！我说，我个人什麽也不要，只要省委宣传部把每年财政批的外宣经费给《文汇报》就行了！那时，按规定，每个省都有这笔费用，为失落这些，我没少挨刘永碧批评！省委书记的儿子笑了，他说，我回家跟老爷子说说，这事算个啥？

我随后把这件事向陈桂雄做了汇报，表明了我犹豫不定的心情，他请示了刘永碧，这回她变得聪明了，陈指示说，“外宣”经费虽好，但书记的儿子也容易闯祸，你不妨再深入观察一段时间再议。

大约在 1998 年初的某一天中午，岳某请我和他的一个助手吃饭，他又披露了省委省政府大院里的一些希奇古怪的故事，还大言不惭地表白，他有两个老婆，大连市住一个，哈尔滨市住一个！

我看他喝得满面通红，眼镜片上还有几滴油光，禁不住问：都登记了吗？是啊！他放声大笑，笑声很狂妄！我说，这违法吧！公安局怎麽能批？他忽然大声说，公安局顶个屁，公安是我家开的呀！。。。。。。

饭后，他与我肩并肩走到毫华的汽车旁，说：要不要去打猎？我以为是去狩猎俱乐部之类的地方消遣，我以前从不光顾它，就推辞说，那里室内空气污浊，声音嘈杂，算了吧？！

他又放声大笑：不是，是真刀真枪啊！到野外打猎呀！说完，他猛然打开汽车的后备箱，我吓出一身冷汗：四支微冲黑亮黑亮的，刺痛了我的眼睛，几百发子弹装在木盒里挤满了空位，上面印有编号，我醉酒的感觉醒了：这是非法持有枪支啊！我连忙摇头：啊？枪！算啦！算啦！我今天还有事！改天吧！。。。。。。后来，我对陈桂雄说，周莲香和白桦{我们两个特约记者}虽然能量不太大，毕竟是专业媒体人士，她们不会给《文汇报》抹黑，我们还是忘了那笔“外宣”经费吧！

再后来，我从手机的来电显示上看到岳某的号码，便不接了，慢慢地我们失去了联系。1999年底，我最后一次见到岳岐峰和田凤山，两人均出席了黑龙江省对外宣传工作座谈会，但他们的矛盾已表面化，互相都不搭腔，我们记者和他们交谈要分别进行，感到憋扭。听岳书记侃侃而谈，我想起他的公子，像吃了蒼蝇，反倒觉得寡言少语的田省长很清廉，不过，后来却知道他因贪腐落马了，岳书记则平安落地，入土为安了，而关于他儿子被捕入狱的传闻不断，假如他真的和辽宁的L女士一样调进了《文汇报》，会做出什麽伤天害理的丑闻，也是难料。反正他绝对不会把鼻涕眼泪抹到我下榻处的墙上，大概是抹在了牢房的地板上吧！

争利内讧，动了刀子？

《文汇报》给读者的印象是一片远离物质利益的高雅净土，但入围之后，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失落感，报社设在内地的十几个办站，实际上是以新闻为辅，广告经营为主，我们这些负责人，既是记者，也是外企驻地法人代表，每年初，报社从未下达过报道任务，但广告指标却硬性规定，连年增长，我是表现最差的一个，但既便如此，只有三四个人的小办事处，也是定额100万人民币，一年到头，的确压力很大。

那时，我最怕到报社开会，虽然会议地点选在香港，广州，珠海，深圳，住豪华酒店，吃免费宴席，还有旅游项目，但我很紧张，因为整天都在研究招揽广告的经验和秘密，如果把这些东西拿到西方，和海外媒体加以比较，会吓人一跳，中国的媒体胆子太大了，《文汇报》和《大公报》，《商报》一样，都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把新闻报道放在附位，而且，拉广告的手段五花八门，无所不用其极，通常的行贿办法叫退佣，即谁给广告给谁钱，几乎当地的官员都卷入其中，比例最高是百分之三十，这就造成很多官员与《文汇报》记者个人关系很不正常的状况，同时也严重地污染了社会风气。

报社每次开会，都让排行榜的冠军代表介绍经验，并不认为这违背了新闻工作者的准则，大家还沾沾自喜，理直气壮，我身在其中，令人汗颜。记得珠海记者站的刘某，武汉办事处的Z某等人表现不俗，他们每年广告总额都近千万元，而其领导下的员工才不过三五个人啊！

大家拉广告的秘密不外乎有这样几种：一是找省市领导批条子，下令给文汇报搞专版；二是用报纸版面换经济利益，即有偿新闻；三是以各种灵活的手段，肆意妄为，诸如请客送礼，介绍关系，高额行贿等等，总之，只要能赚到钱，交给《文汇报》真金白银，它绝对不怕钱烫手！

在90年代中期，文汇报各个办站内部人员，因为奖励分配不均，经常发生矛盾，也出现一些突发恶性事件，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是武汉办的负责人Z与下属员工发生纠纷，有人竟动了刀子，惊动了当地公安局，好在公安也被文汇报吹捧过，对其宽容处理，没有处罚。但又有内部被辞退人员举报办事处领导贪污公款，这个可能性存在，也露出一些蛛丝马迹，但文汇报领导很油滑，他们研究认为，个人贪点是小事，毕竟她每年给报社几百万的广告费啊！报社一位领导对我说，摆到桌面上，对谁都不好！特别是牵出了贪官，以后谁再给《文汇报》财路啊！。。。。。。于是，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为了鼓舞士气，文汇报规定了多项奖励措施，但时常不守信，使大家怨声载道，但凭心而论，比起国内媒体，我们办站领导的物质待遇还是相当高的，我们的薪水比他们高很多，又

每人有专车代步和酒店办公，以及接触各级官员的便利，假如那时我的心思用在赚钱方面，真是了不得，但我天生对物质追求的欲望淡然，我那时很想把办事处搞成一个海外宣传东北政经，招商引资的阵地，在《文汇报》干出一番事业来，因此，我十分看重上级领导对我的认同，既便这样，报社聘我做高级记者，兼首席代表，但在十个驻内地办事处里，只有三四个主任，没有接到社委会关于他们任命的文书，故都很失落。大约在 1997 年，有一次开会，某位知情者向我透露说，批文早就下来了，但办公室主任刘某不同意，就放在自己的抽屉里，迟迟不公布，于是，我十分生气，在讨论有关问题的大会上，社长张云枫和总编刘再明均在场，我忽然要求发言，我站起身来，毫不客气地提出意见，谈到了《文汇报》对我们没有正式任命的不公平的问题，但我没有涉及消息来源，我说，过去在东北，《文汇报》没有多少人知道，现在每年发稿数百篇，广告近百万，在当地购置的房产升值三倍还多，有什麽对不起报社的呢？!。。。。。当时，会场鸦雀无声，我看到张云枫的脸色都气得变青了，发出黑亮的颜色，像一个紫茄子！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故作深沉。后来，我进了看守所，整天和国安局的特工周旋才知道，像我这样不是中共党员的记者站负责人，包括驻武汉的首席代表等人，尽管贡献很大，但并不被社委会真正信任，这其实是上面的指示，他们考核信任的人，早就一一调入了广东省委“八办”，而“八办”是什麽？鬼才知道！我们不过是被共产党利用来筹集海外的宣传经费而已！

《文汇报》内幕之五：张浚生与四家左报

俗话讲，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用这话去看《文汇报》的从业人员，真是恰如其分，别看香港文汇报是一张在海外出版发行的报纸，但它的人员构成则五花八门，威震天下，有的是地道的港人，有人是后来移居香港的大陆人，更多的是临时从内地或世界其它地方选派的神秘人物，比如副社长刘永碧的先生是宣传部副部长刘芳安，副总编张卿云的太太是副部长周珊珊，北京办事处的记者滕越的父亲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公关部的杜明明是杜导正之女，主笔何亮亮之父是大名鼎鼎的散文家何为，海南办主任林刚的太太是作家蒋子丹，上海办副主任吴菲的先生是著名作家陈村，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由于我的出身和背景平平淡淡，《文汇报》的高层领导不可能真心信任我，故他们不会在大会上和私下里透露更机密的东西，多年来我对核心层的人员详情所知甚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作为共产党设在香港的外宣阵地的特点，则决定了他的领导人必须和中共上层保持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个上层主要是指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

我 1994 年初至 2000 年底，这段期间，我印象中是张浚生在主持中共在香港的宣传工作，他公开的身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也是宣传部和报馆的顶头上司，中共在港沿用内地的管理模式，禁锢香港《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和《香港经济导报》，这令我首先感到震惊，后来渐渐地随着见识的增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文汇报》工作的人，不论来自何方，不论处于什麽位置，都仅仅把工作当成一碗饭，未必每个人都赞成文汇报的“党八股”，假大空，只有“六四”时期除外。那时，编辑记者的人格是统一的：同情学生，推进民主，大家拧成了一股绳，都把《文汇报》当成一项伟大的事业来做。

而后来呢，人们看到了政治人物的升降起伏，一党执政的丑恶和残酷，也意识到了文人的渺小和卑微，对国家民主化的前程心灰意冷。于是，我发现，《文汇报》的员工回避敏感话题，特别是领导层从不向员工深谈报纸的背景和历史，更掩盖中共中央宣传部遥控他的实质问题，当然，没有任何人细谈过“六四”时期《文汇报》的黄金岁月。每个员工都把广告，发行，出版，印务，公关等当成第一要务来抓，而新闻则按照中南海的声音附和，具体部门

是中宣部和国务院新闻办，而各地的设在宣传部的外宣办，则对文汇报的基层办事处或记者站起监控作用，但总体上来讲，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作用举足轻重，副社长张浚生的角色尤为显眼，在一般的情况下，中央的指示精神是通过他代为传达的。

我见过张浚生不过几面，没有单独谈过话，他可能对我没有太深的印象，但我记得刘永碧曾把我介绍给他，他说，东北人都高高大大的！实际上，我是东北人里的矮个子！不过，他给我的印象相当深刻，我认真地听过他许多次讲话，应当讲，他的外在形象和口才都不错！总的感觉是，用“鸡蛋掉在油锅里”形容他的言谈举止，可能最为恰当，在香港回归的过渡时期，他领导中共对香港的宣传工作，我看很合适，因为他很油滑，能随机应变，口若悬河，八面玲珑！但细听他的演讲，可知大都是诡辩，其内容由上级而定，他像一个中共设在香港的新闻发言人。他自己说，他在香港过马路有时闯红灯，被媒体批评过，以表明英国人盯着他，我想，在讲话方面，他是不会闯共产党的红灯的，他总是鹦鹉学舌，而《文汇报》则是他领导下的鹦鹉群！

1997 年香港《文汇报》举办五十周年庆典，我有幸参与，在一次豪华的宴席上，第一次见到了原《文汇报》社长李子诵，以前我读过许家屯的回忆录，故对其十分敬仰，宴席上高朋满座，欢声笑语，他也应邀入席，这表明共产党比过去有点进步，对“六四”“开天窗”起义的老报人李子诵还手下留情，但《文汇报》的领导谁也不和他搭腔，而且，张浚生对他十分冷淡，虽然，他们被安排同桌吃饭，但形同路人，几乎大家都不和李子诵亲近，只有我主动要求与其合影，我认为他是香港新闻界的一条汉子！新闻记者需要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文汇报》许多同仁身上已经死了，但还藏在他身上，尽管他老态龙钟，步履蹒跚，但他头脑清醒，目光深邃，我知道张浚生和张云枫与他有隔阂，显然与“六四”事件有关，这个疙瘩结了这麽久，已是无解，使当时的气氛很尴尬，我深感悲哀，一时语塞。

实际上，中共亏对老革命李子诵，据说，《文汇报》1947 年注册时，主要是以地下党员李子诵的名义申办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创办《文汇报》，《大公报》，《商报》和《香港经济导报》等四家媒体，其初衷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但他们不太自信，一是担心英国政府的打压，二是媒体竞争的残酷性，可能会使它们夭折，故当时多注册了一些，以为优胜劣汰，能活下来一两家就行了，但不料香港风水特别好，四家都存活了，但也出现了新问题，到了如今，四家国企，各养一大批人，均被允许在大陆发行，同是共产党输血供养，同是党中央的宣传喉舌，同拉大陆的广告生意，却内斗不止，自相残杀，恶性竞争，大概张浚生最头疼的事就是平衡这几家左报内部的纷争了！

滑稽可笑的是，《文汇报》伊开会，社长总编就自我吹嘘说，自身是中央认可的政治性大报，他们是政治家办报，但《大公报》对此不以为然，则强调历史悠久，也是政治大报，他们才是党的忠诚的喉舌，真正的政治家，而体现在报社领导人身上，则是讲级别，排场，物质待遇，等等，围绕这些问题，大家争吵不休，互相告状，纷纷争宠，闹出很多荒唐的故事，张浚生不胜其烦。但张社长也会哄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他到《文汇报》讲话，强调《文汇报》的独特性，到《大公报》作指示，再讲《大公报》的重要性，反正每个媒体的老总都敬着他！逢年过节有好事，请客送礼，迎送往来，都有他的大份子！

《大公报》驻深圳的一位记者告诉我，王某某原为山东局级干部，但到香港《大公报》当一把手后最敢干，他经常去深圳开会，每每住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吃喝玩乐，十分腐败。《文汇报》的领导对此心里不平衡，也去攀比，但刘永碧，张云枫到东北，还没有这麽

奢华过，较之王某某还有点自律。只记得 1994 年 11 月，刘永碧在大连的确和王社长攀比过礼遇，她说，《大公报》的王社长到大连，市领导薄熙来，曹伯纯均出面接见他，那麽，她也应当得到同样的安排。她不知道自己是副职，曹书记有理由拒绝见她，但见了她并盛情款待，是破格礼遇。总之，上行下效，张浚生和左报的领导们，都过于追求物质待遇和满足虚荣心，对记者的天职和民间疾苦则漠然待之。这当然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如果没有一党执政，没有新闻封锁和“一国两制”，就他们这些人能力来说，自己拿钱办报，能不能喝西北风，都是一个问题！

两刘龙虎斗，下属无所适从

我在《文汇报》工作的那几年，常有机会和社长，总编见面，但彼此没有深入的了解，张云枫给我一种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印象，而刘再明呢，则有点诗人般的动辄信口开河的激情，据说他以前是《南方日报》总编辑，很有办报经验，但在我看来，他们都是被中共驯服了的文人，而秘密武器就是恐吓与收买，不论总编，还是社长，他们都是被历次的政治运动吓破了苦胆的人，为了保住共产党所给予的优厚物质待遇，他们不得不放弃言论自由的原则，虽然，他们心里可能也有不满，但行动上只是顺从。此外，我接触最多的是副社长刘永碧，因为她具体负责外联工作，经常在全国各地跑，与我跑熟了，也相处不错，但她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其过人之处是讲原则，从不感情用事，她从不与我谈论社委会决策的任何问题，但她和刘再明的矛盾却越来越表面化了，以致两人经常发生冲突，令下级十分尴尬。

有一次，在深圳开会，中午吃过饭，我和海南办的主任林某同处一室，我们都正在午睡，忽然被吵闹声惊醒，我翻身下地推门看到杨某急匆匆地走过来，她刚离开了一个房间，据说，他们当领导的太忙，牺牲了午休时间开会讨论问题，结果，刘永碧和刘再明争吵起来，竟拍了桌子，刘永碧是女强人，凡事要拔尖，刘再明是总编，也不甘示弱，她们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服谁，竟为了某项人事任命各持己见，最后闹翻了脸，刘永碧还气呼呼地坐在那里，但刘再明已气愤地拂袖而去，别人拉都拉不住。我生性爱凑热闹，想过去看个究竟，广告部经理杨某说，你赶快离开吧，最好别看领导吵架，这对你不好！。。。。我遵命了，但他们的摩擦绝非一日，也不止一次，所以，也回避不了，《文汇报》盛传“二刘”龙虎斗，斗个不休！

2000 年上半年，情况有些不妙，刘永碧可能受到上级的压力，与陈桂雄找我谈话，问：你在香港给某报发稿了吗？我知道，为《前哨》供稿的事，尽管用了笔名，也难免走漏风声，心里忐忑不安，我誓口否认，刘永碧说，没这事就好！我看出她一直对我很期重，也不忍心辞退我。但 5 月份风云突变，我最后一次去香港开会，也第一次主动要求与刘再明私下谈话，却很不投机。明显看出，他把对刘永碧的不满转嫁到了我的身上，仿佛我是通过后门打通了刘永碧的关系进了《文汇报》的，我感到委屈，便向他作了解释，我还告诉他，我 1991 年还在深圳写信给他求职呢，他好像不相信，他说没看到这封信，我说《文汇报》办公室给我一封加盖公章的打印信函，说没有在东北建站的计划。。。。。后来，我才知道，《文汇报》很多事由办公室主任刘伟昌私下做主，他是一个喜欢把领导架空的人！我为刘再明不能公正地对待我而遗憾，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再后来，刘永碧带领刘伟昌，陈桂雄赶到大连，在大连国安局拘捕我之前，先以东北办迁往省会城市沈阳为幌子，把我辞退了。这样做是为了撇清《文汇报》与我的关系，以便下一步薄熙来放心地整我，但我还蒙在鼓里。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把汽车，电脑，账本等物品如数上缴之后，刘伟昌把我的同事留在另一房间“策反”，刘永碧坐在办事处外间的皮沙发

上，忽然浑身抖动，头发凌乱，无声地哭了起来，我把纸巾递给她，她擦了一阵子眼泪，但怎麽也止不住，我苦笑了：别难过！你可以再聘其他人，为什麽要这样？是我辜负了你的期望！。。。。。后来，我在狱中把这一情节回想了无数遍，我想，她可能知道我将被捕，但她不敢告诉我，又知道我是个书生，她不忍心！如果她透露给我，凭我的关系，就能躲到一个薄熙来找不到的小地方，藏它几年，等平安无事再回来，但我不幸，我没有陈建平和鲁平的那种关系和运气啊！。。。。。2006 年初，我获释了，主动打电话给刘永碧，她还是那麽快言快语，我想问她，假如她与刘再明没有矛盾，都一起保护我，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刘永碧说，没办法，你知道《文汇报》的情况，你爱人打电话求助于我，唉！我实在是帮不了你啊！。。。。。

昧着良心，出卖员工

刘永碧所说的《文汇报》的情况，是什麽呢？是它的党报性质吧？正是这个可恶的东西把人性中最美好的友谊，信任，热爱，感情践踏了！先不讲他的言论自由的原则，只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讲，1993 年底，关齐云携款潜逃，留下一个东北办的烂滩子，《文汇报》一分钱也没有，只有几个空账号，是我用个人的多年积蓄筹建了班底，又用多年的人脉关系为《文汇报》创造了效益，我还撰写了大量的新闻稿，为刘永碧等领导访问大连奠定了基础，此后文汇报的事业才发展起来的！但我一旦受到国安局的审查，《文汇报》立即把我出卖了，如同当年抛弃陈建平一样，毫不留情！

2000 年上半年，《文汇报》的办公室主任刘伟昌，还亲自与东北办的同事某某谈话，让其与我划清界限，而且在我被捕的前一天，国安局的特务还秘密地到办公室从电脑中取走了证据，某某竟和特务们站到了一起，对我不透露半点风声！《文汇报》的领导上窜下跳，结交了各级官员，但没有动用人脉关系，解救员工免予坐牢的任何举动，反倒把弱羊送进了虎口！坐牢 5 年多，文汇报的领导多次又去大连拜会当地官员，但他们从未过问我的家人！其冷酷无情，形同路人，令人寒心。。。。。。试问：全世界的媒体，哪一家能如此寡情无义？特别卑鄙的是，2002 年 3 月，薄熙来为了掩盖徇私枉法，打击报复的罪行，竟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睁着眼睛说瞎话，他信誓旦旦地对中外记者说，他从来就不认识我，此案与其无关，这我并不愕然，因为薄熙来本身就是个骗子！但奇怪的是，静耳聆听，知道内情的《文汇报》非但不批谣，还刊发了如下短讯：

[2002-03-10] 薄熙来谈姜维平事件

【本报两会报道组北京九日电】针对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原首席代表姜维平事件，辽宁省省长薄熙来今天在此间表示，姜维平和我本人没有打过什么交道，没有个人恩怨。对他问题的发现和审理，都是政法机关的事情。随著时间的推移，你们会感到真相大白。

姜维平原为本报东北办事处首席代表，二零零零年四月本报东北办事处由大连迁往湖阳，家住大连的姜维平离开了本报。数月后，姜维平因涉嫌违法被捕。

辽宁省省长薄熙来今天在此间一个小型的记者会上表示，其实这个事情，我用不著回答。这个人没有跟我打过什么交道。过去可能在有些场合，我们可能同时在一起。薄熙来否认与姜维平存在任何个人恩怨。

薄熙来说：他在我的脑子里，没有什么印象。所以我听到外界在炒作这个事件，我觉得哭笑不得。后来，有关他的问题，听说他被抓起来了，对他的问题的发现还在审理，都是政法机关的事情。

薄熙来说：「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有人曾经把那几篇文章送给我看了看，当然和事实的距离是很大的。他讲的问题，大概有几篇是涉及到大连，还有的涉及到其他的地方。涉及别的地方的，我没有去了解，涉及大连的，我一望即知，有很多事情是和事实相距很远的。」

薄熙来称：「具体的事情，可以看报纸。我没有精力管这么多事情。网上对这个事有炒作，有报纸说到我对传媒不好，说到我怎么样，这些都无所谓。你们问我对传媒有什么评论，任何一个市，一个省，外界怎么评论，都听其自然。我认为，像比较大的省或市，正面或负面的报道都会很多。这个问题，不奇怪。我这十几年，当过市长，现在又当省长，听到的各种议论很多。我认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认认真真把工作做好，压力是很大的。」

这篇文章 2003 年发表，我是坐满了 5 年多冤狱，又被软禁了 3 年，在 6 年之后于加拿大才看到的！可能目光如豆的薄熙来和阿谀奉承的《文汇报》，都不会预料到我有一天能来到言论自由的土地，所以，才狗胆包天，歪曲事实，自打耳光，实际上，《文汇报》只把“牌子”迁到了沈阳，在大连一直设有常住人员，其谎言不攻自破！薄熙来称他没和我打过交道，但他接受我专访的文章印在《文汇报》上，大连市委宣传部还为此授予我“年度优秀新闻奖”，我多次与其合影的照片和获奖证书都在，白纸黑字，岂能信口雌黄？显然，他不过是为了遮人耳目，瞒天过海而已，而拍马屁的《文汇报》更是无视事实，丑态百出！

由此可见，中共一党执政的专制制度多麽残酷无耻啊！他们口口声声地把“反腐倡廉”，“舆论监督”挂在嘴上，但一旦记者的文章触及了官员的疼处，他们立即用监狱和刑罚对付，而应当秉持社会良知的《文汇报》则变成了为虎作伙的帮凶！他们落井下石，翻脸不认人的举动彰显了《文汇报》的虚伪性和脆弱性，而每天该报还在摆出一副教育他人的政治大报的无耻嘴脸，舞文弄墨，喋喋不休。但《文汇报》不要忘了，香港号称法律社会，过去东北办很多的证据材料俱在，以上这篇短讯已涉嫌诽谤，本人保留下一步诉讼的权利！{请世界各地愿意代理此诉讼的律师与我联系：weiping55@hotmail.com。}

被宠坏了的媒体老总们 ----《文汇报》内幕之六

在一党执政的中国，不仅官员由于权力不受制约，贪腐堕落，而且，新闻媒体内部的种种类似问题也相当严重，体现在香港《文汇报》身上，主要是税收，回扣，高层老总的物质待遇，等等，诸多领域，一方面，报纸只能为中共唱赞歌，当然上级的领导对它十分宽容，只要它不像“六四”时那样讲真话，中南海就不会在意它的特权和骄横，另一方面，它生存于香港，与《苹果日报》等打嘴仗，要发展壮大下去，必须经营搞活，而内地是它张口要吃的肥肉，因此，中共亦默认它的种种经济问题。

内部发票流行很多年

与内地的新闻媒体不同，香港《文汇报》广告经营的发票是自家印的，它如果在香港做生意，应当没有问题，但国内从九十年代中期，大连的地税局就开始推行通一制作的专项发

票，其目的是防止企业偷税漏税，但文汇报的历任老总们都不在乎，一是，它原本是国企，财大气粗，背景复杂，靠山很硬，二是，它肩负历史使命，只有它嘴大，不怕别人批评，故此，我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过遵纪守法，照章纳税的问题，但《文汇报》置若罔闻，老总们的解释是，它们已经在香港缴了税，并把财务中心设在广州，我们驻地办事处只负责做广告，把钱先存在大连再转往广州而已，其它的事由老总们去摆平，与人微言轻的我没关系，所以，从 1994 年底至 2000 年 5 月，我们始终在用这种蓝颜色的内部发票。

此间，曾发生了多次，当地税务部门登门查税的事，与其说是《文汇报》的招牌好用，不如说我的人脉关系广泛深厚使然，每次，我们都化险为夷，要知道，我们不过三四个人，却每年广告额上百万人民币啊，由于大连是一个才 590 万人口的小城市，我整整在地方和中央级媒体生活了十几年，本身又是一个喜欢交朋友的人，故文汇报名利双收，我不仅撰写了很多新闻报道，还承揽了许多广告，也引起了税务部门的关注，自印的发票始终是一块心病，故与税务等一些权利部门官员的往来就十分必要，这就出现了新的问题：交际费。

《文汇报》对我一直是相当信任的，因为我只有一个兼职会计，他是大连市委办公厅的干部，也是我的老朋友，故上级很信任他，我不仅是办事处的法人代表，而且，还是出纳，这就是说，如果我像关齐云那样贪污受贿，也有便利的条件，但我认为，一个人的事业和名誉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没有贪污，这大概也是薄熙来伙同新华社香港分社某些人整我，没从经济入手的原因，但支出的交际费，餐费和其它办站一样，也是可观的数字，这和当地社会流行的吃喝风密切相关，比如，承揽广告，和获取新闻线索，化解利益冲突，求得特殊宽松的政策，等等，都难免请客吃饭，但我把握最重要一条原则，绝对不以此特权谋取个人私利，而且，张张发票有注解，有依据，不违反财会纪律，比如，内地有许多国企老板，到饭店吃饭时，开假发票，索要物品或现金，这种事，我从未做过。2006 年初，我出狱后，会计请我吃饭时，告诉我，大连市国安局特务彭东辉，王富选曾找他要走了《文汇报》的出纳账本，但他们没有找到我经济上的把柄。他唯一清楚的，我违反财会纪律的是，在我被辞退前，预先给办事处所有的人，包括送报的临时工和兼职的会计，提前十三天发了工资和报销了交通费。

他说，你为什麼要这样？我答：我太了解《文汇报》了。它将亏待你们，如同对我一样！我不愿使任何与我有旧的人骂我！他眼含热泪请我吃饭，说是为我洗尘。但《文汇报》通过内部发票捞取钱财的灰尘，永远不能从我俩的脑海里洗去。

我成了冤大头

香港文汇报的领导层人员分为两个系列，一是编采，一是经营，但对我们驻地记者来讲，都是老总，他们当中，有内地派出的秘密党员，有土生土长的港人，但只要在这个媒体混久了，就会沾上腐败的恶习，不过，严以律己的领导也有，占小便宜的故事也不少，这里只举一例。

大约在 90 年代中期，有一次，总社负责广告经营的周某某总经理，到大连视察，我当然要尽地主之谊，何况他还是我的老板之一，我带他到大连经济开发区参观，在西山工业区的某服装厂里，他绕有兴趣，那时，这家中日合资的工厂，新推出一种式样新颖的西服套装，不仅质地考究，款式漂亮，而且，品牌也叫得响，周某某被工厂的领导鼓动，穿在身上，照着镜子，非常高兴，厂长说，你穿着太潇洒了，老总笑得满眼灿烂的光芒，就不想再脱下来，

后来真的穿走了，但三天后，那个工厂的领导派人来结账了，开价 6800 元，我的部下和他讨价还价，支付了 5000 元，没有办法，总社规定，餐费可以报销，但服装费不能入账，我不敢变通，也没有汇报，只有自掏腰包，当了一回冤大头！

那时，我的月薪是 2800 元，再加上奖金，4000 元左右，我没有告诉太太，因此，经济上紧张了好几个月，我想，周老总应当知道我的为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以后的许多年，我去香港很多次，这位年收入丰厚的老总，见到我很客气，笑得永远都是那麼灿烂，但他从未再提起西服套装的事，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他甚至，也没有自掏腰包请过我一次，由此，我知道了，文汇报的体制，已经使某些老总彻底地变质了，把别人对他们的帮助，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反过来，把他们回馈别人的礼节，忘到了脑后，类似的故事很多，念及旧情和一些人的脸面，点到为止吧！

一个篮球的趣闻

林某某是文汇报办公室的副主任，也是财务稽核，这个角色是秉持老总们的旨意得罪人的差事，作为内地办站的领导，我们的支出如果多了，他就会由内部账单发现，尽管所有的花销，没有超过百分之三十的底线，但林某某还是找鸡蛋里挑骨头，因此，各地办站的首席代表，都对他满肚子气，有人骂他吹毛求疵，故意找茬，有的骂他眼高手低，不懂经营，但我认为，他主要是阴阳脸，两面派的毛病，记得有几次，他也挑了东北办的毛病，但我没有公开顶撞，我理解上面的苦衷，老总们出差可以铺张奢华，我们必须节衣缩食，可能世上所有的老板都是这样，但我自有原则，当洪水，地震，森林大火等自然灾害来临之时，我可以奔赴第一线，席地而卧，克服困难，艰苦采访，但出席某些重要会议或应邀去为报社签订合同，我就住星级酒店，也要迎送往来。。。。。。故此，林某某时常不解，也对我有颇有微词，但有趣的是，林某某口口声声讲廉洁，但也开口向我们索要礼品。

他是一个疯狂的足球迷，而大连又球星云集，他由我的新闻报道得知，我和大连籍的所有球星都有过交往，他就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得到一个足球，上面要布满有代表性的球星的亲笔签名。我一口答应下来，但心中暗暗叫苦，要知道这些球星，虽然都是大连籍，但已在全国各地服役，我必须完成这一任务，并且时间不能拖得太久。

于是，我专门请了一个人，先买了一个名牌足球，这花不了几个钱，但这个朋友要走马灯般地在许多地方转圈找人，等球星全部签了名字，也支出了不少礼金和时间，好在我有助手和朋友，我能够承受，但林某某拿到这件大礼，只说了一声谢谢，就翻了脸，照样在大会小会上指责我们各地办站的领导花钱大手大脚，我忘记是因为什麼具体的事，他终于把我搞火了，他在一个财务单据上写了批评我的话，我回敬了他几句："如果少一个篮球，我就会少一份开销"。。。。。。他收到我的嘲讽信，据说很是尴尬，他应当明白，他仅仅是一个领导啊！人浮于事，机构重叠的《文汇报》，有许多这样的趣闻！从此，他对我态度客气了很多。

我想，还是社长张云枫比较通情达理，他从不对下级有过分要求，连一张报纸也自身花钱买，他说，上边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你们难啊！

愤怒的女老总

刘某某是文汇报的副老总，也是我的顶头上司，由于她负责外联工作，我与她经常打交

道，有人告诉我，她很厉害，动辄发脾气，但对我却向来大都温情细雨，像知心大姐一样，我唯一见过的她性格暴躁娇横的一次发泄，是在 90 年代中期的大连，记得起因是，我写了一篇关于陶艺家邢某某的文章之后，他在香港及海外有了名气，其作品尽管并非人们吹捧的那麼美妙，但还是有点艺术特色，我给他介绍了《亚洲周刊》记者王建民等许多朋友，他却在 2000 年 12 月 2 日，把我引见给了大连国安局秘密特工郑义强，不过，那时，我还没有识破邢某某的真面目，还与他打得火热，我带副老总刘某某去拜访她，行前和邢某某通了电话，他欣然接受。

但是，当我们一行三人，赶到邢某某位于大连秀月街的毫宅时，他失约了，还在外面应酬，一般情况下，对记者来说，这种遭遇太平常了，但没想到，刘老总却非常生气，在邢某某的大门外，院子里。年过半百，但依然丰韵迷人的刘副社长脸红脖子粗，她背着手在地上走了几圈，气不打一处来，愤愤不平，她竟说出了“他妈的”脏话，令我大为震惊！

我想，回顾以往的记者生涯，为了采访一个新闻人物，我经常会来回跑许多冤枉路，吃过很多次闭门羹，也承受了很多压力，但文汇报的老总们却被宠坏了，这是党报的制度使然，一党执政，对那些没有事业心的人是件好事，因为一言堂，唱颂歌，就有饭吃，而且，卖身投靠，说假话的记者还会发家致富，文汇报老总们大都过着这种亦官亦商的生活，我不知道他们年薪多少，但肯定是我的许多倍！现在，她因为采访对象迟到而恼怒，令人匪夷所思，与此比较，在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我没看过她为了内地弱势群体受到欺压之事，拍案而起过，后来，邢某某急匆匆赶回家中，不仅接受了她的采访，还赠送一件艺术品给她，回来的路上，她风卷残云，喜笑颜开，我没有说什麼，但心想，《文汇报》的老总，被共产党的专制惯坏啦！

这就是首长住过的地方

张某某是《文汇报》广告部经理，过去曾在大连旅顺海军基地某部当兵，故此，他到大连视察时，我带他不仅找到了当年他住过的营房和床铺，而且，还恢复了他与老战友的联系，据称，张某某那时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志愿兵，摸爬滚打，风餐露宿，生活是很辛苦的，他后来转到地方，又随太太去了香港，找到了《文汇报》这份铁饭碗，还当上了经理，应当讲，对旅顺的士兵来讲，真是奇迹！

张经理仔细查看了当年睡过的铁架子双层床，摸了摸绿色的单薄的被褥，心情很不平静，他的一个当上了团长的战友说：我们这些人，就数你啊，当上了大官，张某某连声否认，他的确是一个很谦虚诚恳的人，但在团长看来，他的官职不小，何况又在香港工作。

此后，我和团长一度成了经常走动的朋友，有一回，他请我到兵营参观，他对正襟危坐的一屋子剃光头的小战士们说，你们知道吗？我们这里诞生过许多伟大的人，就是这张床，这个小院子，有一个叫张某某的士兵，步步高升，现在已经是香港《文汇报》的广告部经理了！

战士们鸦雀无声，静静地注视着领导脸，倾听他的训话，他又提高了嗓门：《文汇报》是什麼？是我们从英国人手里夺回来的香港的《人民日报》!，张某某呢，就是把这个最响的声音告诉全世界人的首长，懂吗？他的话音未落，战士们齐声大喊：懂了！向首长致敬！

团长讲完了，又对战士们介绍说，这位姜记者就是《文汇报》派驻东北桥头堡的首长！

战士们又是一声吼：首长好!。。。。。我当时听了，差一点昏过去。的确，中共一党执政，操控媒体的举动，已经把人们对新闻报刊的认识扭曲了，把老总们的地位也颠倒了!

或许，我不该接受这一声不属于我的“首长好”，2000 年 12 月 4 日，我被同样当过旅顺志愿兵的大连市国安局党委书记车克民，拘捕后关进了海军基地看守所，比较一下，这使我从张某某的切身经历得出结论：在《文汇报》工作，要想丰衣足食，平安无事，必须像老总们那样听话，始终“把共产党的声音告诉全世界”，否则，没有好果子吃，上述团长讲得没错，但我不愿做那样的首长。

广告重压下的众生相



《文汇报》驻全国各地主要负责人合影：左起 1 姜维平，2 广州办主任吴泰基，3 四川办主任杨永年，4 文汇报办公室副主任林金来，5 深圳办主任林裕栋，6 上海办主任姚欣宝，7 武汉办主任邹珍贵，8 广州办副主任林燕芳，1995 年 1 月 14 日摄。

广告重压下的众生相

广告是《文汇报》的生命线

《文汇报》在香港的三家左报中，论资历不如《大公报》，论商业性，亦逊色于《商报》，但它近年来在政治影响力上，却比前者要激进得多，正因为紧跟党中央，领左倾风气之先，一方面使北京的中南海领导人青睐，另一方面却使香港本地的订户和零售量不断下降，气得老总们经常骂《苹果日报》是“滥苹果”，骂《东方日报》是迷失了“方向”。是它们挤占了报业市场。

然而，不管怎麽骂，人家在香港地摊卖得好，收入也多，各项业务发展也快，《文汇报》没有办法，但它亦有自身的优势，就是“广告保护主义”，内地的企业在香港招商和推销产品，必须把广告给香港左报，这是中央有关部门下达的指示，所以，《文汇报》高度重视内地的广告客户和业务，由于中央对它的拨款逐年增加，但《文汇报》总是人浮于事，入不敷出，自然内地办站的广告年收入就成了报社老总们馋涎欲滴的大肥肉。

1994 年至 2000 年期间，我经常往来于香港和内地之间，我发现一个秘密，《文汇报》的员工对政治改革和民间疾苦非常冷漠，老总们关心的是广告收入，员工们专注的是内部福利，只要一开会，八成与广告有关，每逢年底或年初，必有总结会和表彰会，其主要内容很少涉及到新闻报道，大都是研究增收广告的经验和教训。谁点子多，创收多，谁就被表扬。一般情况下，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广告特多，这和当地经济活跃有关，此外是上海和北京，于是，驻广州办，上海办，北京办就成了“大哥大”，而它的主任位置就成了“肥缺”。

《文汇报》广州办事处成立的比较早，影响力较大，它所在省市的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因为毗邻香港，故对《文汇报》较熟，许多广告就刊登在这家报纸上，而且，对外招商成了各地官员拿手好戏和脸面，他们为了拿回扣，也把“肥肉”给了《文汇报》，因此，在我的印象里，它们办事处包括临时工，不过 10 个人左右，但年收入竟数千万元，真是不可想象，肥得流油。

于是，如同官员一样，就出现了腐败和犯罪，“关齐云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而且，围绕着广告回扣，佣金，提成，奖励，内地员工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报社领导不得不出面协调和查处，那时，广州办和上海办最有钱，所以，产生的利益冲突和人事争斗也最激烈，有趣的是，负责内地员工外联的副社长刘永碧，采取的策略都是一个模式：合稀泥！她很少谈论是非，只求广告稳定，她心里非常清楚：《文汇报》在香港讲假话卖不出去，必须靠内地广告收入支撑，而拉广告的能人，一个也不能得罪，广告是它的生命线，所以，凡是内地办站出了人事纠葛，她都是各打五十大板，谁的积极性也不伤害！但也有例外的时侯，那就是，某个办事处的领导和员工针尖对麦芒，实在合作不下去了，不得不做人事调整。

广州办就发生过多起“政变”，90 年代中期，吴某某由《韶关日报》总编的职务调《文汇报》驻地主任，他为人忠厚，亦严于职守，但商业头脑太差，交际能力欠缺，就被一位姓陆的“广告大侠”所蔑视，该人之所以被戏称“大侠”，确有过人之处，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很少写出文章，但能利用《文汇报》的招牌纵横天下，其一表人材，能饮善唱，广交大款，财源滚滚，每年总结时，其承揽的广告额都名列前茅，于是，他瞧不起吴某某，两人矛盾日深，以至水火不容，“陆大侠”给报社发申请，要办第二广州办事处，吴某某也声称不炒他鱿鱼，自己就辞职，官司打到香港总部，令老总们头痛。一位参与决策者对我说，唉，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吴是党员，办报政治上可靠，陆是“大侠”，赚钱是快手，能人！他们权衡再三，还是“陆大侠”走人！因为文汇报毕竟是党报啊！它还得顾忌脸面。好在，铁打的《文汇报》，流水的员工，共产党坚信，只要广告能赚钱，有佣金和奖励，为了生活和享乐，就不怕员工辞职，继任自有后来人！所以，2006 年，我获释后查阅了《文汇报》网络版，见到了许多新面孔，过去的广告“大侠”和办站主任大都风流云散了！

《特刊》是个骗局？

为了提高广告的竞争力，《文汇报》，《大公报》都出版了特刊，《大公报》的事我不甚了了，但《文汇报》的特刊则广受争议和指责。所谓“特刊”说白了，就是介乎于广告和新闻之间的一种专版，形式上是套红印刷，内容上是某一种产品介绍或企业形象推广，也有某个城市领导的吹捧稿件，等等，它和《文汇报》的新闻版不同，它是严格收费的。记得我的一位具体负责广告的同事，在辽宁省海城市承揽了一个特刊，其内容是吹捧海城银海锅炉的新产品，一个版大约人民币 4 万元，双方签约是先支付一半，刊登后再结清账目，这种合作比

较公平，也广受客户欢迎，但却出了大问题。

大约是在 90 年代中期，那个企业的老板姓梁，女性，山西人，其兄长在香港有办事处，我当时并不知情，等特刊登出来以后，她哥哥在香港地摊上买了一份完整的《文汇报》，翻遍了内页广告和特刊，竟根本没有这家公司的内容，他很奇怪，就告诉了妹妹，于是，女老板用地方口音很重的大嗓门与我通电话，她生气地质问：你们《文汇报》守不守信誉？我问明了情况，也非常震惊，因为双方签有合同，相关条款里有明确的日期和版次规定，如果违约，我们另一半费用将被拒付，我忙追问香港总部，但广告部的领导信誓旦旦地坚称，已经如期刊出，丝毫不缺，不过，客户的哥哥却查不到版面，于是，我开始怀疑特刊收费低廉的原因，它究竟是个什麽东西呢？

两天后，我们通过民航班机拿到了 20 份《文汇报》特刊单页，也收到了那天完整的香港《文汇报》，里面确有这张特刊，我不知道这是怎麽回事。。。。。。后来，我和同事驾车两个小时，把广告样报和报纸专程送给了梁老板，她说，我说怎麽登了特刊后，一点效益也没有啊，上面印了电话号码，我没接到一个电话，可能《文汇报》只印了 21 份吧！我和同事都苦笑起来！

当然，她很有钱也很慷慨，支付了尾款，令我们感动，但以后她再也没给《文汇报》一分钱的广告费。我经常想，《文汇报》在印刷数量上没藏猫匿吗？

广告被高官所利用

中国的政治体制使《文汇报》和各地官员之间形成了互相利用，互相依存的关系，《文汇报》为了银子，官员为了面子，他们权钱交易，各取所需，那时，各地赴港招商成了风气，动辄某地组团百人到香港去忽悠，虽然签订的协议大都是假的，但官员们只求表面的政绩和热闹，故纷纷仿效，乐此不疲。而《文汇报》趁机捞几个版面的广告或特刊，则绰绰有余。

记得 90 年代初的某年某月，薄熙来第一次以大连市长的身份带领庞大的代表团赴港招商，我们也根据港馆的指示，承揽了十几个版的特刊，广告收入不少，但有一单特刊闹出了大乱子。那时，大连有一家搞房地产的企业很有名，叫三环房地产公司，它是国企，归农牧业局管辖，其下属农场特多，大都处于城乡结合部，后来原址盖大楼发了横财，故他们把地块规划之后赴港招商，很有斩获，我们和老板王某签订了合同，但广告上面的照片是局长于某，不是王老板，不料，由于电脑当时没有普及，发照片要通过邮局的特快专递，我们的照片等资料到达香港的时候，会议开幕的时间已经临近。结果匆忙之中，出了差错：在于某照片的下面竟属名他是市长薄熙来！

这也难怪，这些《特刊》都要赶在大连招商会当日推出，报社的编辑没几个人知道薄熙来，不像现在，他被骂或捧都出尽了风头！于是，王老板打电话告诉我，薄熙来看了很生气，于某抢了他的镜头，太不应该，而且，于局长尖嘴猴腮，远不及薄熙来潇洒？。。。。。。他花了 5 万广告费，却受到了批评，心里很难过。我告诉他，幸亏副总编刘永碧发现得早，及时做了修改补救，但无奈一部份报纸已经出街了，它像泼出去的水，永远收不回来了！我只好给王老板连声道歉。

然而，诡计多端的薄熙来吃这样的哑巴亏很少，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文汇报》为自

己脸上贴金：中共 15 大开幕当天，《文汇报》首版的广告，是薄熙来扶植的大连万达集团老板做的，支付了 20 多万元，其内容主要是薄熙来西装革履的大照片；王军霞在奥运会上夺冠，其原籍所在地的某企业，也在《文汇报》刊出了祝贺广告，当王军霞回到家中，衣锦还乡，薄熙来赶去捧场，就带着这张报纸，它和薄市长一同出现在大连电视台上。薄熙来对王军霞说，你看，《文汇报》给你登了整版的报道!。。。。。

不过，最能体现他和当地官员对《文汇报》的利用，还集中在这样一件事上：大约在 90 年代中期，新加坡富商黄某芳到大连考察，那时，大连星海会展中心原址，还是一片由城市垃圾堆出的荒地，薄熙来想让黄老板投资开发，但精明谨慎的商人思虑再三，拿不定主意，于是，薄熙来亲自提议《文汇报》宣传，我被他的秘书叫到大连星海湾，薄熙来说，今天黄先生来了，是个关键时刻，我们要办大事啊，你没看我今天打了领带吗？。。。。。。我知道，他平常喜欢穿夹克衫，里面是白衬衣，一般不系领带。薄熙来在星海湾现场，一边带领黄老板视察，一边说，你看我戴领带了吧！就知道我要办大事!。。。。会后，他的秘书还向我提供了详细的文字资料，并强调说，你一定要马上报道黄先生投资的事，于是，《文汇报》第二天“中国新闻版”刊发了长篇文章，但非常奇怪，此后很长时间，这个商人只是签了意向书，并无实际举动。。。。。。后来，我才恍然大悟，薄熙来深知《文汇报》在海外有影响，是要通过媒体给黄老板施加压力，逼他在大连投资。总之，类似的故事太多了，大都已经往事如烟，印象淡然。薄熙来是最会利用和玩弄媒体的高官之一。

拖欠款的烦恼

在《文汇报》任职的五年间，我最烦恼的事莫过于广告的拖欠款了，虽然，我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了新闻报道上，但遇到大额的未付的尾款，既使是部下和同事所为，也必须跟进和处理。有的还难免打官司。

通常情况下，政府部门的广告，一般由中共官员审批后，交由财政拨款，只要有合同和发票，很容易及时结账，但企业做完了广告，有的很守信用，有的拖拖拉拉，也有的赖账不还，总之，五花八门。由此，我也看到了中国企业老板的诚信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记得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一家企业，在《文汇报》做了整版的彩色广告，为了给它开业时的庆典增光，但付了一半费用之后，等广告刊出了，迟迟不付账，我的同事去了几次，也没有索要回来，后来我亲自赶赴那里，像挤牙膏一样，只结了一部份，可能是企业效益不好吧!

不过，东北的吃喝风十分盛行，既使是连年亏损的开不出工资的企业，也是老板天天迎送往来，歌舞升平，烟酒照顾，挥金如土，每次去讨要欠款，他们都会热情地请我吃饭，却继续赖账，有时我很生气，拒绝吃请，我说，你把吃饭的钱省下来，给《文汇报》吧!。。。。。。但这样搞，他们更不理你，也不解决问题，有时以酒论英雄，你多喝几杯，他们就付账，你不喝，他们就说你不够朋友，当然不应当给你广告，这种传统的以酒会友的习俗，是东北人的特点之一，离开喝酒，几乎办不成什麽事！故此，那些年我的胃病相当严重，2000 年 12 月 4 日，我入狱了，失去了自由，但也避免了酒对我身体的伤害。这叫“有一失必有一得”吧!

我印象中，政府官员对《文汇报》赖账的人不多，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朱胜文是其中的

一个，我在 1994 年初，曾去采访过他，做了专访，后来，他通过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赵某，在《文汇报》做过一版广告，但结账却并不痛快，我和朱市长通过电话，他久拖不决，还想赖账，但宣传部长赵某是记者出身，为人很守信，多次催他，才付清了账目，后来，他因为和副书记岳玉泉争权内斗，遭到整肃，惨死狱中，我在牢房里听到这个消息，不胜唏嘘！

另一位官员是原吉林市委书记赵家治，我去采访他的时候，市委宣传部的某官员说，他们正准备到香港招商，打算给《文汇报》一版广告，我来得正是佳机，但不巧，我下榻在江城宾馆，那天夜里，距此不远的文化宫发生了火灾，不仅烧毁了正在展出的恐龙化石，而且，还焚毁了图书馆的许多珍贵的线装书，虽然，我有求于孙书记，但不能无视记者的职责，我立即做了报道，第二天，香港各界都知道了吉林大火，当然，书记很生气，广告也不给了，我灰溜溜地离开了吉林。很长一段时间，我成了那里不受欢迎的媒体记者，他们叫我"捅包蛋!"

说来也挺有趣的，2007 年，我应著名画家卢禹舜之邀，去哈尔滨看朋友，住在他办的"八荒通神"大酒店里，竟偶然与上述那位欠款不还的老板久别重逢，谈及往事，他竟一直未与《文汇报》结账，我问他为什麼，他说，《文汇报》是党报，给他干啥？给了，还不是领导挥霍？如果老弟你现在要，我马上给你现金，我连连摇头，他酒酣耳热，气愤地说，你为《文汇报》兢兢业业做事，却落了个坐牢 5 年的下场，为啥不要？我说，我可不想再坐牢。坐牢太苦啊!。。。。。他听了，大笑不止。

含泪带笑的稀奇事——《文汇报》内幕之八

一半真话，一半假话

虽然，在东北地区拉广告，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但五年来，我一直坚持把新闻报道放在第一位，这有违于港馆领导的大政方针，在总编和社长看来，《文汇报》应当环绕着经济效益，去找新闻，或者确切地说，是先去吹捧某些企业，或某个官员，再去伸手要钱，只是报社领导不主张来硬的，而是用软的，用交朋友的办法，说白了，就是一种不正当的利益交换。至于付面报道和突发事件，向来是报社领导慎之又慎的问题，前者一般不碰，后者实在绕不过，就粉饰太平，颠倒黑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我作为十几个驻地办站的负责人之一，绝对是人微言轻的，一来我不是广东省委八办的在编人员，二来东北经济实在不景气，没有珠江三角洲那麼多有钱的企业，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我在《文汇报》都无足轻重。不过，有趣的是，在港人看来，东北是不毛之地，治安环境很糟糕，总有一些突发事件发生在那里，如果当事人涉及港台，就成了热门新闻，故此，我又每每身处舆论的旋涡之中。

记忆里的许多重大的突发事件，都在我的任期冒出，也都与东北有密切关系。比如，1998 年轰动港台的林滴娟命案，1997 年的钟少雄绑架案，1999 年的沈阳副市长马向东贪腐案，哈尔滨副市长朱圣文贪腐案，等等，此外，还有黑龙江的洪水，山东烟台的沉船，漠河的日全食，总之，如果现在翻翻《文汇报》，可以看出我对类似事件是花费很大气力去报导的，大都是第一时间，和第一手材料，所以，主管报道的副社长王伯遥对我评价很高，他对我的林案报道的评价语是"领先一步，好评如潮"。

然而，令我最悲哀的是新闻真实性的问题，很多报道是做到了这一点，但还有大量的保留，比如，花钱买凶杀害林滴娟的是李广志，李是一个在辽宁海城做镁矿生意的商人，他的后台是他的父亲李某，而李家父子的后台是政治局委员李铁映，李力践父子，李铁映在海城任职多年，与地方官员和企业老板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当时，有知情者透露，元凶李广志就是在李铁映等官员掩盖下逃跑的，至今没有规案，杨荣喜不过被利用的杀手和替死鬼而已。

还有钟少雄案，他是香港的著名电影导演，他的父亲在鞍山搞内部股票骗了不少人，当地黑社会派人把他从广州绑架到鞍山，其目地是父债子还，我是通过总社记者王坚第一时间知道这个线索的，随后我驾车飞速赶往辽宁鞍山，由于我在当地和黑白两道的人都有关系，很快查找到了钟少雄被绑架后关押之处，所以，我发表了非常有现场感的一篇人物专访，在香港轰动一时，也促成了钟少雄的尽早获释，但依然有所保留，有知情者透露，绑架行动是由鞍山某公安人员操控的，连市政法委书记张家成也身陷其中，后来，我坐牢时，他当了省司法厅长，有一次，还带领监狱管理局长，到我所在的大连南关岭监狱视察，竟装着不认识我，如果，我当时披露了全部内情，他后来不会有高升的官职，想来苍海桑田，人心难测，真是后悔。。。。。

至于慕绥新案，马向东案，朱胜文案，等等，都颇为类似，总之，当时我的处境，虽有一份勇气和担当，但由经济地位所决定，为了生活的物质条件领先他人，不得不在报社领导的要求下自律，平心而论，编辑部不会对某一个细节提出明确的意见，但报纸政治背景的整体框架制约了每一个人，久而久之，不用报社高层讲话，我自己就知道适可而止，这种情况，海内外的媒体，只要是中共操控的，无一例外，所以，这样做的结果是不公平地剥夺了读者的知情权，而在错误信息基础上导致的行动，就是茫然轻率的。

总之，我得出的结论是，《文汇报》身处“一国两制”的香港，他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是一半真，一半假，究其原因，不是老总和采编人员心无明镜，而是大家都是凡人，都为了一碗饭，没办法，根子还在上面，在于国家的领导体制。

半夜里来了新娘

正因为一党执政，一个强权操控媒体，舆论只能讲好话，所以，长期以来，使《文汇报》，《大公报》，《商报》等媒体，在东北成了香饽饽，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不论到哪去采访，都受到基层政府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接待，特别是中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更是如此，拿 1997 年百年一遇的漠河日全食来说吧，那次采访的经历就满有趣的。

我从大连乘火车晚上出发，要耗费一夜时间，第二天凌晨才能赶到哈尔滨，然后，再转车去黑龙江省的西木林，它是一个很小的车站，离中俄边境的北极村很近，日全食的最佳观测点就在它所在的漠河县，我大约历时二十几个小时，才抵达了那里。

记得那时有多家媒体同行一路搭伴，《大公报》驻东北记者华大珍也身在其中，她非常有交际能力，又熟悉地方情况，故在漠河很快找到了下榻之处，但我没有办法。因为云集的官员和媒体记者很多，仅有的两家宾馆已人满为患，我站在漠河宾馆走廊里，举目无亲，手足

无措。不过，当地群众对新闻记者很好，有一个宾馆的工作人员，听说我是香港《文汇报》的，十分新奇，她大约五十多岁，有一张圆脸，红扑扑的，我发现那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脸蛋，大概与风吹日晒有关吧！她认真查看了我的证件，想了想说，天快黑了，气候又零下 39 度，你到我家住吧！

我别无选择，明天报社要发当日新闻，最好能有日全食的照片，我必须先安顿下来，于是，我随她走去。原来，我很幸运，他的女儿刚结婚了九天，有另一处房子居住，它位于一个千篇一律的鸽子笼式的民宅的二楼，大约十几平方米，除了一张板床，和一个沙发，一个梳妆台，其他几乎什麽都没有。她把我介绍给女儿，她大约二十几岁，有非常美丽的面容，和偏远山区人特有的纯朴，她说，你别嫌弃，也别害怕，就在这里住吧，我和爱人到我妈家，没人打扰你！。。。。。。而且，凑巧的是，他爱人是开出租的，正好我也要用车，这样一来，什麽都解决了。

那时，电脑没普及，发稿要用传真，但小小的人口两三万的漠河县邮局，只有一部公用的机器，于是，我先在这个民宅里写稿，再用电话口述给远在大连的同事，她打印后发到香港，故十分便利，我既没有挨冻受累，也免除了邮电局门前排队之苦。更有意思的是，有一天晚上，天气异常寒冷，我根本不能出门，读了一会徒步行走英雄余纯顺的传记，然后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半夜时分，房门忽然开了，我吓得从沙发上滚到了地下，问：谁？。。。。。。没想到是新娘。房东女儿抱着一个暖瓶走了进来，她是来给我送热水的，她说，天气太冷了，我妈不放心啊，说别冻坏了记者。。。。。。接着，她发现了问题：你为什麽不睡在床上，我告诉她，他们的新婚被子上有一对刺绣鸳鸯，很是漂亮，被子是喜庆用的，这里没有洗浴设备，我可能身上不太干净，就不好意思掠人之美！。。。。。她笑了，问我“掠人之美”是什麽意思，并说你们香港人就是这麽文诌诌的，我说，我家住在大连，只是给《文汇报》打工，并非香港人，她竟说，大连是“北方香港”啊，不一样吗？。。。。。。

此后的几天，我就一个人，住在这个人烟稀少的小县城里，住在这个完全陌生的房间里，有几次进进出出，不会用她家的钥匙，我就随便敲开旁边的一户人家，他们也不问我是谁，就帮我开门，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比如，香港，深圳或者大连，都是难以想象的奇闻啊！

后来，我在狱中闲着没事经常回顾以往，颇多感慨，我想，这里的人民太好了，如果中国是民主体制，媒体没有捆绑，完全放开，《文汇报》能做许多回报人民的好事，而不仅仅是报道自然状况啊！

阳具拔不出来了

1998 年，台湾民进党议员林滴娟死的太惨了，她生在台北，却死在了辽宁省海城，我是亲眼看过她尸体的记者之一，当时知道她死讯的人很多，但同一天发生的另一件事却被封锁了消息，没几个人知道，那就是，被掩埋了的旧闻：当众多台湾记者，蝗虫一样云集小小的海城宾馆之时，当地邮电局和税务局的两个领导，闹出了惊天动地的桃色新闻，前者是女的，大约四十多岁，后者是男的，已年过半百，他们先是工作上交往，慢慢久了，关系演变了，成了秘密的地下情人。

这种婚外情在东北十分普遍，对官场来说，根本不算什麼大事，很多官员都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百姓亦见怪不怪。问题是，正赶上海内外媒体聚焦海城的时候，有一个高档生活小区的保安却发现了异常现象，有一辆进口的豪华面包车开进了车库，连人带车再也没有出来。。。。。原来，车子是税务局某局长的，那天，他下班后带着情妇去吃饭，喝酒，吃完了又去唱卡拉 ok，唱到半夜，最后又去洗浴，玩够了，两人缠绵悱恻，意犹未尽，就把车子开进了车库，在里面又温存了半天，不想，车库和车里都打了空调，他们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窒息而死。。。。。

据知情者披露，当保安找到他们时惊呆了，一男一女，相拥而眠，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而且，人们无法把他们僵硬的尸体再分开，男的阳具拔不出来了。如果是普通老百姓，人们一笑置之，偏偏他们是局级干部，很多人在电视上熟悉他们，而且，双方配偶知道此事后均很生气，都拒绝收留尸体，料理后事，不巧的是，他们的尸体与林滴娟的遗体放在同一个医院里，只是分在不同的太平间。一位当地官员对我说，求求你，千万别告诉台湾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他们要是知道了，会和林滴娟的事一起炒，更骂我们共产党腐败啊！我心想，林滴娟之死，如果不是官商勾结，社会治安太坏，她怎麼能死得这麼倒霉，也这麼凑巧呢，还和官员的性丑闻发生在同一天，这是偶然的吗？

陈县长与他干妈的纠葛

萝北县是黑龙江省一个归属鹤岗市的小县，不过是弹丸之地，但它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因为，在它的北面一江之隔的是俄罗斯的阿穆尔捷特，据说每到夏季，很多美丽的妈大姆赤条条地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成了目力所及的西洋景，故此，近年来，萝北县“光腚岛”{即“情人岛”}名扬天下，游人如织。

不过，我常去那里的时候，是 90 年代中后期，它的知名度还不太高，我是被邀请去专访县长的第一个香港记者，官员们还是第一次知道了香港也和上海一样，有一家《文汇报》，我向他们解释了半天，他才确信这是共产党办的报纸，于是，酒足饭饱，他们看我很豪爽，就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的前任是土生土长的鹤岗人，时年四十出头，从基层的老农民慢慢地一步步爬上来，当上了县长，那几年，上级下令全力以赴招商，他就热情地接待所有的有头有脑的人物，有某老板给他介绍了一个六十多岁的妇女，她气质高雅，举止不凡，不仅带着瑞士名表，而且还穿着一身名牌套装，其助手是个能说会道的女大学生，她在酒桌上显示了海量，趁酒酣耳热之时，介绍她的老板说，她是李嘉诚的妇人，掌管一家金融公司，正准备找一个上亿的大项目，做点生意，县长乐得合不拢嘴，就建议她投巨资改造“情人岛”，那小岛位于中俄之间，上面长满了扭在一起，全都两个枝干的情人树，李妇人听了很感兴趣，就提出立即考察，县长以为做梦遇上了财神爷，就当即放下其它工作，陪她们环岛考察，少不了吃喝玩乐，极尽地主之谊，反正花得都是公款。

他们很快签了投资协议，第一期由港方投资 3000 万元咨询开发费，县长乐开了怀。。。。。。此后，李妇人又来过几次，县长拜她当了干妈，但她说，李嘉诚出差没回来，投资款没人签字，告诉县长别急，干妈的话岂能怀疑？他又热情地留干妈住在宾馆里，正巧她感冒生病，

说要先到欧洲休息再回香港，走时匆忙，身上钱不多。。。。。。县长慷慨地借给她十多万元，她说回头就还给干儿子。不料，她竟一去不回。。。。。

我问：你说的县长，为什麽连李嘉诚的家事都不知道啊！领导说，我们这个小地方，很偏远很闭塞的，如果那时，你这样的香港《文汇报》记者多来一些，多给我们宣传宣传，就好了！来得人多了，信息流量大了，就不会上当受骗了。我想也难怪，1994 年 11 月，我去大连市外经委办理《文汇报》驻地办事处注册手续时，工作人员从未听说《文汇报》，还以为我们是特务，是反动报纸呢！她把消息第一时间报告了安全局。。。。。我问这位领导，后来呢？

他说，陈县长报了案，公安局的确很厉害，很快就在新疆抓捕了李嘉诚的假老婆，原来，她是新疆乌鲁木齐一家毛纺厂的退休工人，和县长一样，连香港都没去过，但却能欺骗共产党的干部。类似的故事，在我任期听到了很多，查证属实的也有大把，这只是苍海一粟，我想，这主要是中共长期以来操控媒体，愚弄百姓造成的恶果，而每一件坏事最后均必将反害其身，自食恶果。

搞好关系，利于发行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内地读者订阅《文汇报》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通过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手续很烦杂，效率较低；一是通过《文汇报》较早地设在深圳或广州的办事处，时空上较为麻烦，成本亦高，故此，在中共严密操控新闻媒体的情况下，既使是香港《文汇报》这样的由“党八股”充塞版面的报纸，进入大陆，也绝非易事。

然而，读者往往就是这麽好奇，越是少见的难以得到的媒体，越是兴趣浓烈。因此，如同对《大公报》一样，内地省市，特别是信息闭塞的东北地区，对《文汇报》的需求尤大，正因为看到了这一商机，《文汇报》领导层一直在研究自办发行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改革，过去是中图一家独揽市场，它由于是国企，当然只能坐等生意，且中间盘剥太多，报社几乎看不到利益，但为了扩大影响力，尤其是与友报《大公报》的竞争，只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1994 年 11 月成立的东北办，《文汇报》在广告，新闻和发行方面，都开辟了一块新的处女地，至此，报社自办发行的创意，才真正地在东北变成了得以落实的业务。总社负责发行的关闽强，张勇，刘史鸣等人都曾给予有力的支持，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们最大的决策是利用了航空公司的关系和优势，大连的北方航空公司有很方便的班次，每天不断地飞往深圳或广州，打通他们的人脉关系是很简单的，《文汇报》先派记者采访他的领导，再搞一些政绩和业绩的报道，然后，他们的总经理一句话，就可以每天通过快捷而准时的航班，把《文汇报》送到东北办。

一般的情况下是这样运作的：总社的发行部，先派汽车经过海关，把报纸送到深圳的黄田机场，因为记者们常年给机场领导唱颂歌，所以，机场的各个机关和运输环节都非常畅通，人人全力以赴，提供方便，所以，三个半小时即可到达大连市周水子国际机场，我们这边呢，派出送报员守候迎接，把报纸取回来，先送到办事处分检，然后，按照客户提供的要求，送

报上门。因此，发行的业务如同雨后春笋，很是旺盛，刚开始是三份五份，后来多达上百份，并继续发展，而每份全年的定价是人民币 2500 元左右。故此，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我不清楚《文汇报》的成本是多少，想来，报社利用这一途径把总社各个部门的指示，批文，财务报表，发票，信件等便捷及时送达，节省了一大笔邮费，既使是微利，也是值得的，但我只记得报社领导的指令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不停地通过外联部给我们施加压力，增加发行量的指标；一方面不断地发牢骚说，自己多发一份就多赔钱，只是为了扩大在东北的影响，不得已而为之。由于我是一个不善于理财的人，虽然，办事处每年进出账目上百万，但有兼职会计和发行广告的助手代劳，也为了避嫌，我从不碰现金，故究竟发行赚不赚钱，至今我也不甚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明白的：《文汇报》为了经济利益，则丧失了新闻媒体的大原则：对民航的工作只能表扬，不能批评，就我们来讲，对北方航空公司尤为关照，比如，他们的新闻发布会必得派记者参加，记者也写过吹捧北航领导改革先行的专访，而所有的材料则根据他们提供的数据，真实与否，可想而知，甚至连自然天气引起的航班误点，旅客投诉，等等，负面的东西，都极少报道，其目的就是一个：搞好关系，利于发行。

给你点颜色瞧瞧

我的书生气不利于给《文汇报》赚钱，既使像机场出货柜台的员工，我们的送报员也得罪不起，他们经常受到一些刁难，我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一是他们没有收到礼物，可能心里不痛快，实际上，按照当地的社会风气，他们对我们已是高抬贵手了，所以，我总是督促员工逢年过节，送一点类似台历，挂历的小礼物去，这样就疏通了关系；另一种情况是新闻报道造成的，因为大连经常有海上大雾，会使航班受到影响，如果问题拖得太久，就会听到相当多的批评声音，有时民航工作人员照顾不周，就会有冲突等事件发生，这就出现了大新闻，必须报道，印象里 90 年代后期有一次，我们做了简短的报道，当然是事实求是的，但依然搞火了北航的某领导，此后的一次取报，我听送报的师傅告诉我，他一般是早晨八九点钟到民航的柜台取得快件，效率是很高的，但这回反常，民航员工显得傲慢无礼，故意拖延时间，反复查看手续和证件，还明确地说：要给你们点颜色瞧瞧！

不言则明：既使是一张香港影响力很大的中共报纸，我们也得罪不起机场，为了经济利益，必得低头，正如一个人在商业街行走，只有不时地低头查看，你才能捡到硬币。问题是，这样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单位太多，岂止民航一家呢？

由于报纸的发行量扩大了，急需送报员，报社不可能每人配备一辆汽车，但大连的城市高低不平，海岸线太长，路上要耽搁很多时间，我建议一个人配备一辆助力车，得到了报社领导的首肯，这既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也大大地加快了办事效率，但又得与交警打交道，我聘请了两三个送报员，都必须有车辆准行证，而交警的敲诈勒索是国内官场的常态，师傅送报的路上动辄受到检查和刁难，在加上我自己也由报社配备了专用采访车，不仅有车辆的年检和驾照的审查，还难免时有违章，故此，也必得与公安局，特别是交警支队搞好关系，这样一来，为了搞好发行，还得迎来送往，聚餐交往，师傅们也得看民警的脸色办事。因此，《文汇报》驻地记者批评公安的工作，是遥不可及的事！

不过，最大的最难看的脸色是市长，那时，为了扩大读者群，争取市领导强有力的支持，

报社特批，免费每天给薄熙来，于学祥每人每天各一份赠报，我听助手向我汇报，她在于书记的办公室里，看到了被翻阅过的，显得很凌乱的《文汇报》，于对她说，他几乎天天浏览，但薄熙来没时间看，他对香港及海外媒体的新闻每天只看秘书整理的简报或内参，此外，他还看给他唱颂歌的文章，如果谁批评了他，就会记恨一辈子，所以，别看当时他是二把手，但派头不小，对报社摆得架子最大，故此，我让送报员给他送了一个月，就下令断了，我说别浪费时间和师傅的汗水了！没用！

真假办站之争

说起过去的故事还真有火药味呢！1994 年底，由于《文汇报》的发行业务有利可图，大连有一个精明的商人姓赵，他和太太买了一辆天津大发牌微型汽车，就建立了一个私营企业，账号是个人的，但招牌却是《文汇报》记者站，他根本不会写作，却很有应酬交际能力，经常出席公关活动，大概在一年多时间里，就对外承揽了上百份报纸，经济收入非常可观。

我第一次发现他时，是《文汇报》刚成立办事处的 1995 年月初，我到位于辽师大附近的私企老板任运良的办公室去采访他，不想，碰巧找到了假冒《文汇报》的站点，他们只有两三个人，但生意特别好，因为那时东北人很土，只知道香港有《大公报》，不知道有《文汇报》，更没听说过《东方日报》，《明报》，等等，一些先富起来的商人，老板，政府官员，都把读香港报纸当成一种荣耀来看，所以，谁每月订了《文汇报》，就表明有社会地位，后来，大胆建立了中国北方第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民营老板任运良，也高价订阅了《文汇报》，而赵某的办公室就设在任运良所在公司的楼下。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热的商机，赵经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想招安他，但他决计为自己谋生，他说，等你干起来了，上边随时会抛弃你，那才伤心呢！给谁干都不如自己当老板，现在回忆，他有先见之明，但当时我以为他太自私，胸无大志，这样一来，我必得告诉他利害关系，他可以继续通过中图发行香港《文汇报》，但绝对不允许他以报社的名义行动，这不仅仅是错误的行为，而且是犯罪，我还力促大连市委宣传部下发文件至社会各界，声明他不代表《文汇报》，但以后较长一段时间，他依然在四处活动，我们决定以自己的成绩与其竞争，很快他就垮掉了，不过，听说他后来改行搞房地产，最终发了大财。这说明他的确是很有能力的。

另一家造假的《文汇报》办站设在黑龙江省，它最初是由携款潜逃的关齐云在 1993 年底私立的，是关的一位姓张的亲友任职的，他经常以记者的名义参加当地风行一时的招商会，洽谈会，招待会，等等，我从关齐云留下的物品中发现了 25 本特约记者证，是蓝底金字，印制非常精美，这些东西就是张某具体操办的，他们究竟发出去了多少本，骗了多少人和钱财，不得而知，但《文汇报》内地员工管理混乱，良莠不齐，经常出现麻烦，则是明摆着的事实。

直到 1997 年，有一次，我到哈尔滨出席一次大型会议，在省委宣传部设的新闻中心，还差一点与假记者碰面，工作人员说，你们《文汇报》记者刚领走了会议发放的礼品袋，我并不在意小小的工艺品，问题是袋子里还有会议日程表和入会者的联系方式，这些东西对我写作非常重要，那个假记者还留下了签名。我明白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驻黑龙江记者站一

直没有正式建立，我不得不飞来飞去，疲于奔命，而这个关齐云留下的假记者就像假李逵一样困扰着我很久。

于是，我忍无可忍，就根据关主任留下的地址，给哈尔滨建工学院的那个家伙写了一封信，我警告他，如果再发现一次类似事件，我会向公安局报案，但我不想让他坐牢，因为那样有点对不起关齐云。此后，他销声匿迹了。

对送报师傅不能做“铁公鸡”

《文汇报》对内地员工的薪水控制得非常严，这有点冷酷无情，我是东北办艰苦创业的元老，每月薪水不过 2800 元，至于送报员就更少了，少得难于启齿，一个月不过五六百元，但既便如此，想在大连找到一份这样的比较轻松的工作，也是很难的，因此，我做了很大一份人情。

面对社会上就业难的状况，我制定了一个当办事处主任的原则：选用人员，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尽可能回报过去帮助过我的人，所以，三个送报员里，有两个是我的熟人，一个是中学老师李牧，一个是下乡知青朋友郭芳盛之兄郭芳霖，另一个是公开招聘的人，他们年纪都较大，又要每天骑车送报，也不容易，我告诫他们首先要注意安全，但我没说，报社不同意给他们买任何保险，而送报则必须穿街走巷，也就是说，如果一旦致伤致残，《文汇报》就绝对会翻脸不认人，我只有代人受过。因此，我知道关键问题的所在，日夜不能安眠。所以，一方面我经常提醒他们以生命安全为第一位，送报第二位，免得出事；另一方面，我充分利用我的权利，变通地为他们谋取一些福利，比如，给有的员工家里按上了电话，每月报销固定数额的交通费，逢年过节走访送礼，等等，总之，报社从不把送报员的生活问题，拿到桌面上讨论，一切琐事都压在我一人身上，并画了一条薪水支付的底线，如同铁公鸡一样，真的一毛不拔，或者说，只想马儿跑，又想不吃草，尽管如此，我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关爱他们，使我至今回想过去，觉得问心无愧。

记得非常有趣的是，送报员郭芳霖上任的第二天，他的弟媳妇给我打电话，向我大发雷霆，原来，郭与其妻向来关系不睦，争吵不休，我与他们都是混得很熟的三十年的朋友，她指责我应当把这份好差事给她家的亲友，不应当给先生的哥哥，我耐心地解释，也没有恼怒。后来，我被捕入狱，许多人帮助我的家人，因为郭的弟弟在检察院工作，太太认为我有恩于他，就请他打听我的下落，但不料，郭的一家人特别冷漠。。。。。。2006 年我获释后，太太曾向我发老骚，指责他们忘恩负义，我开导她说，你受到别人的邦助，一定要永远牢记，并尽可能回报之，但反之，就不必苛求，因为帮助它人是一种高尚的境界！

回首以往，我认为《文汇报》的领导层，没有这种思想境界。别看报上讲得天花乱坠，但行动上铁公鸡式的冷酷无情，人人皆知，不用讲《文汇报》在关键时刻，如何卑鄙地出卖了自己的员工，{这方面根本无法与《海峡时报》相比，它最起码还能把刑满释放的程翔收回去工作}，只说《文汇报》港馆的记者，与内地办站员工的社会福利相比，就有天壤之别，只不过深藏不明而已，如果公布出来，就会引起众怒。我想，每一个香港《文汇报》领导者都应当扪心自问：你们高高在上，拿着上级的任命书，舒舒服服地当上了老总，只要会拍马屁和唱颂歌就能富贵荣华，其实，每发行一份报纸，每揽一单广告，每发表一篇文章，你们

剥削了多少内地员工的心血和汗水啊！

我相信，我领导下的每一个送报师傅和广告业务员，都能讲一段动人的辛酸故事。这正是我 1999 年断然中止自办发行报纸的真实原因。可惜，中共一党执政的体系，不仅封住了记者的嘴巴，而且泯灭了做人的良知，正如近年那些涌入大陆捞钱的外企老板一样，他们哪一个的富贵，不是建立在对廉价劳工的剥削之上？特别恶劣的是，以教育他人，以爱国爱港自誉的《文汇报》却从来不反省自身：如何榨干了内地员工的血泪，换来了名利双收！

诚实的错误——《文汇报》内幕之十一



左，《文汇报》社长张云枫，右，姜维平，90 年代中期摄

诚实的错误

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

《文汇报》的员工分成两部份，一部份在香港，大约有四五百人，主要是各个编辑部和管理人员，有香港人，也有“表叔”{中共内派干部}，我们戏称他们是“皇军”；另一部份呢，在国内，主要是驻内地的办事处和记者站人员，大约 100 人左右，表面上看，“办”比“站”大，但实际上两者没有太大的区别，由于它以承揽广告为主，新闻报道为辅，所以，谁的业绩好，谁就是老大，我们自称“伪军”。我是东北“伪军”的军头。

1994 年初，东北办刚开业的时候，我深知创业的艰难和吸引人才的不易，《文汇报》最初对我能否承担这付重任似乎有所疑虑，应当讲刘永碧是一个看人很准的人，她敢于用我必得经受一点风险，我不是党员，却是资深媒体人，写稿没问题，但能否拉来广告，自负盈亏，是一个新的考验，她顶住压力大胆地起用我，使我产生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我也自知感恩，所以，在头几个月里，我干得很努力，不仅有几十万的广告收入，还有数十篇的新闻稿发出。

我的想法很单纯：我得让信不过自己的人闭嘴，也让刘副社长脸上有光。

东北办主任不能总是“光杆司令”，我得有几个得力助手和同事，我告诫自己，应当像刘永碧对待我那样无私地选人，于是，《文汇报》在《大连日报》刊登了《招聘启事》，接到了一百多封应聘信，我重点初选了十几个人面试，其中不乏品学兼优的年轻人，媒体编采人员居多，但我告诉他们《文汇报》的特点，它是香港的报纸，首先要生存，目前，它需要的不是会写作的记者，而是会做生意的广告业务员，立即，很多人都望而却步，他们认为，做广告业务是低三下四，求人的事，类似企业的推销员；而做记者走南闯北，“只唱颂歌，有吃有喝”，受人欢迎，但《文汇报》不需要，他们很失望，所以，一下子我海选的范围变窄了，最终，我物色了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出身的年轻人 C 某，仔细查看了她的应聘信，发现了三个错别字，心里很不安，但从经历看，她曾做过文秘和营销员，而且最重要的是，她的父母都已退休下岗，家里的经济状况很不好，她急于改变，我想，或许手把手地引导她，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广告员呢。问题是，如何能够吸引更多类似这样的年轻人？

我和她通了电话，约定了见面的时间，正好，她供职的某公司在大连东方宾馆租房办公，那家国企宾馆的老板是我的老朋友，在见她之前，我通过他初步了解了她的情况，我的朋友说，如果你们选记者，她肯定不成，如果找能交际和拉广告的业务员，她最合适，我很高兴，这正和《文汇报》的要求，我想，必得向她显示出报社的实力，潜力和吸引力，才能打动她，于是，我在宾馆的大厅和她第一次见面时，故意把新买的手机放在茶几上。

现在，手机不算什麽贵重物品，那时可非同寻常，大连第一批拍卖手机时，一个吉利号是 8 万多元啊，记得是被一个私企老板杨某买走的，《文汇报》第一次公款给我报销的手机费是 7 千多元，所以，当时持有手机是主管身份和公司财力的象征，大概就是这个可笑的派头吧，我找到了第一个同事，她一直努力工作到 2001 年底，我被捕后，她被留用了不长时间才离职。

鸡蛋里面挑骨头

有了一两个广告业务员和专职司机之后，我原以为自己的精力，可以全部专注于新闻报道，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文汇报》把我们当成了赚钱的机器，名义上，它是报纸，实际上，它是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跨国的大型广告公司，而办事处和记者站，则是它枝杈般的内地分支机构，既然，它给了我很响的招牌和丰厚的物质条件，特别是办事处“首席代表”和“高级记者”的头衔，那麽，就等于卖身投靠了中共外宣的营垒，我像一个齿轮和螺丝钉般，身不由已地拧进了共产党的战车，白天黑夜，不停地旋转。我不仅要出席各种名目的新闻发布会，不断发出稿件，而且，还必须亲自处理广告事宜，讨价还价，签订合同，商定版面，催款结账，忙得不亦乐乎。

报社在大连设立了一个人民币的账户，发票是内部印制的，一切财权都在我的手里，领导信任我，让我兼出纳，我可不想学习前任关齐云，出经济问题，也不想受嫌疑，所以，我推荐大连市委办公厅的 Z 某做兼职会计，这对他是第二职业，对报社是个“定心丸”，两全其美。总之，我挑起了三副担子：新闻，广告，财务，而且，我们是白天上班，港馆的编辑部人员却是夜里九点上班，特别是外联部的主要领导，也大都在夜里通过电话，发号施令，所以，我深感压力。

不过，对我来说，压力最大的是管人，这是我的弱点，至今我也是喜欢一个人独往独来：散步，写作，思考，不喜欢热闹，但那时必得管理办事处的业务员，司机，临时工，等等，显然，他们各有想法，比如，报社给的薪水太低，又不能解决住房问题，司机和送报员都怨声载道，广告员因为有提成奖励，工作比较安心，但没有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也时有怨言，所以，我必得做好思想工作，我仿照了过去父亲的办法，经常走访他们的家庭，也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几年下来，我可能是十几个办站里，最深入生活的领导之一，我走访过所有的员工家庭，熟悉他们每个成员，也无私地帮助他们，以致他们的父母生病，我都到病房探望，但有些事涉及到财务，香港不同意，我不得不违反财会纪律，私下变通地给他们报销一些费用，包括交通费，书报费等，时间久了，也招来总社财会部的指责，但我把委屈深深地咽在肚子里，对其不予理睬，这样一来，办事处的人心稳定了下来，工作走上了正轨。

然而，90 年代后期，《文汇报》从天而降了一位财务部主任王某，据称是浙江人，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推荐的，他与以前的负责人陈洁美不同，陈的先生是《文汇报》副总编王伯遥，他们两口子都是心胸宽阔的老好人，对我很信任，也很宽容，但王某不同，他像是故意找茬，经常鸡蛋里面挑骨头，与办公室的主任林某某，刘某某结成联盟，以查账为名搞内斗，矛头表面对准我，实际上是攻打刘永碧，而刘永碧又与总编辑刘再明争吵不休，隔阂很深，社长张云枫是老滑头，态度暧昧，两头不得罪。所以，我夹在中间，心情很不顺。

后来，我索性裁减了员工，取消了发行业务，自己考取了驾照，也减少了司机费用，但办公室的主任刘伟昌依然排挤我，后来终于抓住了我的把柄：给《前哨》投稿。2000 年 6 月，他是奉命赶到大连辞退我的主管领导之一，从此，《文汇报》在大连的业务一蹶不振。

司机把汽车停在桑拿浴门前

我的助手，办事处的司机姓 Q，是大连市委副书记某秘书推荐的，他父亲是著名的外科医生，外称“Q 一刀”，可见技艺高超，但儿子实在不太争气，他喜欢玩，经常光临酒吧，饭店，桑拿浴，歌房，舞厅等，而我呢，只要没有工作上的应酬，一般不去休闲娱乐场所，这样，下班后他就把车开走了。当时，我们的经济条件有限，租不起车库，白天就停放在外面，夜里只有交给他，我想，他应当严以自律，但实事上并非如此，有时，晚上有突发事件，我有采访任务，必须立即出发，我打电话给他，竟没人接听，第二天早晨上班，我批评他，也当成耳旁风，屡教不改，我为此很烦恼。

有一次，竟发生这样一件事，我夜里接到香港总部电话，急需立即回到办公室处理公务，但找不到司机了，只好打的士应急，不巧在路过一家桑拿浴时，看到了办事处的汽车停在那里，我气得要死。。。。。。第二天，我把司机辞退了，但行前我和他讲明了道理，为了安抚他，给了他一点经济补偿，但《文汇报》财务帐上不便列支，我只好把自己当月的薪水给了他，我记得，那时，我接过汽车钥匙，把他送到楼梯口，正巧一个女同事从电梯出来，我讲了 Q 师傅离职的事，以前他们相处很好，有说有笑的，但现在，那位女子异常冷淡，我很生气，说，人之将离，其言亦善，他要离职了，以后不知再何时见面，你为何这样冷淡？她答，《文汇报》的人，不都是这样吗？

是啊，我想到关齐云失踪之后，我问过许多领导，同事，他究竟出了什麼事，他们大都闭口不谈；广告部的经理梁某被辞退了，也是类似；还有一个副经理伍某与我很合得来，她一度离开了《文汇报》，另谋高就，我深感可惜，便向一个同事打听她的新工作地点，想去

拜访她，但那人说，你别自作多情了。。。。。。而此人，以前是与她合作最好的同事。

于是，司机走后，我悲哀与失落了很久，我想，别看他们现在对我毕恭毕敬的，我如果有一天被上级解雇了，他们也会像对待师傅这样冷漠吧。。。。。。后来，我入狱了，一切都像复制似的，应验如此。在长达五年零一个月时间里，没有一个《文汇报》的员工去看过我或者我的家人，而我在《大连日报》上，却看到了《文汇报》领导到访大连的消息，我想明白了，这是一张共产党办得报纸，既然我拿了它的薪水，又批评了中共的官员，他们就认为我是叛徒，是“吃里扒外”，中共对叛徒向来是不讲情面的，另一部份对我略有同情感的人，也必须装聋作哑，与我划清界线，因为要保住饭碗啊！

诚实的错误

建站之初，我写的最多的文字，不是报道，而是报告，《文汇报》设立了外联部，由副总编兼副社长刘永碧担任负责人，只有两个部下：萧选诗和陈桂雄，别看人少，管理却很严，东北办事处既远在东北，鞭长莫及，又新近成立，白手起家，所以，领导最不放心。因此，大事小事都要打报告申请，批示，汇报，为此，消耗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

那时，我对上级真是忠心耿耿，正因为愚忠，有时不但没受到表扬，反倒自找苦吃。记得有一次外出旅顺采访，路上共三人同行，我，司机，业务员 C 某，只有我一个人没有驾照，他们都自称驾龄超过五年，所以，我对他们很羡慕，很信任，途中，C 某说她能很熟练地驾驶，经常在高速公路奔波，能否让她开一会儿，因为是新买的高档奥迪车，司机不太放心，我说，可以叫她试试嘛，为了显示我的认真和宽容，我又亲自查看了她的驾照，于是，他坐到了方向盘前，一路向前奔驰，但很快发生了交通事故，汽车在右转弯时，与前面会车的一辆大巴相撞，损失惨重。。。。。。当然，责任在 C 某，维修费支付了 29800 元，好在我们参加了全额保险，理赔没有任何问题。

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三人知道，我用自己的钱预付了修车费，等理赔结束后，我的钱就如数回来了，按说，我可以向总部隐瞒，但我认为是我犯了错误，应主动申报，并接受上级的批评。于是，我给外联部打了报告，刘永碧看了非常生气，报社花了 33 万元，给东北办事处买了豪华汽车，时间不出一年，就交通肇事了，她很心疼，专门打来电话，气冲冲的训斥了我，当然，我只字未提自己预先付款的事，只有诚恳地认错。

另一次，我更是自讨没趣，大约在 1995 年，也就是司机 Q 某离职后不久，很多人推荐了新的司机，一个在大连锦绣小区搞房地产的女老板找到我说，他儿子有多年驾车经验，但暂时没有太好的工作，如果能聘用他，既使薪水少也没关系，我答应试试，他上了几天班，的确开车很熟练，为人也不错，但发生了一件事，把我吓坏了，他妈妈来拜访我，给了我 5000 元的大红包，还说，她搞房地产，以后会考虑给我一套房子，我问，你既然很有钱，为何不把孩子送到机关去工作？她说，《文汇报》这个牌子，你不会利用啊！儿子在这开车，对我最有用。。。。。。我恍然大悟，立即谢绝了她，试用期没满，我就把他打发了。

事后，我又自以为是地向刘永碧打了报告，以证明我的公正无私，但上级没人表扬我，只有外联部主任陈某对我说，他们不相信你汇报的廉洁情况是真的。你何必弄巧成拙呢？！。。。。。。然而，这事的确是真的啊！我为此伤心极了。后来，我在狱中反省，没想出我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却念及旧事，幡然猛醒，既然，1989 年“六四事件”之后，《文

汇报》就变成了引导舆论和制造谎言的机器了，他的领导讲假话，大话，空话，已经变成了常态，那麽，它怎麽能相信自己的部下是诚实的呢？难怪刘永碧对我有这样的评价：姜维平，太书生气啦！

《文汇报》的表叔时代



“表叔”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是香港人对《文汇报》领导层人员变化和方针转向的嘲讽和调侃，但究竟从何时算起，颇费思量，这是因为我加盟《文汇报》较晚，大部分时间在东北工作，与报社核心层领导接触不多，但所幸近日不仅有不速之客提供内幕，而且，在我写作的多伦多大学图书馆里，有李子诵先生 1989 年创办和编辑的整套香港《当代》杂志，供我参考，他撰写的《国运与报运》一文，令我茅塞顿开：可以肯定的是，“表叔时代”始于八九“六四”，此前，《文汇报》是中共高层人物与民主人士合作的产物，此后，它已逐步演变成了共产党的对外宣传阵地，或者叫“喉舌”。也许洞悉了报社领导层的一些决策人物的来历和特点，以及走向和结局，就找到了拨开掩盖《文汇报》迷雾的锁钥。

《文汇报》的表叔时代——文汇报内幕之十二

有一位熟悉《文匯报》的朋友對我說，你們《文匯報》的班子複雜得很，被安插上六個派系的人物：黨政軍，還有地方、國安、公安。到底哪一位人物隸屬哪個單位，相信沒有人說得準。從歷史上來看，國安早就派人插進來，有的是公然派來的，比如，原海南办主任林某，就曾在省安全厅工作过，亦有假借“求職”的，再通過核心人物的內應而進入。這個情況《文匯报》及《大公报》都有，但以前不多，那個時候還是黨與民主人士合作，他們不能過分，到 80 年代就開始陸續滲入，到了 90 年代已是“表叔”執政，各個部門都有外派幹部，他們打著記者、編輯的名義，就可以到處活動，對外從事他們的某些工作，對內則拉幫結派。消息人士列举了几个重要人物，而以下所述，可以隱約地捕捉這種神秘的影子。

陳某明，统战高手

從 70 年代開始，《文匯报》就有意識地吸收大學生，只是报社能付出的薪金與社會工資有一段距離，不過仍有一批又一批大學生追求他們的理想，踊跃地参加了工作，不過能夠堅持下來者並不多，陳某明是其中的一位。

“六四”事件发生后，有一批人離開《文匯報》，陳某明則選擇留下來。在李子誦被“停職”那段沸沸扬扬的日子裡，某天晚上，有幾個離開了《文匯报》的人，來到報社門口叫陣。當時，張雲楓開始掌握部分权力，他的工作相當吃力，加上他又是一個沒有魄力的人，因而，企圖選擇鴕鳥政策，不料，陳某明挺身而出，他說，由他出面到大門口跟這些人對話，這個建議得到張云枫的批准，即是說，就讓這些來自資產階級大學的人，用他們的觀點和語言去跟另一批人辯論。對話的內容如何，不得而知，事後內部亦沒有进一步談論。想不到陳某明因此一舉成名，受到工委的賞識，從而扶搖直上。人們可以認為這是陳的投機，不過從另一個度來看，人各有志，這一批人認為該怎麼辦，另一批人可以不同你的意見，求同存异，如此而已。陳某明最大的得益是工委要搞一個“新聞工作者聯會”，陳被推上出任這个联會的主席，成為左翼中下層人員（記者、編輯）聯合組織的頭頭。

陳某明是在訪美期間出事的。美國新聞處每年都有一些名額邀請香港的中級人員訪美，那一年是陳與阮紀宏同行。當天早上，阮不見陳來到餐廳，打個電話上去，房間無人應，酒店派人去開門，陳已僵斃在床。經解剖，他心臟的三條血管都已閉塞。接近他的一个同事说，他一直以為陳不注重身體，因為三條血管都閉塞，本人一定會感覺到某些先兆。後來这位同事的一位至親，檢查到他也是三條血管閉塞，拖了半年才動手術。經問，他的答覆是毫無跡象，從來沒有心胸翳悶的感覺，他是因為肺氣腫不能治癒，經轉換醫生懷疑其心臟檢查出來的。這事否定了他對陳某明不注重身體的看法。

不过，陳某明生前的生活不很正常，则是事实，他經常深夜下班後與一批同業夜宵或搓麻將，有時通宵達旦，這是按報社的要求做的，《文汇报》向來鼓勵同事們去做統戰工作，非如此怎能联络上一些同業呢？可是這又是許多人都不願做的事。當時編輯部肯做這件工作者，只有陳某明和副總編游某林而已，後者聯絡的是老一輩的老總級，而陳做的交往對象是中年的中層人物，分工不同，對象各有側重。陳去世後，這件工作沒有人做了，而游某林在“六四”後，他沒有了李老作後台而興致索然，年紀一到，他選擇了退休。從此張雲楓選擇了閉關，罕與外面的同業主動打關係，因為他不是做公關的人材，到 1998 年藉著《文匯报》在港創刊 50 周年，始宴請外界的老總。至於那些外派幹部是從來不會主動做這個方面的工作的，他們是坐待人家來朝拜，所以，90 年代以後，《文匯报》與同業之間的關係發生了一些變化，因為他們亦不必來求《文匯報》了，他們有甚麼事，可以逕自去找新華社（或中聯辦）。

劉某明，看风使舵

前几期，笔者涉及到了刘某明，但有热心读者写信给我说：你寫錯了，他從來不是廣州《南方日報》的總編。當日，一位《南方日報》的朋友读了香港《开放》杂志也問我，劉某明怎麼當上总編的？他在《南方日報》只是從事業務工作而已。看来，我高抬了刘某明。

實際的情況是，只因“六四”之後，工委為了加強對《文匯报》的領導，從新華社把原任宣傳部副部長的劉某明派來當副總編，以至總編。我 1994 年加盟《文汇报》时，张云枫是社长，他是总编，两人搭档，但关系不太默契，时常发生冲突，有时，他们的矛盾掩饰不

住，竟在办站工作会议上表面化了。

也許由於他不是“紅褲子”出身，在編務工作上，不很適當而被劉某碧看不起，其实，劉某碧另有後台，她的先生是刘某安，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的副部长，他们夫妇曾是新华社驻比利时记者，在北京高层有人脉关系，所以敢於與他抬扛。這種情況在過去是罕見的，《文匯报》在與民主人士合作期間，你我他之間，即使有甚麼意見不合亦只是暗中埋怨，連暗鬥都沒有，因為大敵當前，我們面對的是“港英”和“蔣幫”，說甚麼都不會公開拆台的。只有到了共產黨公開領導，黨員領導之間就可以吹鬍子拍枱子了。

我想，有一件事最能洞悉劉某明的思想性格，它发生在 1997 香港回歸前的中英爭拗時期。有一天，《文匯報》在主要版面的顯著位置上，刊出周南的一首詩，介紹文章說，周南聲明這首詩還未成熟，不宜刊登云云。倘若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未成熟的作品也可以作為一顆炮彈，不過這首詩無此作用。那麼，這首詩寫得怎樣？香港某大學修讀中文系音韻專業的人士评价说，不论内容怎样，它最大的缺點是，平仄不符！

試想，一份地方報紙，在顯著版面刊登市委書記一首不合格調的詩作（若是放在副刊又當別論），其目的是甚麼？如果不是出於對敵鬥爭的需要，那麼，只有一個結論——“擦鞋”（拍馬屁）。其實，這次拍馬屁，分分鐘會拍到馬屁股上，因為此舉會讓周南自暴其醜。不過，我未聽說過周南有怪罪下來。如果說文匯報的報格日趨下降，那麼，這家報社刊出這首拍馬屁詩作應是其轉捩點。

总的看来，刘某明给我的印象是矛盾的：一方面在会上言辞激烈地抨击官员的腐败，一方面又以中央信任，我们是“政治家办大报”而深感自豪，唯一的一次与其私下谈话，发生在 2000 年初，他流露出对刘某碧的不满，并把这种情感殃及我，实际上，刘某碧发现和重用我，以至辞退我，都是出于公心，我和她没有任何个人交情，刘副社长，尽管与他冲突不断，但从未向部下流露过，身为女性，实可赞也，由此观之，刘某明除了善拍马屁，还气量小矣！

不過，劉某明也有骨頭硬的时候。据說，2000 年底，劉某明要退休了，他的社長兼總編輯要交棒，工委推出了新社長，要求劉某明暫時留任總編輯，這是明顯的降級留用。倘若從過去他所追隨的理想和性格上看，革命者是不应計較權力與地位的，但他拒絕了，套句老話叫做“不再革命”了。

周博士，左右逢缘？

绰号“周博士”，職銜是《文汇报》副總經理。一個沒有高文凭，没有特殊能耐的人竟能爬到如此高位，當然是有一定的因由。

消息人士称，周某小青年的時候來到香港，投靠他的遠房親戚廖一原。廖是《文匯報》的中高層干部，職銜編輯主任，後來廖抽調出去搞新聯影業公司而成為左派電影界的大頭頭。

最初，廖一原把周某介紹進《文匯报》當小厮，其後當上了交通員。交通員的工作是每天把報紙、稿件、信件送到深圳，與廣州辦事處來深圳的交通員交接。當時廣州的機關定閱香港報紙者不多，所以，他的工作是個優差事，但責任重，因為曾經發生過《大公報》的交

通員。把一批手表挾放在報紙中走私進口的案子。所以，對交通員的要求是政治上信得過，此外還有一些密件直交老總的，周某在金、廖兩位老總心中是有一定的位置的。

70 年代初，廖靄民把他提升為記者。當時他的採訪技巧和文字水平均一般，只因要求不高，周某得以濫竽充數。適值尼克松訪華，領導上號召大家廣交朋友，以打破左派圈子狹窄的窘境，在這個方面，周博士倒是做得不錯。他與外面的記者廣交朋友，每當一群人見面時，他往往主動請客，因此，贏得“周博士”的美譽。這種請客的费用可以報銷，但他报得不多，或者他有時忘記了，弄至經濟拮据，常常與妻子吵架。

到了 80 年代，民主人士余鴻翔不滿說，編輯部的人員進佔了經理部（其實，只派去了兩人當主任），為了緩和余的情緒，金總作出了調動，從經理部收回一兩個人，不過卻又巧妙地把周某派回去，因為周博士原職交通員，是屬於經理部的。周對這個決定亦心領神會，他回去上班時對余鴻翔說：我回來了。周的這一次調動雖是金總的決策，不過其中有張雲楓的獻計，從那個時期開始，張雲楓對報社人員的調升有參與權。另外，周被調升是當上了廣告課的課主任，一位從未從事過廣告業務的人，能跨越其他的老廣告員走高，令同事愕然。此後，周官運亨通，先是業務經理兼廣告部經理，進而升任副總經理。

這些升遷都有張雲楓的影子，其實，他是張雲楓插在經理部的棋子。不過周除了交際上有些成效之外，其實他對所管轄的廣告、發行兩個部門的業務運作，是頗為生疏的。知情者说，80 年代《文匯报》仍是政治掛帥，間中有些大新聞需要版面，編輯部想抽离一些廣告。每當發生這些問題时，周就束手無策，一定要把李姓副主任從九龍召回來解決。由此可見，儘管周當了兩三年的課主任，可是，他對廣告員—客戶—廣告位置等問題一無所知，因為他的腦袋裡欠缺這個方面的本領。

有三件事情可以了解周的性格和社會關係。第一件是他的妻子去世，有一位《文汇报》的老报人到靈堂一看，可以算是大失所望，頗為冷清，廣告公司方面是有一些人和花圈，但是報販代理卻是少得令人出奇。文匯過去是採取分區代理制，關係密切的報販代理有七八個，這些人又是長期合作，決然不會禮不到、人不到，這就顯示出周在發行方面，他跟報販代理的關係很疏離。消息人士表示，第二件事，是廣告部一位職員曾經問他，给周提意見，他會不會報復？他當然是替他講好話的。不料，過了兩天，這位職員馬上否定了他的話。至於周如何報復，只有他们知道。第三件事，是发生在前幾年，消息人士说，某友從多倫多打電話與他敘舊，閒談中說：“周這個人，我就不想再跟他交朋友了”，這一句話嚇了他一跳。某友原是周通過工作輾轉認識的，並與《文匯报》有生意上的合作，之所以認識他，亦是周介紹的。想不到十多年後，他竟會說出這麼一句話。這句話的原因，並非周佔了他什麼便宜，而是表達出他对其为人失望的觀感而已。

那麼，周是否屬於“勢利眼”？还有更多的事例判断，第一，是廖靄民把周從交通員提升為記者的。廖其後被中共認為思想極左，調回廣州學習、工作。一些老同事路過廣州時會去廖的住宅探望，但周從不作此舉，顯示出他是對廖靄民“劃清界線”。第二，是對金堯如，是老金把他從記者提升為廣告課主任的，可是“六四事件”之後，周雖不致於不敢與老金接觸，不過話語間頗有揶揄的味道。然而在過去，在他充當交通員的時候，他經常在同事面前吹捧金與廖，講他們二人如何勤奮學習，如何孜孜從公，甚表感嘆（可能金、廖聽到此類反映而對周刮目相看）。第三件事是對廖一原。周又是廖一原介紹進《文匯報》的，廖掌管電影界大權，周亦在同事面前吹捧顯示他與廖關係密切。前幾年廖一原病逝（廖在政治方面從

來沒有低潮期)，廖太太因為有一件不大的事情想找人幫忙，於是想起了周博士。周當日拍胸膛表示一定辦妥，不料過了許久全無下文。

那麼，一個沒有甚麼本領的人，能夠爬升到如此高位，在實際工作中又不須承擔甚麼責任，說到底，就是張雲楓的支持，至於周是否對張肝腦塗地呢？我就不清楚了。

周博士真是左右逢缘，据称，他退休後的生活，泛出與其個性有別的光彩。首先是他退休後去了加拿大，原因是“老來從女”，他的女兒與他相处很好，不過他每年回港一次。不料，去年爆出周已再婚而且育有一名六歲的女兒，據說是過去做廣告的時候在深圳認識的，其繼室為了照顧年邁的父母，已攜帶女兒回到四川。於是乎周變成了候鳥，每年奔波於魁北克—香港—四川之间。如此奔波是因為周已入了加拿大籍，他的女婿是開餐馆的，過去他們聰明地每年給周邈付入息稅，所以，現在周可以拿到較高的福利金。那麼，每年他大概可以拿到一萬加元吧，為了這一筆款項而心甘情願當候鳥，是他精明所得的另一大福气。

更大的福气是，尽管他已是加籍，但周某退休後就被“選出”任《文匯報》退休職工聯誼會的主席。其實，他長期不在香港，對退休會的運作起不到甚麼作用，也許只為有的人要把他的棋子插到聯誼會。儘管如此，周某應有自知之明，這個沒有甚麼作用的“主席”不做也罢，我不知道他為甚麼戀棧。试问，由一位外國人士出任退休職工聯誼會主席，不知道到底是《文匯報》的光榮，抑或是文匯報的耻辱。

劉某昌，深不可测？

别看刘某昌是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主任，但背后深不可测的力量，总在关键之时，把他推到前台，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连社长，总编都奈何他不得，这与其说是他有能力，不如说是归于《文汇报》的体制，他是藏在编辑记者身后的实权派，其知道的一切可能永远成谜，所以，刚来报社时有人告诉我，别人都可以得罪，但只有他万万得罪不起。

劉的父親是文匯报的記者，其父似是一尊胖嘟嘟的笑面佛，性格如同其外貌，从来与人为善，劉某昌則與其父親相反，恰恰是 180 度的不同。許多朋友談及，大家的看法相同，而且，大家都惋惜為甚麼一個如此好人，竟然養出如斯的兒子。

劉某昌是在 60 年代從香港到廣州讀中學的，當年，《文汇报》和《大公报》兩家有不少同仁把子弟送回內地讀中學，原因既是經濟問題（香港尚未實施九年免費敢育)，同時又想有個學習好環境。兩報都有廣州聯合辦事處，可以照顧這些學生。劉在廣州沒能中學畢業就經歷文化大革命，繼而上山下鄉，後來参了軍。在部队做什麼，他自己讳莫如深。

1978 年，金堯如返回香港，因劉父已逝，而其母親及弟妹都在香港，家里经济收入不多，老金眷念故人，立即把劉某昌弄回香港。金把他弄出來據說是略有曲折：先是劉要退黨始能批准出境，不過他到了香港之後，金不仅安排他恢復了黨籍，且把他安排在身邊當上了秘書，過去是沒有這個職位的，只因改革開放之後，老金內外的事務很多，劉三生有幸，從而認識了許多人物和處事手法，可惜他沒有學上老金坦率的胸襟和为人的真诚。1982 年，老金被調回國，劉在報社羽翼丰满，又爬上了另一個職位：社委辦公室副主任。社委辦公室是一個執行機構，它的最強的權力是執掌人事權。

消息人士透露，老金在被調回國後又返回香港，此时对刘的印象徹底地变了，老金說，劉某人你要當心，我剛被調回去，他就打我的黑報告。從此，很多人对刘又恨又怕，与他保持一定的距離。

那麼，刘究竟是干什麼的？我在报社任职期间，听到各种议论。有一次，報社高層討論某一位職工，劉報告了這位職工的方方面面情況，根據分析，其內容不是泛泛之談，起碼是從兩個以上的人物或角度進行過了解，簡言之是其已"立案"調查，雖然其中不乏誇張之處。劉的報告反映出，他對報社內的人物活動是花了一些心血的，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是电影里"地下工作者"的活動手法，多年來，《文匯報》內部是沒有專人做這種工作的，包括他的父親。

劉父生前的職位是社委辦公室秘書，但是，其管治的範圍很狹窄，從不做得罪人的事。劉進行的監視工作主要是抓總務部，難得總務部的主任對他俯首貼耳。總務部主管門衛，還有一批勤雜工友為各個部門作跑腿。劉直接或間接地抓三幾個勤雜工友或找人問話，他們心目中要監控的對象的言行就有個底了。監控的另一項工作是扣查信件，門衛收到的所有信件都要先行交到辦公室，這些來往的文件或稿件，有沒有遭到辦公室拆信檢查呢？在這裡不便點明，不過確實是發生過丟失稿件的事情，有位作者說，稿件是他親自送到灣仔道的，不料遭到編輯電話追稿，而且不止一次。

显然，這類活動是騙不過群眾眼睛的。有位職工曾經說，在報社內千萬不要隨便講電話，因為會被"辦公室"竊聽的，所謂辦公室就是指劉某人或其小班子。不過我是不相信這種臆測之言，整間報社有近百個電話分機，即使劉某有三頭六臂、即令他全部都錄了音，他哪有精力去聆聽呢。只是這位職工的推測證明了一點，劉某對報社內部的監視工作引起職工們的恐慌和警覺。

《文汇报》的一位资深人士说，某年春節前，跑深圳的交通員給他送禮，大概是一瓶酒和一些土特產品吧。《文匯報》內部從來沒有給上司送禮的習慣，他斷然拒絕了。交通員的工資都很低，亦沒有外快收入，他從那裡拿得出錢來買禮物呢？他说，我估計是有人故意指使他這樣做，即是說他已成為該名居心叵測者試探的對象，甚至有可能本人亦被他立了案。所以，他對劉某人的批語是"陰險毒辣"，並非臆測之語。

这位人士表示，有一次，一位辦公室副主任 X 君離職來向他辭行。經過幾年的努力，劉已經從副主任升為正職，以後調來的外派幹部都是擔任副職，但是這位 X 君只是做了一年多便要捲鋪蓋了。他寒喧過後，大吐苦水，他提到此次離職是不愉快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報社領導從國內調人員進來不依手續，暗示其間有檯底交易，他曾依照規矩多次頂住，而結果是自己被調走。另外一個原因是他與劉某人的磨擦，這時他說了一句話，劉某這個人是"康生式人物"。X 君聽後甚感興奮，他說他想了許久，總是想不出一個恰當的詞句來形容這個人，"康生式人物"，真是十分貼切。他分析說，是不是中聯辦依靠這樣的人物來監控《文匯報》呢？

根據劉的工作手段和處事手法，《文汇报》有很多人始終懷疑劉是與某一條線掛上關係，曾經有這麼一個說法，劉在來港前已經掛上了關係，亦有熟人否定我的判断。不過，從劉的官運來看，儘管經歷多任社長（可以說他是"六朝元老"——李子誦、陳伯堅、張雲楓、劉再明、張國良，再到今天的王樹成），如果说，他不是有某些特殊關係的話，沒有特別的技

能和工作成績，斷然不會在這麼複雜的環境中三十多年不倒，而且，扶搖而上，特別是，他一直掌管人事工作，從來沒有被調到別的部門。

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幾乎是每一任社長上場，劉主任起初都是不大得志的，可是，他是一個能夠沉得住氣的人，過了一段日子，他就會神氣起來，為甚麼？除了他的後台頗硬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所主管的範圍，即是說，他了解到某些職工的動向，這個管治制度使得這麼一個人物，可以發揮到任何一個社長都需要他的程度：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以，2000 年上半年，《文汇报》派他亲临大连辞退我，就不奇怪了。到了今天，他已是社長助理，排名在諸位副總編輯之前。

张云枫的另一面——香港《文汇报》内幕之十三

不久前，湛江新闻网发表了一篇文章，高度赞扬了原香港《文汇报》董事长张云枫，应当讲，有一些内容还是真实的，但张云枫也有另一面，即他的缺点和失误，如果说，“六四”时的开天窗事件是一个里程碑的话，此后的“表叔时代”令人扼腕叹息，《文汇报》完全背离了媒体真实客观，为民代言的准则，成了中共在香港及海外的喉舌，而张云枫就是全面向左转的领军人物。

春风大雅，只是笑谈

国内媒体的报道说，在香港《文汇报》的办公室里，悬挂着一幅显眼的镜框，上书：春风大雅能容物 ，秋水文章不染尘。张云枫十分喜爱和赞赏这幅文字。他认为：如果说“秋水文章不染尘”是讲究个人学问道德的话，“春风大雅能容物”便是教人如何待人接物，用自然现象说明一种哲理，倡导某种情操，“这种春风，就是人际之间的温暖，就是彼此之间的互相关心、互助帮助、互相爱护”。

我任职《文汇报》记者五年，多次与张社长接触，我的感悟是，他没有做到“春风大雅”，只是城府很深。记得有一次开会，我当众猛烈抨击了社委会工作的一些缺点，很多领导都惊愕不已，张社长没有表态，但脸色非常难看，后来有知情者告诉我，他很生气，认为我没有礼貌，而且，他没有接受我正确的批评意见，至于说人际关系，他很重视与上级的交往，但对我们下级则摆架子，不冷不热的，这一点远不如副社长刘永碧和王伯遥。

他的外表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道骨仙风和长者风度，讲话柔声细语，文温尔雅，但内心的做人标准讲究等级观念，他每次见到我时都会说，你的点子多，有好的议题吗，下一次全国政协开会，我是要拿议案的，可以参考啊，我知道，与其说他是想听听我的意见，不如说是想告知别人，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向来是重视这个头衔的。因为有了 1998 年的会上举动，我不再相信他有雅量海纳百川，所以，我没有浪费自己的脑细胞，他呢，既没有力阻国安人员对我的诬陷和监禁，也不敢在全国政协会上搞一个呼吁释放我的提案，这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张云枫对香港媒体给予他和《文汇报》的批评，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则是事实。1998 年，香港出版的一本杂志刊文记述了报社内部的一些阴暗面，我拿着此稿问他真实性，他笑了，说，我也看了，确切地讲，一半真，一半假。我说，你想发表文章公开反驳吗？他摇摇头，说，人家那么说也没什么啊!。。。。。。

学识渊博，不敢恭维

充满了溢美之辞的国内媒体，称 张云枫从《澳门日报》记者做起，直到香港《文汇报》社长，历时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为港澳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也首先肯定了他的渊博学识。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与張雲楓共事多年的资深记者对我说，你說張這個人“高不可攀，深不可測”。你對其他人的看法，都有一定程度的準確，只是你把張某看錯了，或者說是他精湛的演技騙了你。打個比方，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閣下對此不大熟悉，倘若你是個小不點，你當然會公開聲言一竅不通；倘若你是個中下級幹部，你亦會不耻下問；倘若閣下貴為大社長，你會怎麼辦？張某就是這麼一個人。

俗語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張某的文章卻是甚少嫻熟地引用詩句，翻一翻他自己刊印的一本專集《報苑尋蹤》就可以看得出來（並非編輯部出身的劉再明倒是會寫幾首詩的）。“文”是如此，“藝”的方面，琴棋書畫騎射等等，張某更是貧乏，從來沒有看見他橫車躍馬，亦不見他揮拍射籃或者哼上幾句粵曲，連风靡一時的語錄歌亦不見他獻藝，至於評畫論樂，我看不出他具備甚麼水平，因為他從不吱一聲，真是“深不可測”。為求進一步論證，不妨看看他結交的人，在文藝方面他是沒有朋友的，原因很簡單——欠缺共同語言，萬一談到“文”與“藝”，其人的底牌就會露出來了。

这位熟悉《文汇报》内幕的人士说，做新聞這一行就是要“雜”，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奇難雜症均要知道一點點，不懂就要“不耻下問”，可惜的是張某錯過了“不耻下問”這個階段，他當了兩三年記者，沒有甚麼成績，他亦自認不是這方面的材料（在其文集之自語），於是調任國際新聞編輯。加上他不善於交際，而在交際場合中沒有顯示出坦誠相待，不耻下問，於是一副“高不可攀”的態度自然流露了出來，導致他欠缺多方面的朋友。

他举出这样一件事例，来佐证他的观点：几年前，一批新闻界的老退休人員聯袂到某處參觀。在一個展廳裡，導遊說有一個珍品瓶子繪上許多個“萬”字。他擠到展櫃前，張某已在端詳，待退出時他仍在看。後來，他就問人：為甚麼我看不到瓶子上的“萬”字？原因很簡單，他雖然看到眾多的“卍”字，卻是聯想不起來。由此可見他在靈活、引申、領悟這幾個方面都是有所或缺的，這一點，很可能就是廖靄民把他調出採訪課的原因。

是政工干部，还是资深记者

那么，他是怎麼坐上如此高位的？上述的媒体报道掩盖了很多真实的信息。先看看他的簡歷吧。張雲楓是廣東湛江人，富家子弟，解放前參加革命，他跟隨所屬的游擊隊在大鵬灣登陸，跟著就迎接廣州的解放。他在廣州南方大學（實際上是幹部培訓班）學習之後派回湛江，後來出任東海島區副區長，可以說是年少有為。

以前我的文章提及陳建平命運之轉變，与他的老婆有关，其实，還有一個人與此相若，而故事更加曲折，這個人就是張雲楓。

且說香港有位鄭小姐，她們一家在日佔時期逃難到湛江，鄭小姐邂逅張雲楓，從此建立戀愛關係。戰後鄭小姐回到香港，進入培僑中學，畢業後留校教書。一晃眼到了 50 年代中後期，雙方年事已長、結婚無期。鄭小姐狠下心來向張雲楓攤牌，倘若張不能來香港結婚就

拉倒。想不到張雲楓竟然獲得上級批准，讓他出境來香港到《文匯報》工作。

不料，好事多磨，張雲楓在羅湖過境時竟不獲准入境，本來他持有國內的來往港澳證件，按照中港的協議，港英是不能不讓他入境的，而且，他來港是有工作單位聘请的。根據知情者的推測，很可能他事先沒有詳細了解入境应對的办法，故弄玄虛，三緘其口，守在羅湖橋頭的英警拒絕其入境，也在情理之中。從這件事來看，他確實是欠缺機靈的。不過，張確有一手，他被拒绝入境後，上級竟然安排他先行轉到澳門，在《澳門日報》先當了一年記者，1959 年末張從澳門再轉來香港。1960 年適值香港換身份證，既使原來沒有證件者都可以領取，何况是他这种情况？於是張順利地拿到了香港的身份，同時與鄭小姐成婚。

知情者透露，他们日治時代結識時双方只是十四五歲，到 1960 年結婚，確實是一段長達 15 年的愛情長跑。我曾质疑這段故事是否虛構？对方答案："否"。因為他的一位朋友在中學時代與鄭小姐同班，他說，他們幾個同學曾經打過追求鄭小姐的主意，後來了解到鄭已有了心上人，當時的左派青年們信奉尊重對方，不挖牆腳，他們也就停止行動了。如果換了今天，"近水樓台先得月"，整個故事就要改寫了。

其中有個很關鍵的問題，張雲楓有沒有後台呢？根據知情人的分析，50 年代，不論夫妻，还是戀人分隔兩地，絕大多數都是香港一方要回國的，從國內批准出來者甚少，除非該人有海外關係或者上级需要他來香港工作。從張後來的種種狀況看，他兩個方面都沒有，或者他原先是有的，後來他被上線放棄了？

无疑地，虽然湛江网把他捧上了天，仿佛以前他就是《文汇报》的中坚力量。但從張雲楓的採訪生涯來看，在"三狼"案中，他通過一名遠親的關係偵知黃應求確實已死，他自己承認這是最大的工作成績。值得一提的第二項工作是他為電影《東江之水越山來》撰寫解說詞。除此之外，他就沒有甚麼值得回憶的东西，他從來沒有擔任過重大的新聞採訪，即使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報社偶然要派人回國採寫一些"形勢大好"的新聞亦沒有他的份。

後來，他被調到要聞課編國際新聞。1967 年是一個轉機，當時國內開展文化大革命，香港亦發動了一場反英抗暴鬥爭，形勢尖銳複雜，張雲楓馬上從要聞調出擔任採訪課副主任，並且抓緊了政治學習，當時照抄國內的模式叫做"雷打不動"，即是說不管外面發生多大的事情，學習依然要進行。外面的群眾十分不滿地反映說，我們面對港英的血腥鎮壓，你們的政治掛帥卻是雷打不動，不管我們的死活了。

1968 年以後是張雲楓的風光期，這一點有兩個表現，其一是群眾敏銳地感覺到，張的名義是副職，實際上採訪課是他說了算。後來採訪主任被調出，張擔任了正採主。第二點是他成為廖靄民手下的紅人，亦是群眾根據一些跡象感覺出來的。當時廖已代替了金堯如的工作，廖不定期召集下列三個人碰頭，一個是《大公報》的攝影記者張某，第二個是香港《商報》的採主鄧某，第三個是張雲楓。群眾說，廖是通過這三個人來控制這三家報社的採訪課的。事實上亦如此，換了任何一個人坐在那個位置上都會這樣做。

知情人透露，從 1968 年到 1978 年這十年间，作为采访主任，張雲楓有甚麼成績呢？第一點，也是群眾公認的，他們認為張抓政治學習是很不錯的。可以說，張的工作屬性是政工人員多於新聞工作者。第二點，是他大量吸納和培訓新人包括為數不少的大學生。經歷過反英抗暴的大搏鬥和大鍛煉，港聞部的 12 位記者先後離開了，大致可以將之分為兩部分，一

部分是在鬥爭前後因為個人問題或者是他自己選擇更合適的工作而離開《文匯報》的，第二部分是因為“工作需要”而調升或平調到別的部門的，這 12 位記者絕大部分的新聞工作資歷都長過張。最後的一位被調走的是工齡很長的副主任黃某，他被調去當校對主任，明升暗降了，黃某對這個崗位是耿耿於懷的，不過他始終“服從工作需要”。於是 12 位老記者先後都被調走了，今後的採訪課都是由張雲楓招募進來的班子，都是他的子弟兵了。

招兵买马，意欲何为?

《文匯报》招募的新記者大多來自左派學校的中學畢業生，不過經過保釣事件之後多了一批左傾的大學生，於是文匯報有意識地吸納這些人從事新聞工作，先後增加了程翔、麥華章等大批新生力量。大學生來到文匯只能拿低薪，即是比他們在商業機構低很多，與新聞同業比較也是略低一些，所以，不少人是懷着追求理想的心態到職的，有人繼續加入來亦有人選擇離去，這個情況到報社逐步調高工資始告改善。

如果读者以為那些大學生，都是加入文匯報這個革命的大家庭，那麼就錯了。不是說所有新到職的大學生都是如此，有些人是带着高人一等的思想，來改造《文匯報》的，因為他们認為自己是社會的精英，眼睛只看到《文匯報》的缺點，而他們這些人是來“改造”报纸的，其中個別人甚至狂妄地把文匯的老記者、老編輯稱之為“土共”，20 多年下來，這類人仍是如此狂放。當然新老之間（或者是左校畢業生與大學精英之間）是有一個磨合的過程，張雲楓在這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不過，“精英”始終是精英，報社內部不少人持之以恆的做法令他们看不過眼，這種磨擦終於在某一個問題上爆發出來。

据称，那是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當時在新華社內部存在着兩派，一派是支持改革而另外一派則以種種藉口加以否定。1978 年 8 月底，第一家中外合資設廠合約在珠海簽字，这真是石破天驚。但是新華社的阻撓派佔了上風，他們制訂了一個所謂“只做不說”的鴕鳥政策，命令香港的左報不予刊發（另一個說法是中外合資法尚在制訂階段，為防將來有所改變，這則消息暫時不發以免被動）。第二天，全香港的報紙均以顯著篇幅報道這樁大事，獨有《文匯报》和《大公报》兩家左報沒有了這則新聞。

本來“無聞”的事情在左報常有發生，這是一種政治姿態，比如，1962 年的外流潮，外間報紙連篇累牘地報道了一兩個月，唯獨左報隻字不提。知情者说，他們這些“小不點”的记者政治水平低，一向是服從上級。現在來了一批精英，他們真正是表現出主人翁的身份，他們對不刊發這則消息大有意見，張雲楓說服不了，他們就組隊去新華社跟工委的領導辯論，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這批精英宣布當天罷工，這可是《文匯報》破天荒的事情。幸而他們也只是採取行動，沒有把這件事情捅了出去，外間鮮有知道，而且，那個年代港聞的版面不多，幾位出身於左派學校的年青記者沒有參加罷工，在其他幾間左報的支援下，這三幾位記者拼命抄寫新聞，總算把版面填滿。

文匯報記者集體罷工事件，實屬無組織無紀律思想的濫觴，1989 年“六四”事件出現更大的風波而且持續性長，實際上反映出這 11 年來沒有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用句簡單的術語可以這樣說，有關領導未能掌握民心、撫慰民眾，張某人的班子是相當脆弱的。知情者的描述说明了张云枫意欲何为，但远不如愿。

金尧如心胸宽阔，包容张云枫

金堯如回到香港之後，李子诵任社長，把總編輯的位子交給老金，儘管張雲楓是廖靄民手下的重臣，不過老金心怀坦蕩，沒有成見，到了 1983 年，還把張提升為副總編以填補一些老報人調職或退休的空缺。

文匯報的官方網頁中說張雲楓是 1986 年出任編輯，此事不確。根據知情者的回憶，文匯报的總編位置空缺長達五年之久，其間雖曾在北京調來楊正彥以主筆名義主持工作，不過只有一年多，楊被調走，李老沒有提出總編的繼任人。當時有兩人可以調升，除了張雲楓之外，另外一位是老報人曾敏之。

曾某在抗戰時已是桂林《大公報》的記者，解放初期他出任文匯大公廣州聯合辦事處主任，50 年代末期在廣州暨南大學新聞系任教。改革開放後調回香港，大公報不肯收容他（大概是派系問題，有一至兩位舊人大公都不肯收容），於是派來文匯任副總編。曾又是作家、詩人，論資歷、文才都遠勝过張云枫，可是，他的個性比較坦率而欠缺圓滑，如果他世故地敲敲李老的邊鼓，與之談詩論文，肯定會贏得李老的一票，總編這個寶座就是他的了。據悉，當時曾、張二人的暗鬥十分激烈，雖然仍未定案，不過新華社那邊似乎稍為向張雲楓傾斜，因為群眾間流傳這麼一個說法：《文匯報》發生了什麼事，新華社很快就會知道；而新華社放了甚麼屁，張雲楓亦會迅速得到風聲。原因是中間有個關鍵人物——新華社宣傳部秘書徐女士。

徐女士原是宣傳部的幹部，負責大小事務，沒有決策權，甚至不具備諮詢地位，不知什麼時候加上“秘書”的職銜。徐是上海人，在許家屯主政時代，新華社內部凡是會講上海話的人就吃香，換句話說，是“上海幫”抬頭。那個時候，張雲楓跟徐女士來往相當密切。這個來往很可能是徐主動，因為此人頗為懂得鑽營之術，估計是新華社的領導對張頗為欣賞，徐就把注碼押在張的身上，經常向他透露風聲，而張雲楓表面上是口密，但是在這個重要關頭他亦通過徐向上透風。所以，張獲得總編這個寶座，徐居功不少。到了徐在新華社退休，張就把徐聘請到文匯報任職，許多人都認為這是張假公濟私的酬謝。

借勢投机，待价而沽

1989 年“六四”事件，《文匯報》發生了許多事，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了。不過亦有鮮為人知的內幕。我曾在 1997 年几次当面求教于王伯遥和张建华，他们都守口如瓶，张云枫更是只字不提，后来才知道他的难言之隐。

首先是張雲楓有個外號被稱為“患病老總”，即是說他在風高浪急的時候會及時“生病”。與此相連的另一件事被人稱之為“臨陣退縮”。

先說“臨陣退縮”，那是發生在反英抗暴期間的 1967 年，一批左校校長去港督府抗議警察恣意搜查學校，防暴隊馬上來到把校長和記者分割包圍。張雲楓說他首當其衝，頭顱被警棍擊中倒地昏迷，不過很快就醒過來，看見警察在動手捕人，場面混亂，他馬上跳起奔跑到停在不遠的報社汽車上命令司機立即開車逃走，即是說，所有校長和記者都被捕，只有他一個人逃脫。我想，指稱他“臨陣退縮”者大概是一些極左人士吧，按照他們的觀點是要全部人員“慷慨就義”，才能算得上是“鬥爭”，所以，這個指摘是有點過分。

至於“患病老總”，是指他在鬥爭緊要關頭就會害病，前後發生過兩次。知情者说，第一次是 1968 年，張雲楓患有臉龐神經痙攣症，即是他的嘴角扭歪、唾液失禁下流，屬於不知如何治療的奇難雜症。據說要到深圳針灸，張為此請假较长一段日子。我认为，雖然那個時候中英關係仍然緊張，不過反英抗暴鬥爭的形勢已經趋于緩和，把他說成是逃避鬥爭而生病亦屬過分。

但是，第二次害病就不同了。大概是在 80 年代中期，張說他患上了心臟病，通過新華社的關係到廣州中山一院的高幹病房住院一段日子。到了 89 年北京民運興起，他又發病了，又請假了一段时间。那時編輯部的工作十分緊張，李子誦堅持上夜班指揮，當時的副總編还有曾敏之、游焯林、程翔、張晴雲。游焯林的政治素質不高；張晴雲是新提升的，經驗與威信都不夠；程翔是激進派，許多年青記者都圍繞在他的身邊。显然，北京中南海风云变幻，张不便判断形势，又不想站错队，就选择了巧妙的逃避。

張雲楓在此關鍵時刻生病沒有上班，造成报社内部意见分析，群龙无首。如何恰當地控制、掌握版面，如何排除紛擾的爭論，編輯部經常爆發唇槍舌劍，這些工作都壓在曾敏之身上，曾對張雲楓很有意見。張雲楓恢复上班时，大概是在程翔等一批人拉隊辭職的時候。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文匯報決定社論開天窗並寫上“痛心疾首”四個大字那一天，張雲楓是不在现場的。按照“官方”的說法，這段时间叫做“文匯报失控期”，曾敏之為此被批，遂遞上辭呈，文中有這麼一句话套话“我沒有做好工作，有負……”等等，憑良心講一句吧，按照民間的看法，在這段期間文匯報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做出了如實的報道，這段期間的功勞簿上應當記上曾敏之一筆，其他的編輯記者都要記上，不過張雲楓是不應該留名青史的，因為這段期間他是“生了病”的。

表叔时代的乱象

曾敏之離職退休之後，沒再涉足新聞界，後來在新華社策劃下成立了由左派控制的香港作家聯會，曾敏之德高望重，被推為會長，做出了一些成績，此是後話。但《文汇报》正式进入了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表叔时代”，张云枫成了大功臣。

張雲楓上班后开始在张俊生的支持下“收拾殘局”，新華社很快就派了劉再明到來任副總編，不過另一位副總編游焯林覺得“無癮”而辭職，他解釋辭職的理由是因為有樁小新聞：霍英東的一位兒子在美國偷運高科技零件出口中國被美政府控告“走私”，他認為這樁新聞以“霍姓商人被控”就可以刊登，可是劉再明卻將之枪毙，事後他知道是劉悄悄地請示張浚生作出的決定。游認為這麼一樁新聞都要左請示、右請示，張浚生事無巨细都要插手，這種工作方式跟過去比較已是大大的不同，遂申請退休，而張雲楓則提升了王伯遙為副總編。這個時候，三位副總編之中，除了劉是由上級派出之外，張晴雲和王伯遙都是由張雲楓一手提拔的，名義上是張雲楓的班子，不過他不能不看著張浚生的臉色行事。

“六四事件”是一个分水岭，此前《文汇报》还敢于讲真话，此后就变得鹦鹉学舌了。尤其是新華社有了教训，流行了一種不信任地方幹部的說法：萬一出了事（指政治鬥爭），你們這些香港幹部拍拍屁股就溜走了。所以，他們就提拔和增加外派幹部。張雲楓雖然來港許久並且在香港娶妻生子，不過他骨子裡仍是外派幹部。張雲楓被張浚生看中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他聽話。過去金堯如伙同李子誦經常打“擦邊球”，金堯如在國內的關係多，每有辯論，金可以舉出某某中央領導如何說，新華社的社長亦拿他沒有辦法。可是張雲楓欠缺

靈活的頭腦和圓滑的手腕，他在國內沒能建立起人脈關係，只好俯首貼耳地聽從張浚生的指揮，於是大量的外派幹部被请進來，比如刘永碧就是其中的一员大将。

不過三四年功夫，在張雲楓手上完成了“表叔化”（包括中層幹部），編輯部裡面已是實行普通話對白，地方的色彩越來越低了，再發展下來就如同《紅樓夢》中的大觀園：表面上風光，實際上是百孔千瘡。

才能平庸，误入岐途

張雲楓主政的十年間，他帶領文匯報走上什麼道路？首先，這十年間文匯的內部稳定，沒有發生甚麼激烈的人事鬥爭，或者說內部鬥爭沒有呈現表面化，這是他的德政。不過從另幾個大的指標就可以看出問題。

首先是版面的表象，報道的內容影響到报紙的銷路，這是一個硬指標。由於編輯部聽命於新華社，《文匯報》的版面只能依隨官方的調子來轉，欠缺群眾關心的新聞，李子誦曾經評說：連《人民日報》的版面都比《文匯報》開放。本來文匯的高層會聽到官方的文件傳達，這些傳達會成為權威性的報道，在過去，金堯如敢於據此寫出一些東西，亦敢於據理力爭；但是張雲楓和劉再明這個組合只會循規蹈矩，不敢稍作逾越。等到外間的報紙從他們自己的渠道作出了報道，於是文匯始予跟进。

如此一來，群眾就有這麼一句話：其實是文匯報證實了那些反動報紙報道的正確。這一句酸溜溜的句子，隱藏着工作人員的沮喪與失落，懷着神聖理想的青年們只有留下來或走出去兩條路，沒有數字統計留與走的比率，不過有個比較突出的事例，一位被戲稱為是張雲楓的乾兒子陳某亦選擇了離開，雖然陳某去的亦是中資機構的香港商報，而香港商報已經被深圳特區報所收購。陳某的離開不知是甚麼原因，也許他認為聽從特區報的指令會比張浚生的指令較佳。陳某畢業於香港大學，是張雲楓的重點培養對象，張對他本來是拉得很緊的。

張劉性格不同，前者沉稳，老谋深算，后者慷慨激昂，实则缩手缩脚，他们組合的共同点是“俯首貼耳”，保住物质利益。其特点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得出來，如果說，對國內的政治新聞不易走鋼線的話，那麼次一級的社會新聞是不是也可以發揮文匯報的強勢呢？

下面是我有一次街頭邂逅一位報社部門負責人的對話。當日我們談起文匯的銷路下滑，我指出連國內的新聞亦輸蝕給外間報紙，同時舉出一個事例，當日剛好發生雲南抓到一個贩毒集團，我問：文匯敢刊登嗎？該位負責人說這是負面新聞，我們怎能刊登？請看，張雲楓治下的文匯報就是要讀者們相信共和國的土地是一片到处鶯歌燕舞的人間樂土，把廣大的讀者視為吳下阿蒙。

還有一個例子，編輯部一向不重視自己辦事處的稿件。新華社、中新社和外國電訊這一類是大家都有的稿件，編輯們老是害怕漏發或是處理不當，給外間報紙比下去。至於自己各地辦事處發來的稿件則被放在次要版面、次要地位，不料間中這類稿件被中新社看中予以改寫發出變成了通稿，編輯們立即把它再發一次，放在顯著版面、顯著地位。這類重發自己已經刊登過的新聞不止一次，而且是一再的丟臉而不以為恥，實屬新聞界的奇聞。

销路下降，影响力减弱

第二點是銷路下瀉、影響力下降。大概是在 90 年代中期，文匯報的銷數比“六四”前丟失了約 40%，這是個很大的跌幅，張雲楓當然知道，因為印數多少每天都要呈報的；張浚生也知道，因為文匯要定期向新華社呈報。當時正在回歸前夕，中英爭拗白熱化，即是所謂“麥克風”外交時期，張浚生與末代港督彭定康就政制問題隔空罵戰。這種激戰原是報紙銷路上升的好時機，文匯報為甚麼不能駕着東風一紙風行呢？原因是報紙屬於一種綜合性的產品，不能依靠單一特點保持高銷數，查良鏞開辦《明報》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當時，查良鏞在《香港商報》撰寫《射鵰英雄傳》一紙風行，不少人說他們光顧商報是因為追看《射鵰》，查良鏞盤算自己只要把一半讀者拉過來，《明報》就有五萬讀者。於是他狠下心來，停止《射鵰》、腰斬《飛狐》，读者要讀金庸的武俠小說就得光顧《明報》。結果呢，《香港商報》和《新晚報》減銷不多，而明報的銷路打不開門面，員工一度要七折支薪。明報能夠站穩下來是另外的原因。

報紙的銷路與其影響力是相輔相承，間中亦有例外。美國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就是一例，該報的銷路不好，但是它的國際評論很受國際注目，曾七次獲得普利策新聞獎。但是文匯報的銷路不多，始終不曾拿出一兩篇擲地有聲的文章，士氣深受打擊，張雲楓亦是心中有數。記得在一次職工聚餐會上，張社長喜孜孜地說，有一次他與某名流談及文匯報，該位名流說：不是呀！我們仍然注意你們發出的評論的。一位名流的門面說話就被張社長視同救命草，在大會上津津樂道，以此說明文匯報仍有相當的影響力，由此可以看到他把一根救命稻草在全體職工面前亮出來，未免把職工們的分析能力看扁了。

其實，張浚生亦不是省油的燈，他治下的《文匯報》在對敵鬥爭的重要關頭日告萎縮，他能夠拿出甚麼方法來？過去，廖承志深深明白海外同胞的想法，懂得爭取“中落群眾”之重要性，所以他鼓勵李子誦放手去做。可是張浚生不可能具有這種魄力，他只能祈望文匯報不要出錯，因為萬一文匯出了差錯，張浚生將會是首當其衝，在出錯與銷數這一對矛盾之間，他只能犧牲銷數以換取不在政治上出问题。加上張雲楓亦沒有甚麼鴻圖大志，於是他就當上一名依着葫蘆畫瓢的兒皇帝。朝氣蓬勃的文匯報到了張雲楓手上只能是氣息奄奄。發展下來，千禧年過後，全由“表叔”主政，文匯報連方向都沒有了，成為沒有了靈魂的“行屍走肉”，连对艾未未落井下石的蠢事都干了，总之，它只不過是由幾位外派幹部领导的小集團控制下的一間企業而已。

费用增加，负债累累

第三點是負債纍纍，傷及筋骨。不可小窺這個經濟問題，它是文匯報的一個致命傷，其後遺症延續至今。

不错，文匯報现在有寬敞的社址，佔據該座工業大廈的三層樓宇，內部裝飾得美輪美奐，還有好幾座巨型的輪轉印刷機，單看其外貌是很令人對之肅然起敬的，沒有多少人會想到正是這座輝煌的社址，弄得《文匯報》不仅要債務重組，甚至連其董事會的成員在官方的文件中被列為“不可靠的人”。

据知情者披露，從 1991 年起，國內各地政府的招商項目不断推出，文汇报的记者站，办事处遍布大江南北，廣告收入直線上升，有的人沾沾自喜地說：這是文匯報在香港創刊 40

多年來從未出現過的好現象，应归功于張雲楓社長的正確領導。於是乎擴充人員、印刷設備和社址一事，就推上了議事日程，很快就決定選購香港仔這座工業大廈的三層樓房，並且增加人員、購置了新機器，还搬了新家，而噩夢亦由此開始。

在新廈落成的酒會上，不少客人帶着欽羡的眼光參觀新址，整齊的辦公室、寬敞的走廊，明亮的饭堂，甚至連洗手間都用雲石嵌砌，不過熟悉內情的人說：新址面積比舊址大了两倍，那麼光是電費也是增加兩倍。文匯報能負擔得起經常性的开支吗？诚然，搞擴充計劃是國內干部的拿手好戲，難得領導上大筆一揮，所以，他們的計劃一定是爭取多些上级的撥款，即钱是他们攤开大手向上級要來的，那么作为回报就是俯首贴耳听话了。

果然，佔地過大的問題很快就浮現出來。遷入新址、迎接回歸，可是香港回歸祖國並沒有給文匯帶來来喜訊，相反的是銷路與影響力的下降與萎縮，原先以為回歸後文匯的業務會進一步擴大，因而買下的大片地方一直空置着。

如果在國内，空置没什么，可是在香港，所有物業都要繳付差餉，這是政府對所有房產按照其所處位置及面積大小收取的稅款，不管你是在使用中或空置。由於空置的廠房年復一年地繳付差餉，無計可施之下，他們下令把屬下一間經已外遷多年的美術印刷廠回遷，實際上是要這家企業向文匯繳付租金，其實這家企業自己在外邊已有物業，沒有租金負擔，根本是多此一举。還有一點，該家印刷廠原先只需五具電話機，在搬回香港仔之後，文匯分配給它七八部電話，原因是當日喬遷新址時，文匯的領導沖昏了頭腦，他們向電話公司預留大批將來擴充的分機號。號碼留了下來就要繳付一定的費用，也是每年每月白白繳交，現在文匯不能不以鄰為壑，把這些開支硬是攤派給他們的屬下機構去。此外，攤子大了，日常的管理費就要增加許多。不過，這些都是小兒科，更大的問題出在那間舊社址的重新發展。

张云枫经营上的重大失误

由於是上級撥款購置香港仔新址，文匯報原先在灣仔道 197---199 號的社址不須放售套現，文匯上層決定把這幢物業發展為商業樓宇，其如意算盤是將來收取租金以作挹注。舊址的平面面積不超過 180 平方米，如此窄小的地盤重新發展是沒有多大好處的；其次，文匯手上沒有資金，要發展只能靠借貸。在這個問題上張雲楓犯了兩個錯誤。

第一個問題，如此細小的地盤在扣除了前後樓梯和升降機之後，每層樓面的實用面積不大；倘若能夠收購貼鄰那幢舊樓的話，那麼，新發展的樓面的實用面積將會大增而增加了租金收入，同時亦攤薄管理費用。更重要的符商業大廈的要求，容易租出。第二個問題，新華社文體部有一筆暫時不需動用的基金，他們擬與文匯報合作發展這個地產項目，那麼文匯就不需要或減少向銀行的借貸，亦即是減少向銀行繳付利息。但是上述兩件事均遭到張雲楓的否決。

收購貼鄰的樓宇是一件頗為困難的工作，可以自己去做，也可以與地產商合作，何況這個項目並非馬上要動手，可在有利的時機出手。

不過在這件事情突顯出文匯的領導人鼠目寸光，他們連新華社文體部的現金投資都不接受，怎敢與資本家合作來發展地產項目呢？“表叔們”長期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他們只懂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不知道利潤共享、風險共同承擔這種遊戲規則。加上在回歸前

夕，香港的社會一片繁榮，房地產價格節節上升，沒有人想到“居安思危”。最終是在那不到 180 平米的地盤上建成一幢迷你商廈。

這幢商廈落成之日恰恰遇上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房地產跌價 50%。這幢大廈雖然不是出售，不過卻是租不出去。租不出去除了金融風暴所做成的商業萎縮之外，該幢商廈每層的面積狹窄，不很適用，還有一個更主要的是，有關領導欠缺靈活的商業手腕，以致這幢商廈大量單位空置率甚高，既要支付銀行利息，還要支付管理費用，变成了文匯報的一個大包袱。

首當其衝的是當年的總經理，由於他盲目發展项目而導致負債累累，事後又拿不出解決或抒緩方案，於是被中聯辦調回廣州，當上一位名稱很好聽的“視察員”。這位總經理文革前是文匯報廣州辦事處的一名見習記者，文革後當了官，一直在省委有關港澳的部門工作。他既未做過報紙工作，又未經歷過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由於某些關係而獲得調升。倘若說文匯的盲目發展歸罪於此人，未免過分一點，此人倒是張社長的代罪羊。

后来，中聯辦跟著從內地調來一名總經理，不知是新來的老總能幹，抑或是他到任後了解了資本主義的經管手法，經過他的努力，文匯報進行了債務重組。經過一輪計算，原來灣仔道商廈是資不抵債。一般來說，一塊地皮的價值是能抵付其建築費用的，可是文匯向銀行的貸款不止這些，還包括香港仔新廈的裝修費、購買印刷機的費用，等等。原來，文匯在擴展的時候，拿到上級撥付的經費只是盲目發展，弄到裝修等費用都是靠貸款。經過重組之後，文匯放棄灣仔道的商廈還欠下銀行一筆巨款，要把香港仔的資產作抵押，分期償還。原先打算用來收租的商廈，從此拱手交給銀行處理。且說銀行不是炒家，它取得這幢商廈的物業權之後就掛牌出售，賣得的價錢是銀行的投資包括應收利息，如此而已。不料其買家在購入大半年後將之放盤，倒是賺了一筆，此是後話。

經過債務重組之後，文匯尚欠銀行一筆巨款，要分期攤還。不料繼任的社長張某良拿出國內幹部赖账的慣用手法——不肯承擔前任的債務，拒絕還款給銀行，反正銀行也是中資機構，是共產黨欠共產黨的，有甚麼賬好算。可是，這位社長不知道香港實行的是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方法，此事若是換上了是外資銀行，債主可以下令文匯報清盤，資產拍賣。中資銀行不能做得那麼絕，不過他們為了保障本單位的權益，立即申請把文匯的資產釘契。即是說文匯報在香港仔的物業和資產不能再按揭或出售，最要命的是文匯報所有董事都被銀行列為不守信用之人，並且通報天下。

可憐這批董事都是公家的委派的，無權無利，到了這個境地反而落得不能向銀行借貸亦不能作借貸擔保人，成為沒有信用之人。張雲楓主政十多年，他一手發展了文匯報的美輪美奐的社址，其實隱藏著許多不利的因素，不管他有無先見之明，起碼欠下一屁股的債務是他任內的事，他自己在任內不能還清債務，亦欠缺還債的手段。只能慨嘆一句曰：此人真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測”矣。